国家人文历史

NATIONAL HUMANITY HISTORY 真相·趣味·良知

原《文史参考》

2013/08/01/第15期/总第87期 人民日报社 主管主办 8月上



岳飞 一个悲剧的诞生

远东第一监狱即将关闭
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名人"住客"

台湾竹联帮黑道青春

席卷世界的窃听风暴

天价"毛瓷"
政治任务烧出瓷中精品

北邙山埋着四后主
词人李煜的赤子之心



邮发代号2-339 RMB 10.00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录

封面文章

- 精忠岳飞：一个悲剧的诞生
- 宋代皇权政治下的岳飞
- 良母贤妻恩师保驾护航 一个农家少年的性格成长史
- 打伪齐、平湖匪 南宋头号将星的升起
- 岳家军：乌合之众炼成威武之师
- 其实不懂领导的心难逃一死的军事强人
- 从平反到神化岳飞是如何走上神坛的

资讯

- 编读
- 排行
- 外刊
- 段子
- 年历
- 蒋经国在赣南

史记

- 席卷世界的窃听风暴
- 台湾竹联帮黑道青春
- 远东第一监狱即将关闭 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名人“住客”

旅行

- 四库七阁：书与楼的百年文化苦旅
- 民国北平第一社交舞台
- 芙蓉古镇：土家情意稠

人物

- 金日成曾派近卫军护送西哈努克回国登位
- 词人李煜的赤子之心
- 零战之父堀越二郎

生活

- 樊建川：梦想建一百座博物馆
- 随弋阳腔传四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艺术

- 《智利说不》广告终结独裁者
- 黑暗中凝神倾听
- 用作品践行艺术之梦
- 天价“毛瓷”：政治任务烧出瓷中精品
- 认认真真探讨真问题
- 青春的浪漫与理想的血痕
- 一份方便面榜单引发的争论

专栏

- 赵丹谢幕
- 钱荒转眼成钱涝
- 孙中山和征地拆迁

视野/漫淡

- 三大金融泡沫事件的真相
- 金日成曾派近卫军护送西哈努克回国登位
- 杜甫为什么屡考不中

- 题库

- 填字

- 书情

- 学问

- 艺文

精忠岳飞：一个悲剧的诞生



“莫须有”悲剧如何诞生？千古之下，人们在嗟叹之余，发现诸如

干涉立储、犯上抗命、反对议和、坐拥重兵这些理由似乎没有一条能单独证明 “岳飞必须死”这一结论。在冤案存在多处疑点、历史细节已经不可能还原的情况下，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成了人们能够接受的唯一解释。然而，中国历史上军事强人和皇权之间的张力拉扯已久，双方经常闹得你死我活，像郭子仪这样立下“再造唐室”之功却善终的例子少之又少，再加上赵宋王朝对武将一以贯之的猜忌防范，岳飞的悲剧偶然中孕育着必然，并且还将在此后的帝制时代多次上演……

宋代皇权政治下的岳飞

作 者:游彪





岳

飞是两宋之际著名的抗金英雄，他从普通士兵成长为高级将领，最后惨遭杀害。他的悲剧人生与其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也是宋代皇权政治的必然结果。

岳飞出现的历史背景

宋朝开国之时，赵匡胤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内部各地有割据一方的藩镇和尚未归属中央的多个小国，外部有势均力敌的契丹王朝。经过不断的扩张，契丹政权占领了燕云之地，这一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京、河北和山西北部，具有极高的战略地位。毫无疑问，此地为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侵略中原王朝的必经之路，也是宋朝北部边境防御的前沿阵地。由于赵宋王朝丧失了燕山山脉等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天然屏障，而契丹人以及后来的女真人一旦占有燕云地区，他们就能够在广阔平坦的平原地区充分发挥其骑兵作战的巨大优势，给新建的宋朝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正因为如此，为了收复燕云地区，从宋太祖以后，虽然宋朝派遣重兵驻守北部边境，但契丹骑兵依然不断南下侵扰。为此宋朝前期的三位皇帝与契丹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攻防战，直到宋真宗与辽朝之间签订了澶渊之盟，双方进入相对和平的时期。然而，至北宋末年，白山黑水之间兴起的女真族为了反抗契丹王朝的压迫和剥削，在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举兵抗辽。为了达到灭辽的目的，女真贵族决定联合宋朝的力量共同对付辽朝，于是双方之间签署了盟约，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辽朝。宋徽宗之所以不顾朝廷内外官员的强烈反对，不惜撕毁与辽朝之间签署了百余年的和约，除了他意识到辽朝的力量已经被女真族大大削弱而自己可以建功立业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宋徽宗想要借机收复宋朝开国以后历代帝王都念兹在兹的燕云之地。然而，辽朝灭亡后不久，女真铁骑便长驱南下，不仅夺回了燕云之地，还迅速围困了北宋都城开封，经过靖康之变，北宋灭亡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燕云地区的归属问题，无疑是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才会出现了宋朝军民的抗金战争，也才涌现了岳飞这样的英雄人物。

两宋帝王对武将的防范

另一方面，除了外患以外，通过兵变而登上皇位的赵匡胤面临的内忧更为严重，他深知唐朝中期以来武将权力过重势必导致皇权的衰落和国家的混乱。为了防止武将擅权局面的再现，不使宋朝成为继五代之后的又一个短命王朝。赵匡胤采取措施剪除武将势力，重用文臣。经过宋太宗、宋真宗两朝的持续努力，北宋朝廷上下逐步确立了文臣治国的理念和机制，并一直贯穿于两宋三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之

中，此后历代皇帝几乎都遵循这种惯例，较为彻底地执行了重文轻武的传统国策。在宋朝最高统治者“以文制武”政策的不断打压之下，武官的权力日渐缩小，即便是在边防前线的统兵将帅，也会受到来自代表皇帝的各色人等的掣肘和制衡，几乎难有独立调兵遣将的权力。而武将们在长期被轻视和防范的政治环境下，逐渐变成了循规蹈矩、怯懦无能、精神萎靡的群体。

更为不可理解的是，宋朝在处理内政和外交这两个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上采取了“守内虚外”的政策。宋太祖、宋太宗在位时期，对强大的契丹王朝基本上是以积极防御和有机会就主动出击相结合的策略加以应对。然而，宋太宗在经过几次大规模北伐的军事行动失败之后，他并未深刻检讨招致失利的原因，而是逐渐形成了“守内虚外”的政策转变。在他看来，外患并不可怕，是可以得到平息的，而“内忧”才是威胁皇权的心腹大患，实际上就是要重点防范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野心人物”和被压迫者的反抗。在这种指导思想的支配下，宋朝无论是对辽朝、西夏，还是对金朝、蒙古，基本上都采用分兵防御的策略，加之宋军是以步兵为主，因而行动迟缓，机动作战能力极差，且战略战术呆板，战法极不灵活。在这种情况下，在作战前线的统兵官员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以消灭敌方的有生力量。尽管宋朝很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分兵防御的严重危害，但作为最高统治者，宋朝皇帝通常不愿集中兵力，统一指挥。其用意无非是担心文官武将通过征战而得以位高权重，甚至功高震主。于是便对各级官员尤其是前线将领进行分而治之，以使他们不至于危及皇帝的地位。本来，宋太宗的这一策略就存在莫大的问题，但他的继任者却将其视为“祖宗家法”而恪守不渝。几乎可以肯定，两宋时期，以皇帝为首的朝廷对在外领兵的将帅都采取了极端的防范措施，尤其是对武将。南宋初年，岳飞之被害，既是宋初以来重文轻武政策的结果，也是宋朝历代帝王“将从中御”，即在宫中操控在外将领措施的牺牲品。

高宗在抗金问题上的左右摇摆

宋室南迁以后，女真贵族为了彻底消灭赵宋王朝的残余力量，几乎是连年南下，不断追击以赵构为首的南宋小朝廷。而家破国亡的宋高宗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如何尽快稳定政权，要达成这个目的，他必须要利用赵家子孙的身份收拾军心、民心，团结南北各地的抗金力量，共同抵御金军的进攻，方能保住并逐步扭转败局。面对来势汹汹的女真骑兵，宋高宗开始几乎无力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只能东躲西藏，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更为严重的是，南宋政权建立之初，朝廷内部就出现了主战与主和的论争，以李纲、宗泽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力主抗金，收复失地，而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则主张妥协。作为最高

统治者，宋高宗必须运用权术和智谋平衡双方之间的争斗。正因为如此，宋高宗在抗金问题上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在女真军事压力过大之时，他就利用主战派，而在皇位稍稍稳定之时则重用主和派。

然而，随着宋金战事的推进，女真占领了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由于金朝军队战线过长，加之骑兵在淮河以南密布江河湖汉地区很难施展开来。相反，由于宋人齐心协力抵御外侮，因而南宋军队却是越战越强，使南宋政权迅速得以稳定下来。在这一过程中，宋高宗不得不倚重韩世忠、岳飞等战将率领军民在战场上与敌人殊死搏斗，尤其是农家出身的岳飞。经过多次与金军作战，岳飞收复了被女真人占领的江南重镇建康（江苏南京），将金军赶到了江北，他也一战而脱颖而出，岳家军从此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其后，岳飞又率军平定了南方各地的各种反抗政府的势力，如杨幺等等，帮助朝廷迅速稳定了当地的局势。在这一过程中，岳飞通过收编等多种手段快速扩充了兵力，成为南宋初年最为年轻而又手握重兵的将领。经过多次北伐，岳飞率军打败伪齐和金朝的军队，收复了宋朝的许多失地。此后岳家军长期率军驻守长江中游的鄂州，并以此为基地继续北伐事业。随着岳飞战功的不断累积，32岁的他便得到了宋朝最高的武官职位——节度使，成为独当一面的军事统帅，也使岳家军在南宋几支大军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高宗与岳飞的矛盾

南宋初年，数量众多的北宋遗民从北方逃难出来，追随并维护着重新建立的赵宋朝廷。由于北宋在长江以南地区驻防的军队数量不多，因而南宋初年领兵抗金的将领大多来自北方。为了收揽民心、军心，宋高宗不得不利用收复故土、迎回父兄宋徽宗和宋钦宗为口号笼络人心。事实上，宋高宗应该是颇具政治头脑的，其内心并不希望被女真人俘获的先皇帝回到宋朝，毕竟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相反，岳飞一直言行一致地主张北伐，迎回“二圣”，这种想法及其所作所为显然与宋高宗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岳飞战功越来越卓著，功高震主的风险就愈益凸现。由于宋朝历代皇帝对武将的防范和猜忌是根深蒂固的，因而宋高宗从内心并不完全信任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抗金将领，生怕他们位高权重，威胁到皇权。而且，宋高宗、秦桧等人并非真心要恢复故土，而是一直主张与金朝议和，因而一旦达成和议，他们势必要解除这些抗金将领的兵权。而在这些手握重兵的抗金将领中，岳飞是最年轻而又战功最卓著的，有些时候他并不完全服从宋高宗的调遣和指挥，甚至曾经公然要挟皇帝，多年的君臣相交，使宋高宗对岳飞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而宋高宗要达到剥夺诸大将兵权的目的，就必然要玩弄权术，于是暗中指使他人

诬陷岳飞，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一代抗金名将。

良母贤妻恩师保驾护航 一个农家少年的性格成长史

作 者:江仙





北

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河北真定府相州（今河南安阳）汤阴县永和乡的小村中，一名男婴降生在岳姓农家，他呱呱坠地的时候，一只大鸟在岳家小院上空吟啸而过。婴儿的父亲于是为他取名为“飞”，成年后表字“鹏举”。

他自幼力大惊人，据说还没成年就能挽弓三百斤（宋朝一斤约合今1.2市斤），用腰部开弩八石（约合今110市斤）。同乡有位武术大师周侗，岳飞拜他学会了全套射技。也许因为是岳飞的授业恩师，周侗在民间传说里愈发神勇，卢俊义、林冲、史文恭、武松都被演绎成他门下弟子。周侗因病去世，岳飞悲痛万分，每月初一和十五都要到他坟前吊唁，甚至典当衣服换来酒肉祭奠。父亲岳和以为儿子在外花天酒地，痛斥几次，岳飞却来了倔劲儿，不吐实情。岳和跟踪他来到墓地，才知道真相。在周侗墓前，岳飞对父亲说：“惟大人许飞以遗体报国家，何事不敢为？”岳和感叹：“有子如此，吾无忧矣。”

求职不顺 酗酒丢差

岳家贫寒，世代“以力田为业”，不能供岳飞接受专业的文化教育，父亲教他识字，给他讲历代英雄人物故事。据岳飞之孙岳珂记述，岳飞小时候最喜欢的书是《左氏春秋》及《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岳飞并没有太多时间读书，他很小的时候就要到野地捡柴，充当劳力。十六岁时，家里为他娶刘氏女为妻，次年生下长子岳云。新婚不久，他就离家到安阳县权贵家族韩家做庄客，赚钱养家。

韩家大宅的建造者为韩琦，北宋三朝名相，曾协助范仲淹施行“庆历新政”。岳飞来到韩家时，韩琦已去世五十年，家业传至他的孙子和曾孙掌管。有一天，农民军头领张超率人马围攻韩家大院，意图抢劫。岳飞挽弓登上墙头，一箭封喉射死张超，手下帮众一哄而散。

岳飞武艺超群，在韩家眼里终究是家奴，只能埋没在苦力中。也许是因不得志而借酒消愁，岳飞在这期间染上嗜酒的毛病。二十岁这年，岳飞离开韩家，到相州某市镇充当游徼，即追捕盗贼的弓手。多年后岳飞成为名将，韩家子弟还会在外有意无意提起岳飞的庄客出身。

在韩府这一段经历对岳飞影响很大。十六岁到二十岁，正是世界观、价值观形成时期，岳飞没有上过专门学校，在世代公卿之家耳濡目染，形成了忠君报国的思想框架。当时正是《水浒传》的背景年

代，江湖上群豪并起，高举义旗。岳飞出身贫下中农、从小身体好武艺高，似乎极有可能成为草莽英雄。但他一心应征入伍走“正路”。外公姚大翁很喜欢岳飞，带他和名枪陈广学习枪法，为从军打下扎实基础。

公元1122年，刘韐上任真定府知府，当时宋军正在童贯率领下，意图收复辽国占领的燕京，作为童贯的参谋官，刘韐在河北招募“敢战士”参与对辽战役，岳飞就在这次征兵中被刘韐相中，指定他担任一个小队长。刘韐是岳飞人生中第一个伯乐，也是电视剧《精忠岳飞》中和“敢战士”岳飞一起最早亮相的将领。“靖康之变”后，刘韐拒绝招降，自缢而死。

关于敢战士征辽，后世有许多美化传说，据邓广铭等学者考证，岳飞在此期间并无机会立下光辉战功。两次征辽，宋军皆狼狈败逃，敢战士虽然作战勇猛，也被打得溃不成军。恰在这时，岳和病逝，岳飞回家服丧。

1124年冬，服丧期满，为糊口岳飞又当了游徼，不久因酗酒滋事丢了差事，母亲姚氏十分恼怒，严厉斥责。岳飞对母亲一向孝顺，郑重保证从今不再喝酒。事实证明完美英雄的成长是曲折的，在未来的人生中他还将多次做出类似的保证。

屡次违纪 屡遇伯乐

公元1126年，即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金兵攻陷北宋都城开封，兵荒马乱之中，钦宗派人冲出重围给九弟康王赵构送去蜡丸密信，任命他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十二月初一，赵构在相州设立大元帅府，大举招募勤王义兵，岳飞抓住机会再次入伍，迈出抗金第一步。

世代相传，就是加入抗金大军之前，母亲姚氏在岳飞背上刺下“尽忠报国”四个字。实际上，直到清朝的文学作品中才出现岳母刺字的故事，正史中并无确切依据。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时金兵残暴屠杀汉族平民，岳飞饱受刺激，一个在求职道路上彷徨不顺的血性青年，开始有了明确的人生坐标。过去当兵是为谋生，现在当兵是出于爱国的自觉，尽忠报国四个字已深入岳飞内心。

1127年4月，在岳飞进入大元帅府部队不到半年的时候，北宋徽钦二帝及皇室子弟、大臣等三千多人被金兵掳走，赵构在应天府南京即位，改元建炎。不久，岳飞就因“上书论事”而获罪。据岳珂《金佗粹编》记载，岳飞入伍后几个月无仗可打，心里憋闷，请求新皇帝放弃南撤，“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无

论岳珂复述的诏书内容是否完全属实，岳飞刚刚参军就越级上书给最高统治者，其率真无畏、不太通晓人情世故的性格可见一斑。

岳飞被削去军籍，又陷入“孤子一身，狼狈羁旅”的无业状态。幸运的是，经人引荐，岳飞拜会河北招抚使张所。张所为主战宰相李纲一手提拔，他极力反对政权南渡，岳飞与其一番畅谈，性情相投，很快得到对方赏识，借补“正八品修武郎”，不久升为统制。可惜李纲只做了七十一天宰相就被罢免，张所也被贬岭南病死。短暂的知遇之恩使岳飞铭记终生，多年后，因岳飞立战功，朝廷欲奖赏其子岳云一个官衔，岳飞上疏奏请将官衔转给张所的儿子。

张所被罢免之后，岳飞追随都统制王彦，率领部队按照张所原定计划作战，渡过黄河夺回新乡县城，可惜遭到金军大举反攻围城。王彦用兵稳重，没有立刻主动突围，岳飞年轻气盛，急切求战，质问王彦为何胆怯观望，然后竟带着人马不辞而别，独立作战去了。

此举不仅自己铤而走险，也陷王彦部队于艰险境地。金军大举来袭，激战后，王彦手下只剩七百余残兵，面上皆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人称八字军，越战越勇，召集大批忠义民兵，最后集结了十几万人镇守黄河南岸。岳飞带着小股部队东一枪西一棍，自己身上受了十余处伤，战马也宰杀分食给部下。看到八字军发展壮大，岳飞后悔自己一时冲动，单身匹马回到王彦军营请罪。

背离主将出走，是严重的违反军纪行为，斩首也不为过。王彦看到岳飞敢于独自认罪，不禁被他的勇气打动，备了酒菜款待他，将此事报告东京留守宗泽，请他处置。宗泽见到岳飞，发现这个年轻人虽然行事莽撞，但的确怀有将才，不但赦免他，还把他留下在自己麾下直接指使。

王彦虽然没有开罪岳飞，但内心阴影终生挥之不去。绍兴六年（公元1136 年），岳飞任湖北、襄阳两路的宣抚使，时隔九年，他的官位和战功已在王彦之上。朝廷指派王彦调做知襄阳府充京西南路安抚使，这项任命的实际意图是，王彦年事已高，一旦去世，八字军可直接归岳飞统帅。王彦不愿让岳飞当自己的上级，推辞了这项任命。岳飞深感遗憾，与王彦相约在鄂州停舟叙旧，两人刚在长江上相遇，才说几句话，忽然一阵风吹来，王彦立即命令解缆，鼓帆而去。岳飞见王彦如此，依然望着他的帆影，对部将赞赏这位老领导昔日风采，叹服不已。

拒学阵图 野战起家

建炎元年十二月，金兵进犯汜水，宗泽指派岳飞为突击队长，带五百骑兵退敌。叮嘱他说，我看你是很有作战本领的人，所以特地不追究你以前的罪过，现今是你奋勇立功的时候了，不要轻率从事。岳飞谨记宗泽教诲，一战告捷。此后宗泽屡次委岳飞以重任，岳飞均圆满完成，被提升为统制。

宗泽是进士出身的儒将，精通兵法，他看岳飞打仗总是“野路子”，有心引领他登堂入室，于是送《阵图》给他，劝告他好好研究，为以后当大将做准备。岳飞把《阵图》翻阅一遍，直言不讳地表示，“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如果在平原旷野突然遇敌，哪有时间按图布阵？毛头小子竟然如此回应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教诲，宗泽略有不悦，问道：照你所说，难道阵法不足用吗？岳飞回答：“阵而后战，兵之常法，然势有不可拘者。且运用之妙，存于一心。”宗泽沉思片刻，向岳飞诚恳地说，你的看法完全正确。

宗泽在开封修造大量防御工事，锲而不舍地向赵构上书，请他“回銮”，赵构把他当作爱唠叨的老人，起初还回信假意敷衍他，后来干脆不理他。七十岁的宗泽忧愤成疾，建炎二年七月初一，他高呼着“过河！过河！”死不瞑目。岳飞一生继承宗泽的战略遗产，时人评论说，宗泽“虽身不及用，尚能为我宋得一岳飞”。

宗泽的继任者杜充暴躁固执，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听说金军即将进攻，他下令开决黄河河堤，此举只换得一时喘息，却使沿岸百姓家破人亡。岳飞已不是冲动青年，背离王彦的事件给他留下深刻教训，他虽然对杜充极不服气，但依然在他帐下听命。杜充好猜忌，但岳飞屡建战功，几次保得他逢凶化吉，他因此对岳飞十分信任，岳飞升至下武德大夫，授英州刺史。

建炎三年五月，杜充擅自离开封南下，岳飞等将官也跟着他一路南撤。途中常遇到叛乱部队和被金兵击溃的散兵游勇，这些兵匪大肆劫掠百姓。岳飞对他们并不赶尽杀绝，而是征服并收编对方，用严厉的纪律来约束，使自己的部队愈发壮大。在宜兴县，当地居民感念岳飞维持治安，秋毫无犯，以他为造型雕刻石像，建庙宇供奉。

切骨恨前妻 守孝撂挑子

离家三年，岳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河北沦陷区的母亲和妻儿，极偶尔才能得到家中音信，母亲姚氏总是一句话：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到江南安定下来之后，岳飞派人回老家寻访十余次，终于把四处逃难的母亲和儿子岳云、岳雷接到身边。他的发妻刘氏据说迫于生活改嫁，不知去向。

颠沛流离，再加上到南方水土不服，姚氏健康状况很差。岳飞只要一有空闲，就奔到母亲身边，亲自煎药喂药。绍兴四年，姚氏病危，岳飞向朝廷请假要全职照顾母亲，上书云："臣孤贱之迹，幼失所怙，鞠育训导，皆自至母。"两年后姚氏去世，岳飞三天不吃不喝，哭得眼睛红肿，大病一场。他和岳云赤脚扶棺，从鄂州一直送灵至江州庐山，安葬母亲之后就在九江东林寺守孝，坚持要守二十七个月。三省枢密院下令给岳家军全体属官司将佐，要他们共同敦请岳飞，否则延误军机一律处分。岳飞这才"移孝作忠"。

岳飞极爱母亲，因此当年刘氏不管为什么理由抛下婆婆，他都不能原谅。《三朝北盟会编》有这样一段记载，韩世忠发现岳飞失踪的发妻刘氏嫁给了自己手下一名低级军官，让岳飞来认领，岳飞不搭茬。这件事被高宗知道，岳飞上奏表明自己并非弃妻："履冰渡河之日，留臣妻侍老母，不期妻两经改嫁，臣切骨恨之，已差人送钱五百贯，以助其不足，恐天下不知其由也。"岳飞给刘氏送了五百贯钱，恩断义绝。

令岳飞安慰的是，他在江南遇到渔家女李娃，再结良缘。如果说刘氏是父亲替他包办的妻子，和李娃的结合可以算是自由恋爱了。李娃比岳飞大两岁，结婚时已经二十八九岁，在当时社会可以说是超大龄女青年。她成熟能干，对岳云、岳雷视如己出，更重要的是对婆婆十分孝敬，深得岳飞欢心。夫妇感情和睦，岳飞一生不纳妾，也几乎没有绯闻。抗金名将吴玠好色，见岳飞无姬妾，好心送美女给他，岳飞也不怕得罪吴玠，对美女说："某家上下所衣布耳，所食齑面耳。女娘子若能如此同甘苦，乃可留，不然，不敢留。"婉言逐客，原封退回。

同甘共苦是岳飞很看中的女子品质。李娃新做了身丝绸衣裳，岳飞看见很不高兴，"吾闻后宫妃嫔在北方，尚多窭乏。汝既与吾同忧乐，则不宜衣此"。李娃深明大义，全家人从此只穿布衣。岳飞严厉禁止妇人干预军政，但他要求李娃协助他抚恤照料军士家属的生活，李娃尽职尽责。

岳飞和岳云被害不久，岳雷含恨病逝，李娃带着自己生的三个儿子岳霖、岳震、岳霆，女儿安娘，及岳云岳雷的遗孀、遗孤，流放岭南。她含辛茹苦将一众儿孙抚养成人，为岳家保住血脉，二十年守得云开见月明。

打伪齐、平湖匪 南宋头号将星的升起

作 者:纪彭





自从老帅宗泽病逝，形势急转直下。在金军的打击下，宋军相继丢

掉了徐州、淮阳、建康等重镇，高宗皇帝仓惶逃到杭州，又被驱赶到大海上漂了四个多月。还好，金军这次攻势的目的主要是劫掠，东西抢得差不多了就寻思着打道回府。趁着金军撤退之际，韩世忠在黄天荡截击了金军主力，岳飞也乘机打了几个胜仗。

战局再次稳定下来，韩世忠以建康、镇江、淮东三镇组成淮东集团军，刘光世所部驻防淮西，张俊则负责浙西、江东的防务。岳飞因为战功卓著被任命荆湖东路安抚使、都总管，统率军马前往潭州（长沙）。在头号主战派人物李纲的领导下，岳飞击破曹成、收服杨再兴，军威大振，被李纲称之为“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近来之所少得”。

此时，岳家军部队发展到两万四千余人，已经可以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三军等量齐观。绍兴三年（1133年）九月，宋高宗亲自接见岳飞，并亲笔书写“精忠岳飞”四字，绣成一面战旗。又任命岳飞为“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将驻守蕲州的统制李山，屯扎江州的统制傅选，两支部队并入岳家军。从此，岳飞终于自立门户，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

大破伪齐主力，收复襄阳六郡

绍兴四年（1134年），朝廷命岳飞去收复襄阳六郡，在岳飞的战略构想中，这里未来将是北伐的前进基地。

四月，岳飞率军三万余自江州（九江）出师，经鄂州（武昌）渡江西进，船至江心，岳飞对部属发誓“不擒贼帅，复归旧境，不涉此江！”五月初，岳家军进抵伪齐南部重镇郢州，守将荆超曾任北宋宫廷近卫，号称“万人敌”。当时，军中存粮仅够二餐，岳飞胸有成竹，预料次日上午即可破城。翌日黎明，岳飞坐在旌旗下指挥攻城，战斗异常激烈，突然一块炮石落在岳飞脚下，左右惊慌躲避，岳飞却神色安然。不到正午，宋军便冲入城内，荆超兵败，跳崖自杀。

攻下郢州，岳飞即分兵两路，命部将张宪、徐庆东攻随州，自率主力沿汉水北上直取襄阳。驻守在襄阳的李成此前曾多次败于岳飞之手，得知老对手亲自来攻便明智地选择了脚底板抹油。岳家军顺利攻克襄阳。张宪、徐庆进攻随州，一时未能攻克，岳飞命牛皋率军往援。在随州城下，岳云手持双锤，第一个冲上城头，他勇冠三军的威名，就是在此役开始树立的。宋军一举破城，俘获知州王嵩以下五千余人。

六月初，金军出兵援助伪齐，与伪齐军合兵一处，重新集结后的

金齐联军号称三十万，向襄阳全力反扑。战前，岳飞巡视战场，登高一看，心中暗喜，他对左右说："骑兵利旷野，步兵利险阻"，原来，李成把骑兵布在河边上，把步兵列在平原上。岳飞洞察李成阵势漏洞后回到军营，采用"以步制骑，以骑击步"的战法，命王贵率长枪步兵攻其骑兵，命牛皋率骑兵冲击其步兵。宋军列好阵势步步进逼，李成的骑兵发动进攻，宋军把如林的长矛往地上一插，明晃晃的矛尖让战马受惊。李成骑兵回撤，前队后队自相践踏，死者无数。紧接着，岳飞的骑兵在平原广地，将李成的步兵冲得稀里哗啦。很快对手的十万大军灰飞烟灭，岳飞大获全胜。

岳家军于七月挥师进攻邓州，王贵、张宪两军分路向邓州挺进，实施包抄。两军酣战之际，岳飞的骑兵再一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王万、董先所部精骑的突击，一举击溃金齐联军，俘获金将杨德胜等二百余人，缴获战马二百余匹，军事物资不计其数。随后，襄阳六郡全部收复。按照预定计划收复失地，这是南宋建国以来还未曾有人建立过的功勋。

政治攻势平定杨幺

绍兴五年（1135年）二月，岳飞晋见高宗，高宗除任命岳飞为两镇节度使外，又加荆湖南路、荆湖北路、襄阳府路制置使，升"神武后军"都统制，赐钱十万贯，帛五千匹。同时，岳飞听高宗命令，前去剿灭洞庭湖的杨幺"湖贼"。

杨幺造出30艘左右能载千人的大型战舰（车船，有踏板，用人工蹬踩，速度较快但不能在浅水中行驶）和几百艘轻快战船协同作战，以至于宋廷认为杨幺军"为腹心害，不先去之，无以立国"。岳家军以宗泽的东京留守军为主干，不习水战，此前一直都只有陆战经验，剿灭杨幺水军是对岳飞的一个考验。但岳飞认为："兵亦何常，惟用之如何耳。"

杨幺所部约有作战兵力五六万人，加上家眷共计数十万，他们的作战策略是"陆耕水战"，也就是春夏水涨，宋军不能出兵时耕种田地；秋冬水落，宋军发动攻势时，"官军陆袭则入湖，水攻则登岸"，这种游击战叫宋军十分头疼。针对杨幺军的特点，岳飞提出了两项战略：第一采用春夏作战的方式，让杨幺军无法耕种。第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

岳飞一到前敌，就任命早先投降的杨幺军部将田明为"衡州兵马钤辖"的差事，早先被招降的杨华，也奉岳飞之命"入贼招安"，设法串通旧部、颠覆杨幺军。杨幺军部将黄佐听说岳家军来剿，便率部众投

降。岳飞保奏他为正七品的武义大夫，并单骑到黄佐的营地进行“抚问”，以示诚意。不久，黄佐率部伍攻破杨幺军部将周伦的水寨，俘获陈贵等九名头目。岳飞立即将黄佐提拔为武经大夫。

看到岳飞如此大度，杨幺军大将杨钦也率其全寨战士三千多人，加上老小共一万多人出降。岳家军得大小舟船四百余艘，牛五百多头，马四十多匹。岳飞亲自到鼎州城东视察受降，并立即申报上级授予杨钦武义大夫，还将宋高宗赐予的金束带和战袍也转赠杨钦，并派副手王贵设宴招待。杨钦受此礼遇，又为岳飞劝降了全琮、刘诜等部。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杨幺军各部将官纷纷投降，最后只剩杨幺的嫡系部队拒不投降。

对杨幺嫡系，杨钦向岳飞献计用杂草等阻塞湖面，以阻遏一丈深吃水的大型车船的行驶。岳飞又下令用巨筏堵塞鼎州附近湖面的各个港汊，并派小船挑战。杨幺出战，车船的轮子被杂草缠住无法转动。岳家军发起总攻。杨幺企图突围，又被各个港汊的巨筏拦截。杨幺被俘后即被斩首。岳飞仅用了十多天时间，就剿灭了其他南宋军队花了四年时间都无法镇压的洞庭湖杨幺割据势力。

岳家军平定杨幺以后，打通了长江上下游的联系，岳家军的后方安定，可以专心对付北方的金军和伪齐军。岳飞因功官至检校少保，“岳少保”的称呼就是这么来的。

猛攻瓦解伪齐，妙计整垮刘豫

绍兴六年（1136年）正月，主战派宰相张浚来到前线，召集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到镇江府的都督行府商议军事。张浚在写给高宗的奏疏上称“韩世忠忠勇、岳飞沉鸷，可以倚办大事”。

随后，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岳家军又一次启动北伐大计。此次攻势，最终因粮草不济，加上岳飞目疾发作被迫停止。当时，岳飞的眼病十分厉害，白天连卧室的窗户都必须全挡住。高宗闻讯后，特派眼科医官皇甫知常与和尚中印两人急驰鄂州为岳飞治疗，可见高宗此时对爱将岳飞的关心。

绍兴六年（1136年）九月，刘豫以号称七十万大军进攻刘光世驻守的淮南西路，被刘光世击退。刘豫马上转攻长江中游的岳家军。连刘光世都不敌的刘豫竟妄图挑战岳家军，其结果可想而知。岳家军大破伪齐刘豫的弟弟刘复率领的十万伪齐主力，刘复仅以身免。

伪齐大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惨败而归。这时岳飞又使出了一招反

间计。他给刘豫送去一封蜡丸，秘信藏在蜡丸里，故意被金军逮着。信的内容自然是要和刘豫联手干掉金国名将兀术，还承诺他高官厚禄。岳飞这封信简直就是“蒋干盗书”，这等计谋岂能瞒得过金兀术？但伪齐此时已经成为大金国的政治负资产，兀术将错就错，揣着明白装糊涂地把刘豫废掉。虽然兵不血刃地拔掉伪齐政权，但也应该看到，此时女真人已经不需要通过代理人统治中原地区，金国政权在淮河以北的逐渐稳定对南宋君臣不是个好消息，宋金之间从此没了缓冲。

绍兴八年（1138年）底，宋金议和，两国以黄河为界，南宋向金称臣，并且年年交纳岁贡，史称“天眷议和”。可惜和平仅仅维持了一年，金兀术就撕毁和议，分四路南下。 此时的南宋，具备光复故地决心和能力的统帅，惟有岳飞一人。而此时的岳家军也如日中天，是南宋几支主力部队中唯一有进攻能力的力量。也正是这支精锐，在给金军主力以毁灭性打击的同时，也让一直忧心武将势大的南宋统治者寝食难安。

链接：岳飞（1103-1141年）足迹图

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岳飞生于相州汤阴县（今河南安阳市汤阴县）

宣和四年（1122年），岳飞在真定府（今河北省正定县）应募从军御辽，后因父亲岳和病故，回汤阴守孝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在相州应募，参加康王赵构的勤王军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率军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附近两次大败金军，收复建康。岳飞被授为清远军节度使

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从伪齐手中收复襄阳府（今湖北省襄阳市）、郢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随州（今湖北省随州市）、唐州（今河南省唐河县）、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信阳军（今河南省信阳市）六郡

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在洞庭湖平定杨幺之乱

绍兴六年（1136年），岳飞北伐，收复商州（今属陕西省商洛市）、虢州（辖今河南省西部）。岳飞被任为太尉、宣抚使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在郾城（今属河南省漯河市）、颍昌

（今河南省许昌市）取得大捷

绍兴十一年（1141年），岳飞被召回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被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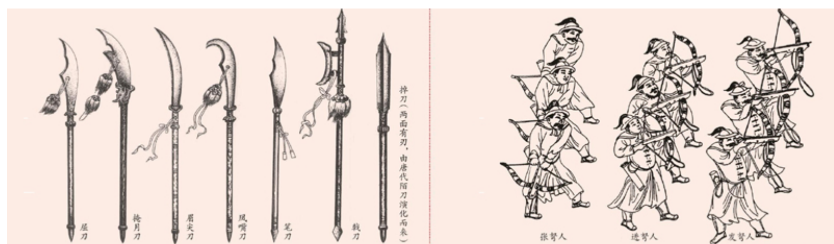
岳家军：乌合之众炼成威武之师

作 者:郭晔旻











当年谁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

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

威名千古更无敌，词论数行俱绝尘。

拟取中原报明主，亦劳余刃到黄巾。

——南宋·吕午《和岳王庙壁上韵》

起源：国难中诞生的“岳家军”

说起“岳家军”，不能不提《满江红》里的那句令人耳熟能详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靖康二年（1127年）闰十一月的“靖康之变”导致了北宋政权的灭亡，也让宋太祖赵匡胤苦心孤诣建立的那套军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本人的军制土崩瓦解。原先由朝廷直接掌握全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禁军），“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随着数十万禁军在金军二次南侵的战争中非亡即溃，基本消失殆尽而不复存在。经历了东京（开封）失守、徽钦“北狩”的国难之后，赵构在江南重建的宋政权，虽然名义上叫做“中兴”，实际却跟“草创”无甚差别：金人铁骑的南下追击迫使这位康王“泥马渡江”，甚至一度落到流亡海上的地步；宋廷中央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正规军队，抵抗女真人的重担在很大程度上需依靠那些靠扩张私人军队并吸收流寇渐成规模的将军们”。

挨到建炎三年（1129年），南宋统治机构总算初具规模，终于将分驻抗金前线各军事要地的野战主力部队统一番号为“御前五军”，第二年改为“神武五军”；到了绍兴五年（1135年），因“神武”乃是当年北齐军号，又改成了“行营护军”。尽管名义上已经被中央收编，但时人依然习惯以大将的名号称呼所部军队，譬如张俊的军队叫“张家军”，韩世忠的手下，则曰“韩家军”，兵将间的私人隶属味道很浓。这在北宋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谋逆行为，就连杨老令公如此威名盖世，却也是个可怜的光杆司令，手里连一支骨干部队都没有，只是在征战之际，才有份指挥由来自各支不相统属的禁军临时拼凑的部队。

南宋初年的统兵将领，不光长期手握重兵，权力也更大，辖区以内可以先斩后奏，便宜行事；上马管兵，下马管民，军权财权都尽在掌握，基本上就是辖区内的土皇帝。这在满脑子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文官集团看来简直就是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重演，有人（不是秦桧）就向宋高宗上书进言，各路大军只知道有自己的统帅，人人都是各为其主，还有谁晓得有皇帝陛下呢？这些文官只记得北宋初年收藩镇之权是让“天下无事百有五十年”的良法，却没有看到这“百有五十年”间宋军外战的不振，更忘记了靖康之耻实际上就是北宋兵制“四方帅守事力单寡，束手而莫知所出”这一弊端的大暴露，而其结果就是整个北中国的沦陷！在金人强兵压境的局面下，南宋当局向统兵将领放权也算是与时俱进的举措，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守将拥有更多权力，增加其守土御敌的责任感，最大限度地调动辖区内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抵御金军——毕竟能打胜仗才是硬道理，“政治正确”只能暂时摆到一边。于是，北宋只能有“杨家将”，而南宋却出现了“岳家军”。

岳家军的起源，还要追溯到建炎年间的东京留守司部队。金军灭

亡北宋后暂时北归，一向主张抗金的宗泽出任东京留守，收编了大量溃兵和义军，并且积极联系河北的抗金武装，一时间军威很盛，号称百万。投军的岳飞在宗泽麾下，从基层做起，凭借军功一步步晋升至将领。然而在宗泽1128年三呼“过河”而去世之后，继任者杜充御下无能，义兵闻风解体。几天之内人心就散了，将士去者十五，两河豪杰皆不为用，以致时人有宗泽在则“盗可使为兵”，换成杜充就变成“兵皆为盗”之叹。后来杜充退至江南时尚且拥兵十万，面对金军南下时却轻易投降，致使这支昔日威震中原的东京留守司部队彻底瓦解。只有岳飞的队伍成为仅存的硕果，在大军溃散之余，时任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的岳飞率部移屯宜兴，相继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土匪队伍。从此独自成军，揭开了“岳家军”的传奇篇章。

军纪：南宋第一强兵

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前，以长江边的鄂州（今属湖北，治所在现武汉市武昌区）为基地，岳家军（正式名称是“行营后护军”）已壮大到10万之众。当时，在南宋初年名震一方的宋廷大将中，淮西张俊所部8万人；淮东韩世忠所部仅有3万人；远在四川的吴玠手下也只有6.8万人。岳家军已然成为南宋朝廷各支大军规模之首。

在岳家军的十万大军之中，真正从东京留守司时代延续下来的老班底只有大约两千人，而南宋当局历年来拨给岳飞的部队为数也不很多。岳家军的兵员主体，是岳飞在绍兴元年（1131年）到绍兴五年间，率部驰骋在湖湘等地，平定不服朝廷的盗贼土寇后收编的壮丁。

受战乱影响，溃兵盗贼当时遍布大江南北。这帮人的来源大致是两个：一部分是由北方民间的抗金武装和各地勤王义军转化而来；另一部分是由被金人击溃而逃散的士兵转化而来。对于这些令人头痛的溃兵盗贼，大敌当前的宋廷通常息事宁人，以招抚收编为主，以致当时出现了“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临时首都）卖酒醋”之类的俚语。但溃兵盗贼中总有强梁反复者，敬酒不吃吃罚酒，被岳飞奉命剿灭。但岳飞在平乱之后对大批被俘者的宽大处置令人赞叹，除元凶外皆不问（甚至在江西拒绝过宋高宗的屠城密令），老弱者放归田里，精壮者则被收编入伍，成为“岳家军”的一员。绍兴二年（1132）二月，岳飞剿灭并收编盗匪曹成部后，兵力即暴增一倍，达两万四千人，已与其他几位大将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的兵力并驾齐驱。三年以后，岳飞又奉命进剿了盘踞在洞庭湖地区的“湖贼”杨幺，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消除了这一朝廷的心腹之患。得胜之后，有部将建议岳飞在鼎州（今常德）大开杀戒以显示军威，并让当地人“知所怕惧”，被岳飞严词拒

绝。免遭一场荼毒的当地百姓从此对岳飞怀有很深的好感，直到几十年后的宋孝宗淳熙年间，常德一带的老百姓依旧对“岳枢相”感恩戴德；而原先杨幺手下的丁壮被编入岳家军的大约有五六万人，远超过岳家军在剿灭杨幺前的兵员数量。

如果只是兵员多达十万，这样的军队其实也不足恃。北宋时代禁军最多超过100万（可见林冲的80万禁军教头货真价实），却是军纪松散连战皆溃，辽、金、西夏个个都成了苦主，足见一支军队如果只是人数多，也不过是乌合之众，更何况岳家军中从溃兵盗贼中收编而来的大多数兵员，本来就是些目无法纪、纪律散漫的亡命之徒！

但是，就是以这些原先货真价实的乌合之众为主组成的岳家军，在史籍上却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著称，这一点不仅在当时，甚至在整个古代中国，都堪称卓尔不群。昨日当流贼时烧杀奸掠，无恶不作，今日在岳家军里却是俯首贴耳，令行禁止。如此奇迹般变化的背后，是岳飞的治军，以严明军纪而著称于史，如同南宋学者周密在其著述《齐东野语》中所言，岳家军的军纪为“中兴第一”！

岳飞在南宋军界初露头角并非因为战功，而是因为肃然的军纪。岳飞曾经说过：“用兵者无它，仁、信、智、勇、严五事，不可不用也。有功者重赏，无功者重罚，行令严者是也。” 岳家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早年岳家军初创驻军宜兴时，两浙各地吏民纷纷扶老携幼迁到宜兴，把岳家军驻地当作临时的避难之地，宜兴人民甚至出资为岳飞建造生祠，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原因无他，唯有岳家军能够做到“不扰百姓”。当时几乎所有宋将都纵兵行暴践民，个中之尤即数张俊，其部队还常以“自在军”炫耀；建炎四年（1130年）宋军收复建康（今南京）后，在这座繁华的东南都会之中，各路宋军纷纷变身为强盗，令已在女真铁骑下饱受欺凌的建康百姓大受其苦；只有岳飞驻兵临近的广德（今属安徽），民间“无秋毫之扰”。当年秋天，岳家军移防江北泰州，当地百姓同样安堵如故；为此，宋高宗亲自下手诏表扬岳家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民不知有兵也”。

农民出身的岳飞对士兵欺凌平民深恶痛绝，因此军法甚是严峻：拿老百姓一文钱的，就要杀头！ 有个兵士拿人一缕麻绑草鞋，岳飞追查盘问后，斩首！ 在极端严格的管束下，经历成年累月的军纪实践，岳家军军纪之严整，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有士兵在湖口县买柴，百姓主动少收二文钱，士兵坚拒说：“你想用这二文钱买我的脑袋吗？”绍兴二年岳家军平曹成后屯驻江州（今江西九江），一时军费不继，士兵杀马充饥，剪发卖钱，甚至卖老婆孩子买米，却无人敢于抢掠百姓。日久天长，岳家军名声在外，以至于老百姓听到其他军队来了，如同遇到了土匪，都逃得无影无踪，而岳家军路过的地方，

老百姓纷纷出门围观，乃至声泪俱下，激动不已。

当然，岳家军的军纪绝不只是靠着严刑峻法维系。岳飞以身作则，与部下同甘苦，经常与最低级的士兵同吃，酒肉全部平均分配，若是酒少不能分给全军，就掺上水让每人都能喝上一口。士兵露宿野外，岳飞也绝不一人住进营帐。同时，岳飞尽可能地善待部众，朝廷每次犒赏，全数分发将士，自己一文不取。有一次，岳飞命令一名部将分发犒赏，按照带甲人、轻骑人、不带甲人三等给钱，这名部将从中渔利中饱私囊，被岳飞发现后，立即杖杀。对于立功的将士，生活简朴的岳飞向来不吝赏赐。部将张宪的亲兵郭进在莫邪关立下头功，岳飞就立即赏赐金腰带和银器，并将他从普通小兵提拔为从八品武官。

在岳飞恩威并施的管教下，岳家军形成一种军令如山、雷厉风行的军风。有一次，岳飞派一名骑士带奏折前往临安，途经长江，恰值风浪，渡口管理员禁止过江，结果这位骑士表示，宁可淹死，不能违背岳太尉的军令，随后自驾一叶扁舟渡江，目击者无不惊以为神。赏罚分明的岳家军对于日常操练的要求与实战一样严格。兵士冲山坡，跳壕沟，都穿着重铠练习。儿子岳云在训练时战马失足跌倒，就立即受到鞭打。所谓“在操场上很困难，打仗时就容易多了”，岳飞一生谦虚，唯独对岳家军士兵的战斗力从未低调，曾豪言：“某之士卒真可用矣！”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的“岳家军”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南宋第一强兵”！

战将：历史就是传奇

“岳家军”不但兵多而且将广，岳飞帐下有统制官 22 人、将官252人，其中正将、副将和准备将各84人，而同时期的张俊手下只有10名统制官，韩世忠手下也只有11名。

在岳家军的众多将领中，有一人的身份最为特殊，他就是岳飞的长子岳云。当时宋朝的宰相是正一品，月工资三百贯与一百石禄米，只是从二品的节度使却有工资四百贯和禄米一百五十石。作为朝廷的高级将领，官居两镇节度使的岳飞的工资比宰相还高，即使不算宋高宗经常颁发的重赏厚赐，也完全有能力让儿子过上跟其他衙内一样的阔绰生活，但对岳云，岳飞并无丝毫徇私之意。相反，在赏罚分明的岳家军全军将士中，岳云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他有功不赏，有过必罚，而在战场最险恶的场合，却必须身先士卒，舍命于枪林箭雨之中。自从绍兴四年（1134年），年仅16岁的岳云首次随父出征后，岳云一直充当岳家军的先锋角色，冲锋陷阵。很多明清以来的文艺作品包括戏曲当中，都说岳云使两把大“锤”，但其实岳云所用兵器是铁

锥（同“鎚”）枪。今天所说的“锤”在宋代被称为“骨朵”，而“铁锥（鎚）枪”是一种长形的又能刺又能砸的重兵器，重达80斤，可见岳云的臂力确实惊人，故在战场上锐不可当。因此，岳家军中皆称其为“赢官人”（官人为宋代对男子的尊称，“赢”指常胜不败的意思）。

由于岳飞对岳云的战功的处理近乎苛刻，多次隐瞒不报，使得岳云的官职晋升甚慢。故而，在岳家军诸将中，张宪和王贵二人成为地位最高的将领，岳飞的重要副手。当岳飞不在军中时，王贵和张宪可以代替岳飞指挥其他统制，主持岳家军全军的事务。担任前军统制的张宪追随岳飞多年，以忠义著称，深得岳飞信任。

至于流传很广的小说《说岳全传》中性格最为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之一的牛皋，官拜岳家军的左军统制。他的人生一大污点是在加入岳家军前曾经短暂投降了金国扶植的傀儡伪齐政权。小说中的牛皋鲁莽而不失智谋，暴躁而不失幽默；而历史上的牛皋其实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绍兴四年岳家军北伐金国傀儡伪齐盘踞的荆襄六郡时，张宪和岳家军另一猛将徐庆带兵攻打随州，守将王嵩死守不出，岳家军连攻一个多月还是没有得手。岳飞得报后派牛皋去支援，临走时牛皋只带了三天的粮草，结果不待粮尽就攻下随州，俘敌五千，活捉王嵩。其人善战，可见一斑。牛皋的结局也是一个悲剧。尽管《说岳全传》虚构了一个“气死金兀术，笑死牛皋”的动人故事，给牛皋设计了一个快意恩仇的结局；但在真实的历史上，牛皋因坚决反对屈辱的和议，最后在1147年（绍兴十七年）农历三月初三，被奸相秦桧密令亲信都统制田师中，以宴请各路大将为名，用毒酒害死。

岳家军中间还有一员勇将，《说岳全传》对他的结局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史实，也就是说，此人已经不需要任何演义，因为本人就是一个传奇。他就是杨再兴。杨再兴原本是盗匪曹成的手下，骁勇善战。在岳家军进剿时，杨再兴曾杀死了岳飞的胞兄岳翻，但岳飞剿平曹成后却不计前嫌将杨再兴收为己用。得到岳飞如此宽容的杨再兴从此忠心耿耿，冲杀在前。在绍兴十年的北伐中，岳家军进逼临颍，杨再兴率领三百骑兵前哨小商河，与金军主力猝然相遇，数万金军对他们实施包抄围掩。杨再兴等人却毫无惧色，率三百骑士奋不顾身地进行殊死战。金军箭如飞蝗，杨再兴每中一箭，都折断箭杆继续冲杀，最后不幸马陷小商河，被金军射成“刺猬”，但是他和他的战马依然在河中站立不倒。此战，杨再兴率军斩杀金军万夫长以下二千余人，与其三百精骑全数战死，堪比斯巴达三百壮士力阻波斯帝国十几万大军的温泉关传奇！金军撤退之后，岳家军在残阳如血的战场上找到了杨再兴的遗体，火化之后，从中捡出铁箭头两升有余。此即著名的“血战小商河”，这段真实的历史，和评书、小说一模一样！

战功：南宋唯一的攻击性力量

由于岳家军的规模不断扩充，给岳飞对这支大军的管理带来了很多不便之处。于是，岳家军的十万大军总分为十二军，计有：一、背嵬军；二、前军；三、右军；四、中军；五、左军；六、后军；七、游奕军；八、踏白军；九、选锋军；十、胜捷军；十一、破敌军；十二、水军（横江军）。

其中，前后中左右五军是常见的名字，选锋军、胜捷军和破敌军都是取了比较威风的名字。以上这八支部队都是以步兵为主。虽然南宋绍兴二年（1132）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时使用的长竹杆火枪，以竹为筒，内装火药，临阵点燃，喷射火焰，焚毁了敌人的攻城器械“天桥”，是最早见诸史册的管形火器；但在岳家军中，仍以冷兵器为主要装备。经过严格训练的岳家军重装步兵全身披甲，全副铠甲用甲片1825叶，重达40-50斤。在岳家军步兵中，弓弩作为主要兵器占有重要的地位，弓弩手占了军士的大部分。军队里大约十分之二的兵士使用弓，十分之六的兵士使用弩，合计占到了80%，剩下的大概十分之二的士兵才使用刀枪等近战兵器。因宋朝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弓弩等兵器远远胜于以骑射起家的北方民族，所谓“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而弩在宋朝被视作对抗北方骑兵民族的利器，得到大发展。弩手多用踏张弩，采用三组轮射的迭射法，而“神臂弓”的发明，使宋军的有效射程远及二百四十多步，约合372米以上。宋军战场上的老对头金兀术也不得不承认，神臂弩是最令他恐惧的宋军武器。

为保护在近战中将沦为活靶子的弓弩手，岳家军以刀枪手紧靠阵前布设的拒马之后，居于弓弩手之前，以便于当敌骑冲阵之时进行白刃战。同样是为了对付金人的铁甲骑兵，岳家军十分重视长柄刀的使用。所谓长柄刀，种类甚多，大致都是由唐代的陌刀演化而来。舞刀是宋军重要的训练内容，按照南宋建国之初的规定，舞刀者要用长1.2丈以上的长柄刀，用毡皮将刀头裹起来，连舞五十二次，能让刀头不落地的，才算合格。至于在宋军中军纪最严，训练要求最高的岳家军里，更不待言。

在岳家军十二军中值得一提的是背嵬军、游奕军和踏白军。这三支部队的名字实在够古怪的。所谓“游奕”还好理解，就是巡逻；“踏白”的本义则是“侦查”；而“背嵬”两字是西夏党项语音译，在北宋末年的西北边军中就用来命名“大将的亲军”。岳家军中的“背嵬”更是精锐中的精锐，士卒的选拔是极其严格的：军中进行军士技能比武的时候，将胜出的士卒登记在册。一旦旗头和押队一类的低级军官阵亡，则迅速以这些优秀士兵补充进去。这些被登记了的勇卒之间也会经过

多次选拔并决出优胜者来，一旦各级将官有伤亡需要补缺，则再从这些优胜者中进行选拔。这些人都有可能进入背嵬军。但凡进入背嵬军编制的士卒便享受到与岳家军各级统制相同的尊重，犒赏也异常丰厚。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背嵬军”往往被作为突击队或敢死队使用。

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背嵬军、游奕军和踏白军是当时南宋屈指可数的骑兵部队！岳家军的骑兵主要装备有长、短刀，约十支短弩，二十支硬弓弓箭、围盔和铁叶片革甲。仅背嵬军就有八千余骑（背嵬军另有万人步兵），三军加起来竟有二万多骑兵！在宋代以往的战争中，由于骑兵孱弱，宋军面对北方民族的铁骑冲击时往往只能被动挨打。但在绍兴六年（1136年）八月，岳飞第二次北伐，兵进伊洛，夺取了伪齐政权的一个马监，缴获战马一万多匹；在同年十一月，岳家军又从伪齐那里俘获战马四五千匹。这缴获的约一万五千匹战马，加上以前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曾拨给岳家军的少量战马，使得岳飞建立了一支当时南宋各军无与伦比的骑兵。岳飞本人就善于骑射，素有“勇冠军”之名，他亲自教导，让将士熟练掌握射技枪法，此等精兵，自然非同小可。也正是有了这支骁勇善战的骑兵部队，使得“岳家军”成为南宋初年，宋军之中唯一的进攻性力量！

要维系部队的战斗力，钱、粮、衣料、军器的后勤供应必不可少，何况岳家军十万大军之外还带着几十万家眷，给后勤带来的压力不亚于一场大规模战役，单是军粮就常使岳飞乱了方寸。绍兴八年（1138年），岳家军的日常开销已是“月用钱56万贯，米七万余石”，军马的饲料等开支还不计在内。钱粮之外，军器的供应也不是个小数目，同样是绍兴八年，看看枢密院发给岳家军“自造军器”的原料清单， 我们就明白岳飞要驾驭的复杂财政局面：铁甲叶近70万片，牛角6300多只，生黄牛皮9100余张，牛筋400多斤，生羊皮1万8千多张，箭笴（杆）18万5千只，翎毛51万堵，条铁7694斤！农民出身的岳飞深知民间疾苦，每次调发军饷均面沉如水，感慨“东南民力耗弊极矣”，激励士卒“大功未成，何以报国！ ”

结局：前所未有的大捷

岳家军用战场上的行动证明，自己并不是靡费公帑的无用之师。

岳飞向来反对消极防守，主张积极进攻。当绍兴十年，金人悍然撕毁和议大举攻宋时，岳飞随即针锋相对，将10万大军分成奇兵、正规军和留守部队三部分，呈梯次配置，主动发起战略进攻。奇兵是深入敌后的游击部队，骚扰敌人后方，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正规军是担任正面战场的主力部队。后方留守部队包括全体水军，岳飞为稳固后

方，派岳家军接管了直到江西路江州、江东路池州（今属安徽）的江防，以拱卫长江中下游的安全。

岳飞开始战略进攻时，在西方，派出一支部队切断金兀术与西线陕西战场的撒离喝部金军的联系，护卫岳飞主力军的侧后。在东部，岳飞亲自统率重兵，向辽阔的京西路（今河南大部、陕西、湖北局部）平原地区疾进。同时，派出前军统制张宪和游奕军统制姚政，率部驰援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刘光世所部。整个兵力部署也呈两翼展开，中央突破的战略态势。岳飞战略反攻步骤是，由南向北逐次推进，扫荡开封外围敌军，进克开封，随后渡河收复河北失地，然后直捣黄龙府。六月初，岳飞部开始战略反攻之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席卷京西，兵临大河，胜利地完成了扫清开封外围的第一步战略任务。

金军不甘心失败，经过一个半月的休整，倾巢而出，企图利用宋分兵攻占州县之机奔袭岳飞宣抚司驻地郾城，摧毁宋军统帅机构，打破岳飞的战略进攻，双方决战由此展开。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此次战略决战是由郾城（今属河南）和颍昌（今河南许昌）两次大捷中的一系列战斗组成的。

在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八日的郾城大战中，金军精锐骑兵“铁浮图”和“拐子马”气势汹汹而来。“拐子马”是宋人对金军主力两翼骑兵的称呼，用以对敌军实施迂回包抄而后突击。他们纪律严肃，作战勇敢顽强，每个骑士都有副马换乘，以保证作战时的机动性。其装备有格斗型冷兵器（马刀和狼牙棒）与弓箭，既能作为骑射进行远距攻击，又能作为突击力量近距搏杀。这种骑兵，马匹和骑手都有一定的防护装甲，同时兼顾轻捷灵活的要求。而“铁浮图”军则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也称铁塔兵，“铁浮图”形容重甲骑士装束得如同铁塔一般。“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推进的时候如同一面铁墙。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主要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由于古代重甲十分昂贵，不可能大规模装备，而重骑兵在承受铠甲重量的同时，还要进行战斗，这就要求骑士必须拥有超人的体魄，所以“铁浮图”堪称金军精华中的精华。

但岳家军的“背嵬军”、游奕军的骑士就硬是与金国引以为骄傲的骑兵展开正面对决！在平原旷野上驰突，正是女真骑兵的长技。郾城会战中的岳家军不可能依托山险，也没有凭借城垣，而是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平原地区进行骑兵会战，这在宋金战争中尚属首次！经过严格训练的岳家军骑兵顶住了金军骑兵的攻势，猛将杨再兴

甚至杀入金军阵地，险些活捉金兀术。

随后，岳飞下令步兵各持一种叫“麻札刀”的长柄刀上阵，弯腰低头，专砍马足。这个战术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需要巨大的勇气，一击不中的话，金人骑兵已到身前，因此在宋金战争史上，仅有岳家军等几支军纪严明的部队才有能力采用。从午后战至黄昏，岳家军步骑配合，令金军人仰马翻，遗尸数千。金军的一万五千多精锐骑兵在遭到重大杀伤后狼狈溃退，金人海上起兵以来，都是靠着“铁浮图”和“拐子马”取胜，却在郾城一仗一败涂地！连金兀术都为之大恸。

一周以后的颍昌之战，守城的不到三万的岳家军面对的是金军骑兵三万、步兵十万的进攻，又是岳云亲率800“背嵬”骑兵冲入敌阵，岳家军步兵从两翼护卫骑兵攻击金军。血战几十回合，岳家军人、马皆被鲜血染红，却没有一人回头；时至正午，作为预备队的岳家军的踏白与选锋两军出城投入战斗，金军立时阵脚大乱，全军溃败。岳家军大获全胜，歼敌五千，活捉金军大小头目78人，俘虏金兵2000余人，缴获战马3000多匹。金军副统军粘汗孛堇身受重伤，抬回开封府后死去。

两战之后，金军已被打得闻风丧胆，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慨叹。金兀术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天的南军（指岳家军）的“勇锐”如同当年的我军（金军）；今天的金军的“怯懦”就像昔日的宋军！对此，作为金军主帅的金兀术已经无计可施，准备收拾残部退回黄河以北。这是岳家军兵势的最高峰，也是整个南宋时代兵势的最高峰！

在宋金战争中，宋人面对的是经历了白山黑水间半渔猎半农耕严酷生活锻炼的金军骑兵。当时的金军作战极其顽强，军令严酷，一旦开战打个一整天是家常便饭，他们的口头禅就是打不满一百回合也能算骑兵？而同时期的宋军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往往在半天之间即可分出胜负。当时吴玠在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刘锜在顺昌取得的胜利都是以防守取得成功，吴玠凭借山地的有利地形，刘光世也有城墙可以利用，而岳家军是在利于发挥骑兵优势的河南的平原旷野上与金兵野战两次大胜，以寡击众，克敌之长，开创了在平原野战中以进攻手段战胜金骑的先例！给了金军主力以毁灭性的打击。

收夺兵权的牺牲品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岳家军在战场上取得的成功越大，距离自身的悲剧性的终结也就越近。宋高宗对岳飞北伐的态度是一怕大败，二怕全胜。大败则会有灭顶之灾，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大胜则岳飞

功盖天下，威略震主，也不堪设想。数十万中原豪杰所揭义旗并不是“宋”，亦不是“赵”，而是“岳”，也不得不让南宋统治者感到震撼。更何况宋廷之内，还有一个当时就被人看成“细作”宰相的秦桧！

因此，在岳家军乘胜追击，燕京（北京）以南，金朝号令不行，金廷对战争的信心完全丧失，下令将燕京所藏珍宝北运，打算放弃全部宋地的时候，南宋朝廷却下达了退军的命令，使岳家军将士们的百战心力完全归于虚掷。如果不是被迫班师，宋军完全可以进抵汴洛控制黄河一线要点，这将会对南宋进一步北伐奠定良好的基础。

当时的金国将领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而称其为“岳爷爷”，得知岳飞死讯后，他们个个喝酒相庆；几十年后的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 1206年），金章宗写诏书招降南宋四川守将吴曦时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你自己评价一下自身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这样的威名战功，宋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吗！足见岳家军的战力与威名，就连敌对的金国君臣也不能不承认。

岳飞的冤狱之后，昔日岳家军在战场上取得的赫赫战功，被秦桧一党把持的宋廷刻意抹去。乾道二年（1166年）也即宋高宗禅位太上皇、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四年，仍旧秉承赵构意志的南宋朝廷评定了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里面把杨沂中败伪齐刘猊之类微不足道的小胜都算上，独独没有岳家军的郾城和颍昌两大捷！更滑稽的是，当年对于“十三处战功”之内的刘光世顺昌之战，宋廷赏赐十四万贯，尚不及“排不上号”的郾城之战的二十万贯！甚至宋孝宗后来为岳飞冤案平反时，南宋朝野上下都一致认为岳飞功居第一，但这只是凭朝野传闻及众人的回忆和印象，而在由秦桧党羽编写的南宋官修史书中却无法查证，于是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通过岳家军尚存的故将遗卒的回忆讲述来了解岳飞的事迹！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战功，被秦桧及其党羽湮没到了何等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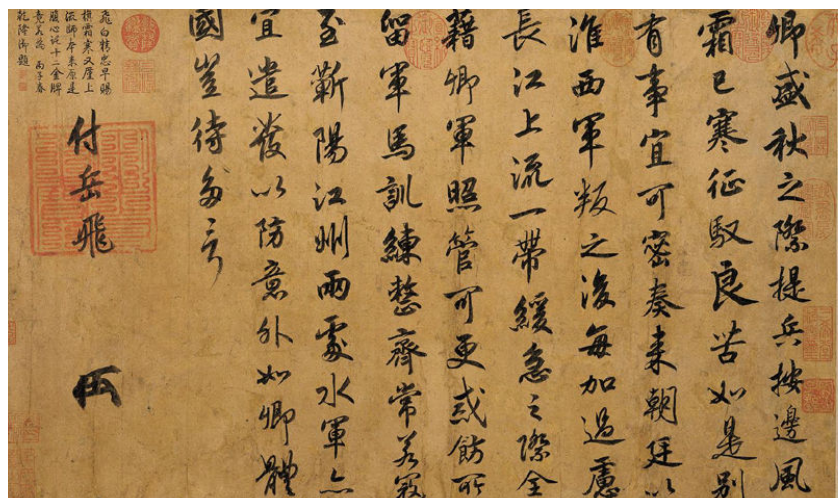
岳家军也在宋廷随之而来的清洗中不复存在，尽管这支英勇之师的骨血仍然存在于鄂州驻军之中，宋孝宗时的鄂州都统司仍有兵员四万九千人，多为岳家军旧部。所幸天道轮回，报应不爽。随着时光的流逝，“行营后护军”之类的正式番号，早已湮没在历史之中；张家军、韩家军之类的习惯称呼，也早就为人所遗忘。唯有赵构秦桧君臣顶顶憎恶的“岳家军”一词，却能够流传千古，独享盛名！相反，昔日作恶之人如今仍跪于西子湖畔岳王庙前，时时受人唾骂，亦不能赎罪于亿万之间。

其实不懂领导的心难逃一死的军事强人

作 者:纪彭







绍兴十年（1140年）盛夏的一天，身在临安的高宗接到岳飞的捷报。中原大捷，高宗自然是非常高兴，他立刻召见了宰相秦桧商议下一步的计划。当时高宗的心情可想而知，大宋朝受了金国多少年窝囊气，想到当初自己被金军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好几次逃亡海外！现在，终于熬出头了。高宗肯定还会想，要是真能收复幽云十六州，完成太祖、太宗的遗愿，那自己就真是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了……

高宗把岳飞大捷的奏报递给秦桧，准备听取秦桧的意见。没想到秦桧面无喜色，反问了高宗三个问题，就这三个问题，不但把高宗说愣了，也断送了岳飞的性命。

秦桧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岳家军真能消灭金军吗？”高宗陷入沉思。确实，金军的强大是高宗领教过的，宋军的软弱也是高宗亲眼所见，这才几年工夫，岳飞就能把金军彻底消灭了？这确实叫人起疑。当时，岳家军确实取得了一些胜利，并罕见地在平原上以骑兵对阵决战的态势击败金军。不过，金兵的损失也没有到一败涂地的地步。正当高宗陷入沉思时，秦桧的第二个问题到了：“您还记得前两年的淮西兵变吗？”这个问题勾起了高宗的思索，绍兴七年（1137年）三月，刘光世提出退休，他所带领的淮西军各部互不隶属，矛盾日显。朝廷无法驾驭，最终刘光世旧部叛变，大肆掠夺，掳走庐州官员、眷属、百姓共二十万投降伪齐。不过，高宗可能还会想，“岳飞忠心耿耿，不会投降吧？”秦桧的第三个问题来了：“太祖皇帝龙兴之前也是个忠臣吧？”高宗心里“咯噔”一下。这时，秦桧提出“见好就收”，趁

着宋军占了一点优势，赶紧和谈。高宗想到自己从登基到现在没过过一天太平日子，才三十多岁已经有了白发。思索到这里，高宗下了决心——和谈。

想明白了的高宗想和谈，战场上吃了亏的金兀术也想和谈。最终双方达成了“绍兴和议”，宋金两国边境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

第二次杯酒释兵权

“绍兴和议”达成后，高宗皇帝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武将没有用了。怎么处理呢？这就要回顾一下大宋朝的立国传统。

当初，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夺得帝位。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立即执行了罢功臣、释兵权、制将帅、立兵制等一整套政策。解除节度使的行政权、财权与兵权，并从体制上限制军人，使兵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

在宋帝国的体制中，枢密院是全国主管军政事务的最高机关，中书省是主管全国行政事务的最高机关，并称东西二府。尚书省设有一个兵部，在理论上讲，兵部的权力很大，差不多相当于今天国防部。但实际上，宋代的兵部形同虚设，顶多是个文书转移上通下达的文牍机关而已。兵权掌握在枢密院。另外设有“三衙”，即“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负责管理全国军队。

这样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有调兵权，没有管辖权；三衙有管辖权，没有调兵权；最后，对部队有实际指挥权的统兵官由皇帝临时任命。与此相应的是大宋帝国执行得相当彻底的重文轻武、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

自从“靖康”以来，在金军的打击下，宋朝的正规军已经土崩瓦解。中兴四将所领导的部队是在后来近十年的抗金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南宋政权在生死线上苦苦支撑，没有必要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实行“以文制武”。一切都在适应战争的需要而自然成长。如今，和议已成。高宗就开始着手恢复“祖制”，处理武将。高宗的第一步棋是“明升暗降”。此时，中兴四将中的刘光世已经出局，还剩岳飞、韩世忠、张俊三人。高宗下旨：“岳飞、韩世忠、张俊入朝，封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同时，撤销了三个宣抚司。等于是把三个大军区司令员都晋升为国防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这就把三个人的兵权夺了。从此“遇出师临时取旨”，将调兵权收归朝廷。

在强行剥夺三大将兵权的同时，又先后压缩各路大军编制，将行营护军的番号改为御前诸军，并且将各路大军拆散肢解，化整为零。由过去的四路驻屯大军，改编为十路驻屯大军。于是，高宗很顺利地完成了第二次杯酒释兵权。

高宗虽然夺了岳飞、韩世忠、张俊的兵权，但仍然不放心，很难保证这些大将在兵权被夺后不会心生怨望，而他们在自己老部队中的号召力也不可低估。张俊发现皇帝要动自己，马上交权，还跑到秦桧那里表忠心。史载，张俊“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韩世忠则跪在高宗面前大哭，脱下衣裳给高宗看自己的伤疤。从此，他闭门谢客，绝口不谈军事，居家数十年，淡薄自如。按说都是有功之臣，张俊、韩世忠过了关，岳飞怎么就过不了关呢？朱熹有一个观点：韩、张二人在苗刘兵变中有救驾之功，和高宗关系较紧密，而岳飞相对疏远一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宗对岳飞的猜忌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一开始，高宗对岳飞还是信任的，觉得张俊、刘光世贪图富贵，只有岳飞是真心抗金，高宗曾在寝阁中接见岳飞，曾许诺全国的军队除了张俊和韩世忠，其余都归岳飞节制。但岳飞是行伍出身，缺乏政治经验，不懂揣测皇帝心思，对高宗的容忍度有所高估，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撂挑子威胁皇帝

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收复襄阳六郡后，高宗封岳飞为节度使，又封他为武昌开国子。之后，岳飞平定伪齐，高宗又加封岳飞为太尉衔，位列三公。高宗召见岳飞，问“中兴大计”。岳飞答道：“臣伏自国家变故以来，起于白屋，实怀捐躯报国，雪复国耻”，高宗听了十分满意。岳飞还说，除了“收复失地”，还要“迎回二圣”。有一种看法，高宗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二圣”，而“徽钦既返”，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了。

不过，徽宗死讯传到江南后，岳飞也改了口，不提钦宗，只说“奉邀天眷归国”，而北伐成功是为拥护高宗“高枕”无忧地当皇帝。学者王增瑜就认为：“迎二圣”并不是岳飞和高宗发生矛盾的症结所在。

两人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大概是绍兴七年。当时，刘光世放弃兵权，高宗想叫岳飞指挥刘光世的淮西军。这遭到了时任宰相张浚和刚刚出任枢密使的秦桧的反对，理由就是防范与裁抑武将。事实上，防止武将坐大的问题已经被提上日程。只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无法落实。

高宗很清楚“不可能一边限制和得罪武将，一边要求他们奋力保卫自己。”张浚与秦桧认为，即便暂时不能限制武将，也不能主动帮助武将坐大。他们提醒皇帝：让一员武将掌握过大的兵权，一旦此人功盖天下，便悔之莫及了。高宗听后深以为然，当即给岳飞另外写了一份手诏，告诉他：合军一事，“颇有曲折”，委婉地取消了成命。张浚又去找岳飞谈话，装作征求意见的样子，问岳飞对于让刘光世的部将统领淮西军的意见，等于是拐弯抹角地告诉岳飞事情起了变化。岳飞据实相答，认为张浚的人选在能力和性格上都有缺陷。张浚又问张俊和杨沂中，岳飞又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张浚按捺不住，一句很伤人的话冲口而出：“你的意思是非你不可。”岳飞答：“难道我是图谋这支部队吗？”两人就此闹翻，此后，张浚多次上奏皇帝，坚决弹劾岳飞说“处心积虑地就想兼并别人的部队”。

岳飞的举动更是把皇帝推向了张浚一边。得不到淮西军的指挥权，他擅自躲到庐山为亡母守孝，不理军务。这就等于跟皇帝摊牌，以撂挑子要挟天子。由于军事形势所迫，高宗没法发作，只好压住怒火。他给岳飞最主要的助手参谋官李若虚和统制官王贵二人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让这两个人前往庐山请岳飞还军。岳飞闭门不见。李若虚反问岳飞：“你有什么资本不服从朝廷的命令？朝廷怪罪下来的话，就是咎由自取。你原来就是一介草民，皇帝不嫌你出身微贱，不到十年就把你从士兵升到太尉，你这样对得起皇上吗？你对得起朝廷吗？你不想收复中原吗？你辞了官，没了兵，如何抗金啊？再说，我俩追随你多年，现在奉旨请你下山，如今我们怎么回去复命？皇上不敢杀你，我们俩可就完了。” 这一番话很有可能就是高宗深藏在心底，想说而没有说的话。

岳飞下山之后给高宗写了一道请罪奏折。高宗也说了一番看似不软不硬，实则杀机四伏的话：“对于你这一次的轻率举动，我并没有生气；要不然，必有惩处。这就是太祖所说的：犯吾法者，惟有剑耳。之所以还让你统领部队，把中兴大业托付给你，就是因为我没有生你气的意思。”

回去之后岳飞就整军经武，准备多立战功，扭转高宗对他的恶劣印象。高宗也表现得很大度，说：“恢复之事，朕未尝一日敢忘于心。”叫岳飞好好打仗，收复中原。可实际上，君臣关系已经出现了严重裂痕，再难修复。

建言立储，屡犯大忌

这年八月，岳飞又捅了一个天大的娄子。岳飞觐见皇帝，在汇报完各项工作之后，拿出一份拟好的奏折，奏折的意思是“建议皇帝立

建国公为太子。”世人皆知，高宗没有生育能力，但他才三十多岁，正值壮年，还存着个自己生儿子的念想，岳飞把这事提出来，皇上能不生气吗？高宗的涵养还不错，没有发作，只是说：“这种事不是这个领兵驻外的大将应该说的，你退下吧！”

岳飞提出此事的出发点还真不是干预皇室内部事务，还是为了他的北伐大计。当时，岳飞听说金人准备立宋钦宗的儿子为帝，建立傀儡政权。毕竟，相比高宗而言，钦宗才是大宗。岳飞建议中所说的“建国公”是宋太祖的嫡出后代，相对于宋太宗之后的钦宗而言，更是大宗，此举可以排除钦宗对高宗皇位合法性的威胁。虽说是一心为国，但是，岳飞插手中央政治，管到皇位的继承人人选，这在宋代绝对是个极大的忌讳。南宋初年国家动荡，干戈不息，需要军人出力保家卫国，压制武将的情形虽然有所好转，但是大体上对武将的防范之心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其他三位将领，像张俊、韩世忠和刘光世都是只管埋头军务，很少插手中央政务，当然也没有建立像岳飞那么大的战功——偏偏岳飞做了那出头鸟，直接插手皇家最核心的皇位继承问题——这怎么可能不引起高宗的猜忌呢？

当时，岳飞的“岳家军”有十万之众，兵力最强，财力最厚，名义上是王师，实际上是自己的私家军，各级军官对岳飞本人的忠诚度比对朝廷还要高，潜在的隐患很大。据南宋枢密院机密文档透露：南宋朝廷多次向岳家军派遣监军，都被岳飞以各种理由阻挡，只好派遣卧底人员进入岳家军，后来这个卧底凭着自己的本事做到了军需官，统筹粮饷，受到了岳飞的重视。在一次饮酒闲谈之中，岳飞自比曹操。他还要求高宗给他添兵，被高宗拒绝——北伐是不是扩充势力的旗号？疑问已在高宗心里根深蒂固。甚至岳飞礼贤下士，留心翰墨，也让皇帝疑神疑鬼。

不仅如此，岳飞还在政治宣传上另搞一套。那时，南宋出师北伐的目的是收复失地，在政治上并没有明确提出要“迎回二帝”，可岳飞却大张旗鼓宣传“直捣黄龙，迎回二帝”，岳飞自己这么说说也就算了，他还命令军中乐师谱曲，在岳家军中广为传唱，大造声势。更叫高宗不能接受的是，岳飞不听朝廷的训令扩编军队，还依仗武力向驻地富豪大户征粮征税，对地方财政税收横加干预，以抗金之名，私自截留地方财税为己有。岳飞的“岳家军”在高宗眼中，已经近乎于唐末五代的藩镇。

所以，在“绍兴和议”之后，张俊、韩世忠乖乖地俯首求饶，都过了关，就是岳飞不能过关。还有史料记载，在双方暗中和谈时，兀术曾给秦桧寄信：你天天求和，但是岳飞却意图北伐，况且他杀了我的女婿，此仇不可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在颖昌之战中，

兀术的女婿被岳家军所杀，许多学者相信这封信确实存在，对岳飞的被杀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王夫之看来，高宗解诸将兵权急于议和，而秦桧为了坚定地推行议和方针必须解诸将兵权，岳飞在解兵权和议和两个问题上都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君权与相权在这件事情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岳飞也就难逃一死了。

秦桧给岳飞罗织了三条罪名。第一条罪名，说岳飞在军中抱怨，国家没救了，皇上不修德。这叫“指斥乘舆”批评皇帝。第二条罪名，岳飞在撤军时问张宪：“这天下事应该怎么办啊？”张宪回答：“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第三条罪名，岳飞跟张宪说：“我跟太祖爷一样，都是32岁当节度使。”这三句话连起来听，具有无限的解读空间。历史学讲究“剪刀＋糨糊”，秦桧对此自是熟稔，把这三句话黏合在一起就是——岳飞想取而代之。

岳飞真的要取而代之吗？在押解回杭州的路上，经过岳家军的驻地，不少岳家军将领到驻地来见岳飞，声泪俱下，劝其“自保”。岳飞一拍桌子说：“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我不负朝廷”，把手下人全轰了出去。

高宗派御史中丞何铸主审岳飞。何铸说：“有人告你谋反。”岳飞二话不答，衣服一脱，背上四个大字“尽忠报国”。何铸审了几天没有结果，觉得这案子没法审，反而为岳飞辩诬，叫秦桧另请高明。秦桧换爪牙万俟卨上阵，也审不出结果。岳飞在狱中以绝食相抗，并不自诬。最终高宗下旨处死岳飞，这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刑部、大理寺提议，“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云私罪徒”，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乃多差兵将防护。”本来秦桧和万俟卨以刑部、大理寺名义上状，想留岳云一条命，但高宗没有手下留情。

什么叫“莫须有”

高宗与宋太祖不同：太祖有大智慧，很少耍小聪明；在冲锋陷阵中形成了威望、自信与才干，对再能干的文臣武将基本能够收发如意、摆布自如；或者换句话说，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军阀，因此并不惧怕那些小军阀。高宗虽号称“中兴之主”，但还是凭着皇家正宗子孙的血脉登上的皇位，意志与毅力相当脆弱，远远说不上强悍；特别是由于缺少军事才干，没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厮杀的经验与阅历，没有由此建立起来的威望与自信，于是，在内心深处，对军人可能的尾大不掉、拥兵自重充满恐惧。

八年前护卫亲军的叛乱，眼前的淮西兵变，都在提醒他，杯酒释

兵权的道理。以史为鉴的南宋君臣恐怕也知道，像他们这样跑到江南去“中兴”的政权此前也有一个——东晋，当年无论是篡位失败的桓温还是成功禅代的刘裕，都以北伐作为积累政治资本的手段。如果岳飞真要收复失地，那可是再造宋室的不赏之功。

史书记载，岳飞蒙冤时，韩世忠闯进相府见秦桧：“岳飞到底有什么罪，你要害他。”秦桧回答：“其事莫须有。”人们想象中，韩世忠拍着桌子问秦桧：“你这么做自毁长城，过得去吗？”秦桧哆哆嗦嗦地说：“可能有吧。”实际上，此时的秦桧圣眷正隆、大权在握、有恃无恐，懒得跟韩世忠废话，他以反问、诘问口气说“难道没有吗？”一句话就把韩世忠给打发了。

岳飞必须死，罪名是否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乃上意也”。

史书记载说，判决公布后，“天下冤之”，众多士民为之下泪。行刑当日，杭州城凄风苦雨，整日不绝。

链接： 南宋五大主力军（绍兴五年）

韩世忠部为行营前护军，兵力八万人，以淮东楚州就是今天的江苏淮安为大本营；

张俊部为行营中护军，兵力八万人，以建康即今日南京为大本营；

刘光世部为行营左护军，兵力五万二千人，先后以池州即今日安徽贵池和庐州即合肥为大本营；

岳飞部为行营后护军，兵力十万人，以鄂州即今日武昌为大本营；

吴玠部为行营右护军，兵力七万人，以兴州即今日陕西略阳仙人关为大本营。

从平反到神化岳飞是如何走上神坛的

作 者:杨津涛



還我河山





如

果在中国搞一个古代英雄的评选活动，相信岳飞一定会高票入选。从还没上学的小朋友，到七八十岁的老大爷，不会有谁没听说过岳飞的名字。或许自明清以来，岳飞就是英雄的代名词。

易中天在《品三国》中曾指出，著名的历史人物都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历史的岳飞是抗金名将，文学的岳飞是忠臣孝子，民间的岳飞则是华夏武圣。岳飞从一个被冤杀的大将到一个被追捧的忠臣，再成为被老百姓津津乐道的传奇英雄，其间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变。

岳飞封王与秦桧改谥

岳飞被杀是在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年），此后二十年间，这位抗金名将都是以阴谋造反的叛臣形象出现在史书上。在赵构做皇帝的最后一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下侵宋，举国上下又想起了当年震慑敌胆的岳飞，有大臣趁机上书为岳飞鸣冤。高宗不得已下诏恢复岳飞家属的行动自由，流放岭南的岳飞一家被获准北返。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宋高宗禅位给养子赵昚，是为宋孝宗。当年七月，有志于恢复中原的孝宗就给岳飞“追复指挥”，十月“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恢复岳飞官爵在事实上是为其平反，但因为制造岳飞冤案、于孝宗有大恩的高宗还在世，所以孝宗在相关诏书的用词上很含糊，说岳飞被杀是所谓“坐事以殁”，至于犯的什么事则闭口不谈。参与杀害岳飞的人，秦桧还享受着申王的爵位，张俊更获得配飨高宗庙的殊荣。

孝宗即位的第十六年，岳飞被赐谥“武穆”，所谓“折冲御侮曰武，布德执义曰穆”。原来大臣们给岳飞议定的谥号是“忠愍”，然而“忠”字意味岳飞未造反而被杀；而“愍”字有让人怜悯的意思，容易让人联想起岳飞死因，所以被孝宗否决。承认岳飞抗金功绩是孝宗的底线，他从没想过为岳飞洗刷冤屈。

孝宗在战场没取得什么胜利，早年的雄心壮志很快消磨殆尽。一直到宁宗朝，权相韩侂胄为建功勋，力主北伐，又要借用岳飞的声誉振奋人心。嘉泰四年（1204年），南宋“中兴四将”一同被追封为王，其中岳飞为鄂王，同时剥夺了秦桧的王爵，将其谥号由至高无上的“忠献”改为“谬丑”。韩侂胄主持的开禧北伐在短暂胜利后很快失败，金国给南宋开出议和条件：杀韩侂胄。还没等韩侂胄整军再战，他就被阴谋夺权的史弥远给割了脑袋。秦桧爵位、谥号又被恢复。

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金国在蒙古的攻势下已处于亡国边

缘，宋廷又将岳飞谥号升格为“忠武”。落实到这一个“忠”字上，岳飞案才算被彻底昭雪。

粉丝群：从朱元璋到努尔哈赤

宋亡后，蒙古统治者一面在岳飞原有名爵的基础上，加赐他为“保义”；一面整修岳飞的陵墓与庙宇。朱元璋起兵时打出的旗号是“驱逐鞑虏”，自然对前辈岳飞大加推崇，称他为“宋少保鄂国武穆王”。洪武九年（1376年），岳飞被列为历代三十七名臣之一，配享宋太祖庙。每年岳飞忌日，朝廷会派使者到岳庙祭奠。

明朝灭了元朝，但没能让蒙古人臣服。蒙古瓦剌部生擒明英宗，兵临北京城下。于谦拥立景帝，保住了首都。后来英宗复辟，杀死于谦。于谦的命运和岳飞很相似，立有大功，却被冤杀。 明朝士大夫和老百姓纪念岳飞，也有怀念于谦的成分。

正德八年（1513年），不知是什么人想出的主意，岳庙前立起秦桧、王氏、万俟卨三人的铜像；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又加上张俊，把四人一起用质地更为坚硬的白铁铸成跪像，从此有了那句“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话。万历年间，女真部族露出反叛明王朝的苗头，明神宗惦记起当年的抗金英雄，称岳飞“精忠贯日，大孝昭天”，封他为“三界靖魔大帝”。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努尔哈赤也是岳飞的仰慕者，传说他因此将两个孙子改名为岳托和岳乐。清朝定鼎中原，并没有清算与老祖宗为敌的岳飞，顺治时重修杭州岳庙，后又几次扩建，雍正亲题“碧血丹心”。以翻案为乐的乾隆几次亲临岳庙，赞赏岳飞是“百战兵威震一时”。清政府不好公开贬斥岳飞，能做的就是通过单方面抬高关羽，来间接地抑制岳飞的地位，使关二爷代替岳武穆做了唯一的武圣。

革命党反清时也顺理成章地抬出岳飞做偶像，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推动关岳合祀，将岳飞的地位再次与关公拉平。抗战期间，岳飞是反击侵略的英雄；到了内战，岳武穆又因为平定过钟相、杨幺，成了剿匪能人的代表。1949年后，评价标准全部颠倒，镇压农民军当然成了大罪，岳飞墓也在“文革”中被捣毁。

简单地梳理岳飞从被平反到被尊崇的过程后，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国家安定的时候，政府将岳飞立为忠君爱国的楷模；一旦遭遇了外敌侵略，岳飞就是鼓舞人心的灵丹妙药，会被统治者一再追封。

神化始于岳飞后人

官方追捧岳飞是出于政治目的，民间神化岳飞则是单纯对英雄的崇拜。

岳飞被杀后，秦桧主掌南宋政权十五年，他让儿子秦熺负责修史，将官史中关于岳飞的内容做了大量删改，导致史料残缺不全。一个鲜明的例子是，著名的朱仙镇大捷是确实存在的，还是后人编造出来的，至今学界没有定论。

首先着手整理岳飞史料的是其三子岳霖。淳熙五年（1178年），孝宗召见岳霖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 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之。"岳霖不由哭倒在地："仰蒙圣察抚念，故家臣不胜感激！"岳霖趁机向孝宗讨还了一批与岳飞有关的诏令、文稿等原始资料。岳霖官至兵部侍郎，死前给儿子留下遗嘱："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冤，吾死瞑目矣。"岳珂秉承父志，编成《鄂国金佗粹编》和《鄂国金佗续编》。岳飞被追封为鄂王，所以称鄂国；金佗是岳珂在嘉兴做官时住的地方。

岳珂这两部档案汇编的史料价值毋庸置疑，但因是后人记先人，具有家传的性质，少不了有所溢美。为《金佗粹编》和《续编》做过点校的王曾瑜先生即说，"岳珂本着强烈的孝子慈孙之心，对祖父的事迹不免有虚美的成分，其史笔也有不少错讹与疏漏。"如岳珂在编书时刻意忽略掉其他抗金将领，把功劳都安到了祖父头上，而且讳言岳飞打过的败仗。如果说此前朝廷还只是对岳飞事迹进行重新肯定的话，那从岳珂开始，民间神化运动就逐步启动了。

元朝时脱脱主持编著《宋史》，里面的《岳飞传》全盘抄自岳珂著作，让私史上升为正史，岳飞作为南宋中兴第一名将的地位就此确立。以宋室皇族身份降元的赵孟頫也有一首著名的《岳鄂王墓》，说到"岳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而在南宋诗人那里，如杨万里《初入淮河四绝句》中只有"刘岳张韩宣国威，赵张二相筑皇基"这样的句子，不会独尊岳飞。

说书人让岳飞深入人心

在南宋文人的笔记中，如《齐东野语》"岳武穆御军气"、"岳武穆逸事"的内容大体还是有所本的，到《夷坚志》已说岳飞是"猪精"转世，所谓"君乃猪精也……然猪之为物，未有善终，必为人屠宰"，以神话预示岳飞注定的悲剧命运。岳飞被平反后，民间评话就有了岳飞故事，但那时"张、韩、刘、岳"是一起说的，岳飞仅是排在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后的名将之一。元朝文人创作杂剧时就不再回避杀岳凶

手的问题，故事将矛头对准秦桧，安排了秦桧在阴间被审的情节，岳飞在民间的形象，从此不仅是战场上的忠臣，更是被冤杀的悲剧英雄。

明朝是戏剧、小说这些市民文学的鼎盛时期，出现了讲述岳飞故事的剧目《宋大将岳飞精忠》《岳飞破虏东窗记》《精忠记》和《精忠旗》等十二种。在《宋大将岳飞精忠》中，岳飞不再是“中兴四将”之一，而是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的统帅了。

第一部以岳飞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也在此时诞生。这部小说是在《三国演义》成为大明畅销书后，“忠正堂”书店的老板熊大木看有利可图，就自己充当写手，推出的一部跟风山寨书。熊大木在可靠史料的基础之上，兼采各种野史段子，把一个通俗化的岳飞呈现给了他的目标读者——“愚夫愚妇”。在小说的结尾，秦桧等杀害岳飞的元凶下了地狱，“披发裸体，以巨钉钉其手足于铁床之上，项荷铁枷，举身皆刀杖痕”，万世沦为畜生。

清朝时，岳飞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已经被演绎得差不多了，文人再想要从这个题材上出新，就必须自己来做原创内容。也许很少有人想过，古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大都属于“YY（意淫）小说”之列，《杨家将》里宋军大胜辽军、《万花楼演义》里宋军大败西夏不必说，连《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也能打得辽国人落花流水。《续精忠》说岳飞之子岳雷和牛皋之子牛通后来杀秦桧报仇，《如是观》说岳飞率军直捣黄龙府，迎还二圣。

钱彩的《说岳全传》将以上这些戏剧、话本融合到一起，使之成为神化岳飞的集大成者。《说岳全传》全称《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这部小说想告诉人们的就是：若不是岳飞被害，一定能把金兀术赶回老家。后面的情节借鉴了《续精忠》，二公子岳雷挂帅大败金兀术。其实历史上的岳雷没有等到父亲平反，就死在了岭南。

小说以如来佛祖讲法开篇，二十八星宿之一的女土蝠因放了一个臭屁，被大鹏金翅明王当场啄死。如来大怒，将大鹏金翅明王贬往凡间，投胎为岳飞；那女土蝠则转世成了秦桧之妻王氏。与此同时，徽宗祭天时不慎将“玉皇大帝”写成了“玉皇犬帝”，玉帝命赤须龙下界投胎做了金兀术，将来祸乱中原。如来遣大鹏下界，其实就是让他降服赤须龙，保住大宋江山。

从第三回开始，《说岳全传》将关于岳飞早年仅有的一些史料进行扩充，虚构出与宗泽谈兵、枪挑小梁王等显示少年英雄的气概。小说的主体是岳飞与金兀术的历次交锋，有学者统计，《说岳全传》中

出现战争十三次，其中于史有据的七次，牛头山救驾、爱华山大战等出于文学创作的战绩，情节上天马行空，强化了岳飞的武圣形象。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岳飞由历史战绩突出的抗金将领逐渐被虚化为战无不胜的保国英雄的过程中，性格中也不再有桀骜不驯的特点，成了后世“愚忠”的典型。《说岳全传》里，岳飞在朱仙镇明知回京后吉凶未卜，还是毅然奉诏，就是最直接的表现。

从“尽忠报国”到“精忠报国”

新编电视剧《精忠岳飞》在各卫视、乐视网等处热播，饰演岳飞的黄晓明发微博说“我娘在我背上刺字：尽忠报国”，引来无数读者吐槽。事实上依据《宋史》，岳飞背后刺的字确是“尽忠报国”。网友们潜意识中都以为这几个字当是“精忠报国”，正是岳飞被不断虚构、神化的结果。

《宋史·何铸传》中说岳飞受审时，“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什么人刺的字？没有说。后来的戏剧或小说作者发挥想象，借用了这个情节。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第七回《岳鹏举辞家应募》说，靖康年间天下大乱，有同乡找岳飞啸聚山林，他为表明心迹，就找人在背上刺了“尽忠报国”四个字。

“精忠”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岳珂编的《鄂王行实编年》上，因岳飞剿匪有功，高宗御赐了一面书有“精忠岳飞”的“锦旗”。冯梦龙改定的《精忠旗》就是以这面旗为核心，叙说岳飞的精忠故事。岳飞背上刺的还是“尽忠报国”，不过刺字人是部将张宪。可见到这时为止，“尽忠”和“精忠”还是两回事，前者是背后刺字，后者是皇帝赐旗。

清朝文人创造出了岳母刺“精忠报国”的故事。《说岳全传》第二十二回，王佐代表“通圣大王”杨幺重金招募岳飞，被岳飞回绝。岳母知道后说：“……恐我死之后，又有那些不肖之徒前来勾引，倘我儿一时失志，做出些不忠之事……故我今日祝告天地祖宗，要在你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字。但愿你做个忠臣……”岳母拿笔在儿子背上写下“精忠报国”四字，再用绣花针刻字，最后醋墨涂色。

“尽忠”变为“精忠”，除了音节上的相关性，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郑州大学学者李琳分析说，“‘精忠’代表以帝王为代表的外界评判，‘尽忠’代表岳飞对于自身行为的期许，‘精忠’取代‘尽忠’，说明以帝王言行为代表的官方评价、社会评价以强大的力量、绝对的权威压倒个人的自我评价，最终在历史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从传播角度来看，岳母刺字的故事深入人心，说明大多数人熟知的那个岳飞根本不是以历史形象出现，而是以文学或民间形象被口口相传。

（参考资料：宋浩《论岳飞历史地位的变迁》、徐卫和《岳飞文学形象的多种形态及其文化内涵探究》、杨秀苗《说岳全传＞传播研究》、蒋锡东《岳飞被害与昭雪问题再探》、李琳《“精忠报国”故事源流考辨》等）

编读

伴随着七月热火，本刊记者南下广州，亲历古建拆迁现场、采访相关人士，精心制作“正在消失的老广州”专题，上市伊始，便引起了社会各界热烈关注和回应。在这场老广州保卫战中，我们能做的便是秉持良知，还原真相。借着文字的微薄之力，唤醒岁月赋予一座城市的记忆。

@思宝集团：看了《国家人文历史》这期的《正在消失的老广州》，联想到近年全国各大城市的城建情况，公司高层都颇有感触。在一次会议上，大家纷纷感言，我泱泱中华号称五千年文明史，特别是在代表先进文明的城市，却没能留下多少先民生活的痕迹。现在，无论在哪座历史文化名城，一条石板路，一座老房子都显得弥足珍贵。想找个追思先民的地方，只能到仅存的几处偏僻小城，原本我们应该生活在其中的现在成了凤毛麟角。我们把留存几百年的充满智慧的建筑都拆卸了，制造了平均不足30年寿命的建筑笑话……

我们能给子孙留下什么呢？请尊重身边的历史。

@古粤秀色：金陵台、妙高台事件，不但冲击着广州的历史建筑保护，更惊动了中央，《人民日报》下的《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为此南下。采访相关部门、专家、文保人士，多篇幅多角度分析“建设性破坏”，极具阅读价值。作为广州人，看了之后，百般滋味在心头！

@佘小新Imo：《国家人文历史》“正在消失的老广州”专题，有关古建筑的探索、消失以及拯救。记得小学如师附小边的窄巷，六年间每日走在不平整的石砖路，空气中是潮湿的青苔味，还有双胞胎姐妹住在巷中，玩闹欢笑自然少不了！近日偶然骑车经过，当年光景仿佛重现。原来，留的是古建筑，念的却是我与它的交集。

@MoMo-宁愿金鱼般记性：“有感情就会一生一世吗？”看到封面首先想起这首带有保育皇后码头政治诉求的歌曲，还有歌德那“熟悉你在历史上的根，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以及避免在虚空中飘浮的唯一方式”的名言——今日书报摊上已摆卖好货《国家人文历史》，在里面你会发现好多可爱的人！

@美邦黄红杰：青砖石子路，河边木头屋，三六九的集市，也许只有一起长大的才会懂，这就是与那个时空的交集吧。可惜，被虚荣湮没了。

排行

北方有句俚语，叫做“头伏饺子二伏面”。伏天吃面，这一习俗至少三国时期就已开始了。近日，在首届中国面条文化节上，第一次由专业机构评选出了“中国十大面条”。只是一向红遍大街小巷的阳春面、臊子面竟然意外落选。奥灶面是江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锅盖面被称为镇江三怪之一、片儿川在杭州家喻户晓这些信息，也确实为当地的面条文化正了一次名。依小编看，十大名面口感不一、卖相各异，到底有多好吃，还是依君口味选择了。（排名不分先后）

武汉热干面

北京炸酱面

山西刀削面

兰州拉面

四川担担面

河南萧记烩面

杭州片儿川

昆山奥灶面

镇江锅盖面

吉林延吉冷面

全球航空公司安全等级排行榜

北京时间2013年7月6日，韩亚航班旧金山失事后，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入到飞行安全的问题上来。德国“客机坠毁数据评估中心”曾统计出了自1983年至2012年航空公司安全等级排名，根据收录的178个国家和地区800家航空公司的安全数据，按照飞行每1万亿米死亡人数（事故率）计算得出。其中，芬兰航空、新西兰航空均为“零失事”航空公司；中国台湾的中华航空则在榜单垫底，安全指数最低。

最安全航空公司

1 芬兰航空公司 0.005

2 新西兰航空公司 0.007

3 香港国泰航空公司 0.007

4 阿联酋航空公司 0.008

5 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 0.008

6 中国台湾长荣航空公司 0.009

7 葡萄牙航空公司 0.009

8 中国海南航空公司 0.010

9 澳大利亚维珍航空公司 0.010

10 英国航空公司 0.011

最不安全航空公司

1 中华航空 8 755

2 日本天马航空 6 336

3 印度航空 3 329

4 葡萄牙高尔航空 1 154

5 大韩航空 9 687

6 沙特航空 4 310

7 土耳其航空 6 188

8 泰国国际航空 5 309

9 南非航空 1 159

10 瑞典北欧航空 5 110

最容易出事的飞行阶段

地面 11%

起飞 10%

爬升初段 6%

爬升 6%

巡航 11%

下降 4%

初步接近 14%

最终接近 16%

着陆 20%

外刊

智慧之光曼德拉

纵览历史，总有一些非凡人物吸引世界的目光，纳尔逊·曼德拉就是其中之一。今年7月18日是他95岁生日。他的一生是坚持勇气、意志和追求真理的一生。重读《读者文摘》多年前对曼德拉的专访，我们仍能感受到其中闪亮的智慧之光。

问：如果出狱后的您心怀复仇之火，人们也能理解，但您选择了和解。这是为什么？

答：人们总是根据自己遭受的对待做出回应。如果你在暴力基础上对待他们，他们就会用同样的暴力回击。如果你对他们说，我们要和平，要稳定，我们一起就能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问：您将艾滋病形容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健康疾病。您认为对抗艾滋病还需要更多努力，是吗？

答：是的。我们首先要正视的是躲避艾滋病人的错误心态。戴安娜王妃曾访问过艾滋病人，她坐在病床上，同他们握手聊天，彻底粉碎了“不能和艾滋病人同处一室”的观念。我2001年曾访问过一个农村学校的启用仪式。我得知附近有一些艾滋病孤儿，年龄最大的只有8岁。我问：我能看看他们吗？村里人看起来很高兴，还唱起了歌。我待了25分钟。等我出门走向村民时，突然发现他们有意后退。我走得越快，他们退得越快。

问：所以领导人在这方面的作用就是带头消除这种歧见？

答：毫无疑问。不要孤立身患绝症的病人，因为它的杀伤力比病症还大。如果一个人不被当做人对待，他就会失去求生的信心。如果得到亲友的支持，他就会反击。

问：除了艾滋病，全球还面临什么重大挑战？

答：贫穷和教育，两者是互相关联的。一定要让每个人都接受教育。

问：您有没有一些想见、但还没有会面的知名人物？

答：世界上有许多人并不占据显赫职位，但为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很多人在本国不为人知，但见到他你的敬佩感就会油然而生。

问：您想怎样让历史记住您？

答：我不想被看作圣人。我只是一个有美德也有缺点的普通人。

肯尼迪与赌城

约翰·肯尼迪第一次到访拉斯韦加斯是1956年初，住在沙漠酒店老板威尔伯·克拉克家里。年轻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想借这个机会宣扬自己的外交理念，强调“苏联殖民主义是世界最大的威胁”。

1960年2月，肯尼迪作为民主党参选人再访拉斯韦加斯。歌手西纳特拉介绍他认识了朱迪斯·艾克斯纳，后者成为肯尼迪的情人。耐人寻味的是，西纳特拉也把艾克斯纳介绍给了臭名昭著的芝加哥黑帮头子萨姆·詹卡纳，两人也“有一腿”。她实际上还是肯尼迪同詹卡纳的信使，暗中讨论刺杀卡斯特罗一事。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来过拉斯韦加斯两次。头一次闹得不太愉快。他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准备对有组织犯罪宣战，并把拉斯韦加斯认定为有组织犯罪的地下钱庄。罗伯特准备让特工突袭各大赌场，内华达州的政要大为紧张，急赴华盛顿求情。罗伯特最后同意不搞突袭，但派出大批联邦探员进驻赌城，搜集犯罪证据。肯尼迪最后一次到访拉斯韦加斯则是在1963年9月。他遇刺后，曾有动议将赌城“天堂路”改名“约翰·肯尼迪路”，但没有成功。

犹太国

1896年，维也纳的记者特奥多尔·赫茨尔发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号召全世界犹太人回归故土，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国家。赫茨尔1860年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银行家家庭，成长为一个欧洲知识分子。1891年他作为一家奥地利报纸的驻外记者被派往巴黎。在那里，他亲身经历了自以为文明的法国如何爆发对犹太人的仇恨。

1894年12月，法国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怀疑为德国人提供情报而被判终身监禁，因为他是犹太人，当时的媒体在审判前骂犹太人为“吸血鬼”和“癌瘤”。审判结果宣布后，很多人高喊“犹太人该死”。事实上德雷福斯是被冤枉的。

亲眼所见的排犹主义给赫茨尔带来深深的震撼，并促使他写了

《犹太国》这本书。他在书中提出建立犹太人的国家，他认为这不是一个乌托邦的想法，“我们有能力建设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模范国家。”他认为，这个国家的选址可以在阿根廷，但是“巴勒斯坦是我们难以忘怀的历史故乡。单单这个名字就是对我们民族强有力的召唤”。

恐怖从天而降

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内战爆发，无论是左翼联盟还是右翼集团，都从一开始就将对方控制之下的城市作为了轰炸目标。7月17日和18日，共和政府军的“轰炸机”袭击了休达、梅利利亚两个飞地。7月末，随着德国和意大利为佛朗哥阵营提供的Ju-52、S-81等型号的轰炸机陆续运抵西班牙，双方的空袭战愈演愈烈。由于缺少防空炮，暴露在轰炸机之下的西班牙城市毫无还击之力。当年10月30日，佛朗哥阵营的一架Ju-52轰炸机袭击了马德里附近的赫塔菲，并导致60名儿童身亡。地处北部的格尔尼卡是“空中恐怖”的重灾区，1937年4月26日，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派出超过20架轰炸机对这座小城进行了多轮轰炸，仅在第一波轰炸中，德军就使用了50公斤燃烧弹和250公斤炸弹。有资料表明，这次暴行总共造成超过1600人丧生，880多人受伤，格尔尼卡瞬间成为人间地狱。毕加索的名作《格尔尼卡》描绘的就是当时的惨烈情景。而在空中占据优势也是右翼集团最终在西班牙内战中获胜的重要原因。

进军华盛顿

50年前的8月28日，数十万美国民众从四面八方向华盛顿进军。他们顶着83华氏度的高温向政府要求变革，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集会组织者准备了2200辆公交车、40列特殊火车专列，发放了8万份盒饭，估计至少有25万人与会。让我们听听当年那些与会者的回忆：

哈里·贝拉方特（演员）：金博士认为，发动文化界人士具有战略意义，我的工作是尽可能动员文艺界人士参与和声援游行。我找的第一个人是马龙·布兰度，他不仅答应了，而且全力以赴发动身边的人也参加。

约翰·路易斯（时为学生领袖，后当选为佐治亚州议员）：1963年6月份的时候，菲利普·伦道夫、马丁·路德·金等我们六个人一起见到了肯尼迪总统。菲利普·伦道夫直言相告：总统先生，我们黑人感到不公，准备举行一场大游行。肯尼迪总统担心发生暴力和骚乱。我们回复说，“这将是一次和平的、有序的、非暴力的游行。”游行结束后，

总统非常高兴，再次邀请我们到访白宫。他承诺，一定把公民权利的原则变成现实。

英格兰第一个

维京国王

整整一千年前，丹麦国王“八字胡”斯维因（同时也是挪威和瑞典的领主）率一支庞大的舰队登陆英格兰。原国王、绰号“准备不足”的阿特尔雷特流亡诺曼底。

斯维因是丹麦国王“蓝牙”哈罗德的儿子，因为急于夺权于公元987年发难，将父亲流放。之后斯维因便发动了入侵英格兰的行动，并得到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支持，每个人都想从征服英格兰中分一杯羹。维京海盗零零散散地成功登陆，遭到英国顽强抵抗。1002年，阿特尔雷特下令杀死所有搜捕到的维京人。但丹麦人仍然如潮水般涌来。1011年，坎特伯雷大主教被俘，阿特尔雷特拒绝交纳赎金。维京海盗遂用骨头砸死了大主教，并把他的头骨打造成一把斧子。

1013年，斯维因“御驾亲征”，所向披靡。他纵容部队烧杀掳掠，以图恐吓英格兰民众。斯维因则渡过泰晤士河，形成合围。最后英格兰全境都向斯维因效忠，伦敦也发生了叛乱，阿特尔雷特只得出逃。不过斯维因的英格兰美梦只维系了一个冬天。1014年2月，他不慎跌落马下，不治身死。

马赛

法国最古老的城市

马赛是法国最古老的城市，也是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原本是希腊的一个港口，公元前600年由希腊的福西亚人建立。据传说，当时正在为福西亚人寻找新贸易移民港的普罗提斯发现了地中海拉西顿洞穴，那里有淡水泉，而且由两座岩石海角保护。普罗提斯被当地的利古里亚部落酋长看上，招其为驸马，他们迁居到拉西顿以北的山上开始新生活，这个定居点就发展成为马赛。

古希腊时期，马赛港因其地理优势，成了和环地中海地区贸易的中心。公元前二三世纪，马赛与正在扩张的罗马共和国结盟寻求保护，由此马赛被纳入罗马市场。随着罗马的强大，马赛沾了光，获得了独立城市的地位，通过与罗马及内陆的贸易而日渐繁荣。但在公元前49年恺撒与庞培的内战中马赛站错了队伍，恺撒灭掉庞培之后取消

了马赛城的自主权，将其并入罗马行省。大多数希腊遗迹也被后来的罗马建筑取代。最终法兰克王国于6世纪中期夺取了马赛。它从中世纪开始成为法国重要的贸易港口。

段子

张申府从北大肄业当讲师

张申府在北大数学系上学时，除了工程书以外，图书馆的书没有他不看的。但1917年，张申府只能从北大肄业，因为他有几门功课没考，有的还交了白卷。张申府早在一年前就发动了一个“不考运动”，号召只读书、不考试、不要文凭。他一贯不要毕业文凭，从初小、高小、中学、大学预科，到大学本科，张申府都上了，但没有一个毕业。校长蔡元培知道张申府是有学问的，依旧让他留校做了助教，每月薪水七十五元或者八十元。张申府在1920年被破格升为讲师。

王光美买花悼念胡耀邦

胡耀邦去世后，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艾青拄着拐杖走过来鞠了个躬说：“耀邦同志当总书记时，把别人从广州带给他的新鲜荔枝，分送给我、丁玲、马海德和艾黎。”专程从山西赶来的80多岁的种棉能手吴吉昌老人，一进门就跪在灵前：“我给耀邦磕了头，心里

也就踏实了。”一些老知识分子在遗像前放声号啕：“耀邦同志啊，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昭雪！”王光美在一家花店选购花篮时，店主听说花篮是献给胡耀邦的，执意不肯收钱，说：“这花篮也代表了我们店里人的心意！”胡耀邦的家人星夜进京。他们在北京站下车后，叫了辆出租车就往家里赶。当司机得知他们是胡耀邦的亲人时，怎么也不肯收车费，说：“这就算是我对耀邦同志的一份敬意吧！”

戴笠生活奢侈

抗战时期，戴笠常利用驼峰航线，从外国购买新式物品。他在各大城市都有公馆，仅重庆一地就有别墅十处。戴笠出门必须自带厨师，以及足够两桌用的精美餐具。因为肠胃不好，他在吃饭前都要先喝一杯开胃酒。戴笠酒量很大，一次能喝一两瓶白兰地或茅台酒。戴笠请客时，总是当众打开酒瓶，自己先喝上一大口，表示没有问题。如果一瓶酒没有喝完，以后就不会再喝，以防被人下毒。

周恩来找邓颖超借钱请客

1949年后，周恩来的工资400.8元，邓颖超347.5元，他们每月拿出一半的工资接济生活困难的亲属，剩下的钱则由秘书保管。有时周恩来会问：“我现在有多少钱？”邓颖超知道后，觉得丈夫只说“我”，而不说“我们”，是大男子主义，此后就让秘书给他们分别记账。一次，周恩来和陈毅请《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吃饭，但周恩来已经没有钱了，只好用邓颖超的钱。吃饭时，周恩来当众宣布：“今天请客的是小超，不是我，我自己没钱了！”

蒋介石睡眠不好

蒋介石睡眠状况一向不好，所以医官常要给他一些安眠药吃。有一次，蒋介石住在青岛海边，半夜突然按铃吩咐侍卫官，让住在他隔壁的杨侍卫官搬走，因为杨侍卫官的鼾声太大，吵得蒋介石睡不着。杨侍卫官走后，蒋介石还是能听到鼾声，就让一个个侍卫官都搬走了。第二天，蒋介石对侍卫长俞济时说：“青岛这地方实在太清静，他们打鼾的声音太响，以致我晚上睡不好。”到了晚上，大家注意一听，原来是青岛海边灯塔转动的声音很像鼾声。蒋介石知道原委后才睡着。

叶剑英被警卫关了40多分钟也不生气

叶剑英为人宽厚，有一次，一位被大家称为“小和尚”的工作人员护送叶剑英洗澡，把门一插，自己到后山玩了起来。被反锁在里面的

叶剑英只好"咚咚"地拍门呼叫，已经七旬的叶剑英被关了40多分钟。其他人都很生气，但叶剑英说："无心作恶我不罚，算了吧。"

章太炎不娶北方女子

1912年，章太炎丧偶，他向人谈起自己的续偶条件："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之后更在北京《顺天时报》登载近代中国第一则征婚广告。提出条件有三："一须文理通顺，能作短篇；二须大家闺秀；三须有服从性质，不染习气。"

毛泽东

1972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田中角荣。毛泽东谈起之前田中说侵华战争只是给中国"添了麻烦"的外交风波："你那个'添麻烦'的问题解决了没有？"田中忙答道："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半个世纪的事，你只说句'添了麻烦'，年轻人不满意。你知道吗，在中国，这是将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时说的话。"

沈从文

沈从文晚年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他说："中国服饰文化和各种服饰艺术太伟大了，现在的社会生活里好的东西，中国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十几亿人都着洋装，不对啊！"沈从文无职无权，但一直注意搜集古代服饰资料，然后转给相关单位。他常说："爱国不是嘴上说的，爱国是具体的，每个人都尽力努力，国家自然会好的。"

梁漱溟

美国人艾恺在采访梁漱溟时问："您觉得蒋介石对中国、对中国革命有没有什么贡献呢？说他的整个事业，会不会对中国有什么贡献？"梁漱溟回答："他最大的贡献哪，最大的贡献是给机会让共产党……他造成了共产党的成功。如果他这个人还有一点信用，人格还好一点，共产党打不过他啊。所以他最大的贡献，就是造成共产党的成功。"

陈公博

1940年12月，汪伪和日本签订条约后，陈公博发表演说，中日战争"至三年之多，这是谁的责任呢？我们用自省自责的精神来检讨，我相信，每一个国民都有责任吧！"他宣称："我们的态度，首先

为中国打算，更为日本打算！”

贺龙

1965年，贺龙接见了战胜丹麦的中国羽毛球队。贺龙说：“你们这次打得不错。第一条，政治挂帅，脑子里有祖国、党和毛主席。第二条，你们流了汗水，用了脑子。我们篮球、足球就怕‘蓝眼睛’外国人。我们7亿多人口几个足球运动员就找不到？”贺龙问：“羽毛球队有几个党员？”球队负责人答：“1个。”贺龙说：“党员太少了，争取入党嘛！又红又专，红专结合，以红带专嘛。”

熙洽

伪满洲国成立时。财政部大臣熙洽抗议说：“我们既然是一个复合民族国家，各民族就该一律平等。为什么在薪资上，日本人要享受特殊待遇？”“总务厅长”驹井回答：“要想一视同仁讲平等，须先看看能力平等不平等。日本人的能力大，当然待遇要高；何况生活程度也不同，日本人生来就是吃大米的，满洲人吃高粱米就是上上的。要讲亲善，给日本人高薪才是亲善吧。”

@章诒和： 1957年，杨绛接到翻译《堂吉诃德》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精通英语法语的她找来五种英法译本，仔细对比后，觉得译本代替不了原著。于是，近六旬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1961年才着手翻译。1978年人文社出版。这个译本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至今印了68次，售出98万套。

@林和夜： 能和她这样才华横溢又勤勉低调的女性呼吸着同一个世界的空气，真的是我莫大的荣幸。

@ sh9609：逻辑有问题，如果不懂西班牙文，又如何出现“觉得译本代替不了原著”？

@凤凰空间-郑青：这个思维不通，杨先生学西班牙语期间谁管发工资啊，要是现在我们学个西班牙语除了交钱还要自己管吃管喝。再说，直接找个会西班牙语的不就行了吗？一本书拖了13年才出，策划编辑要负责啊。

@济善园之三慎斋： 【冰糖肘子】（1960年）7月的一天， 毛主席家请客。主席说：“吃来吃去就这几个菜，是不是今天弄几个新花样出来？”那天我做了两个特色菜，一个是冰糖肘子，一个是烙草（青）鱼。毛主席吃得很 开心，吃完后他问侍卫：“今天的菜是谁做

的？肘子很好吃的嘛，鱼也很有特色。”——苏林发《我为毛主席掌勺》

@书影吐槽馆： 苏军控制东北后即调来三千技术人员拆迁工厂，不数月东北工业精华尽丧，昔日烟云笼罩城市泰半变为废墟，工厂徒留四壁，机器损毁逾半。后经美日专家调查各主要工矿设备造拆迁损失者，约有电力60%、煤矿80%、钢铁约80%、铁路75%、机械68%、化学50%，水泥54%、纤维50%、电讯 30%，共12.3亿美元。

年历

1

1973年8月

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成立。这是由15个加勒比国家所建立的促进经济一体化和其成员之间合作的组织，以确保一体化得到公平共享，以及协调外交政策。

/组织标志

2

2003年8月

联合国批准向利比里亚派遣国际和平部队以维护当地秩序。

3

1923年8月

鲁迅出版短篇小说集《呐喊》。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收录了鲁迅在1918年—1922年间所写的14篇小说。其中，《狂人日记》、《孔乙己》、《 阿Q正传》等文章皆为鲁迅的代表作。

4

1913年8月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大批党人出逃日本。孙中山、胡汉民一行，由福州马尾乘日轮抚顺丸去基隆，5日从基隆换乘日轮信浓丸赴日本。陈其美、戴季陶等在国内失败后，也相继到日本。

5

1963年8月

美国、苏联和英国在莫斯科正式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联

合国秘书长吴丹出席了签字仪式。

6

1963年8月

有“世界头号黑客”之称的美国程序员凯文·米特尼克出生。他在15岁时破解北美空中防务指挥系统成功，16岁时被逮捕，也因此成为全球第一名网络少年犯。曾成功入侵了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公司盗取企业重要资料，给它们带来的损失高达4亿美元。

/凯文·米特尼克

7

1743年8月

俄国和瑞典两国为结束俄瑞战争而于芬兰图尔库签订奥布和约。俄国要求瑞典将基米河以东的所有领土割让，并派出波罗的海舰队前往斯德哥尔摩以防止丹麦可能的进攻。

8

1963年8月

英国发生邮政列车大劫案，主犯龙尼·比格斯越狱逃亡巴西近三十年后于2001年向英国警方自首，2009年因患重病而获司法部门提前释放。

/龙尼·比格斯

9

1173年8月

意大利比萨大教堂的钟楼破土动工，即后来的世界遗产比萨斜塔。该塔1372年完工，原本设计为垂直建造，但是在工程开始后不久便由于地基不均匀和土层松软而使塔身向东南倾斜。

10

1913年8月

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以及保加利亚在布加勒斯特签订和约，巴尔干战争结束。保加利亚丧失其在马其顿和色雷斯的大部分土地及南多布罗加，土耳其又重占亚得里亚堡。

11

1943年8月

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召开。丘吉尔和罗斯福主持，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出席了会议。会议批准了 “霸王行动”计划，确认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重要性，规定了击败日本的最后期限，保证了盟军作战行动的协调一致。

/会议期间，罗斯福（前排左）、丘吉尔（后排右）与迪尔元帅（前排右）、麦肯齐·金（后排左）合影

12

1993年8月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除索引卷外，全部出齐。全书自1978年开始编纂，历时15年，共74卷，覆盖66个学科，是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也是世界上规模较大的几部百科全书之一。

/第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

13

1553年8月

逃亡的阿拉贡神学家塞尔维特在参加加尔文的布道会时被认出，并以异端罪名被判火刑烧死。他参与了新教改革，后期又发展了反对三位一体论，是欧洲第一位描述肺循环的学者。

14

1953年8月

苏联宣布氢弹试验成功。其方案是采用氘化锂作核燃料，制作成本低、体积小、重量轻、便于运载，被称为“乾式”氢弹。这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颗武器化氢弹。

15

1913年8月

孔教会代表陈焕章、夏曾佑、梁启超、王式通等上书参、众两议院，倡议定孔教为国教。鼓吹中华民国应于宪法明文规定“以孔教为国家风教之大本”，提出“国家设立学校，得以孔教为伦理教育之基幢，国家得设孔教学位（进士、举人、秀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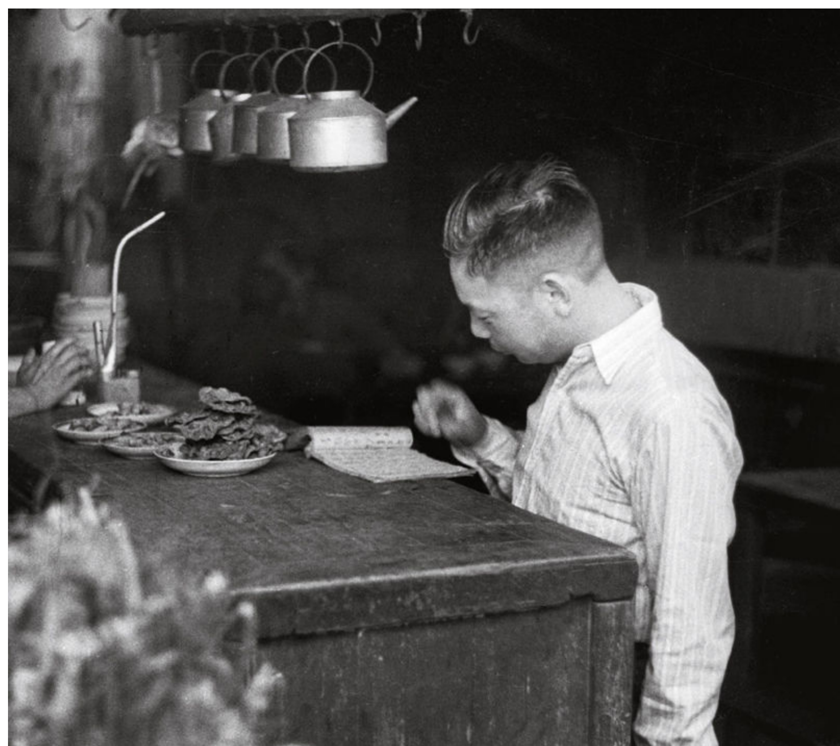
等，并以国家公款维持孔教学校。”

蒋经国在赣南

作 者:杨津涛


















1937年3月，蒋经国结束在苏联十二年的生活回国，被任命为赣州县县长，后升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督察赣州、南康、信丰等11个县，人口约200万。赣南曾是“中华苏维埃”管辖的核心区域，这里土地贫瘠，兼之战事不断，以致经济十分落后。

蒋经国上任伊始，就仿效苏联的“五年计划”，推出“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建设“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的“五有”社会。蒋经国下令禁赌、禁烟、禁娼，要求各地减租25%，把荒地分给贫农耕种。1941年，蒋经国下令各县“不得擅行派款”，相继取消了蔗棚捐、毛猪出口捐、自卫队经费等36种

苛捐杂税。

蒋经国在赣南主政三年后，蒋介石发电嘉奖：“儿任专员已足三载，人民爱戴，建设进步，时用快慰！”《纽约时报》记者特金森报道，蒋经国的改革使赣南地区面貌一新。在他眼中，赣州是中国最干净、最现代化的城市。1945年6月，蒋经国离任。

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为蒋经国在赣南留下了一组珍贵照片。本期图志由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授权、深圳大乾艺术机构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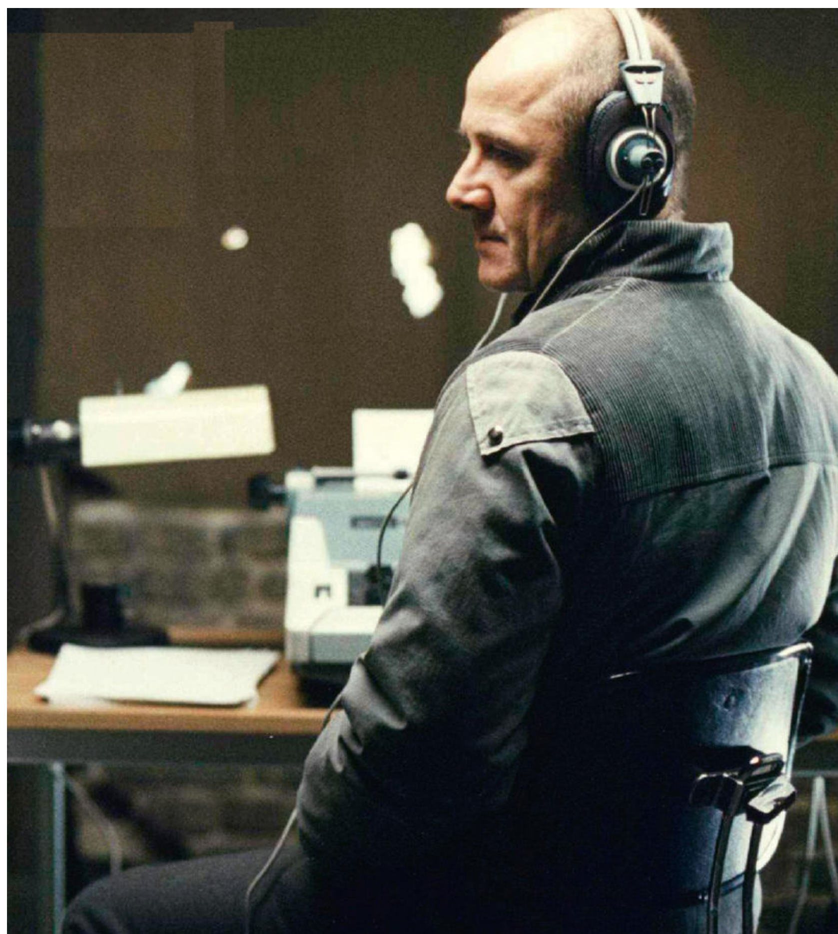
/蒋经国同一群保育院的孩子在一起，脸上充满温馨的笑容。蒋经国十分重视教育，他把各村的宗祠借来办学校，在校内禁止体罚。蒋经国下乡视察时，会检查孩子们的作业本，听他们念书，同时检查老师填写的成绩单。1943年，蒋经国为数千名失去父母的孤儿兴建了“中华儿童新村”学校

/蒋经国在餐桌前笑着和保育院的孩子交谈，孩子脸上露出些许紧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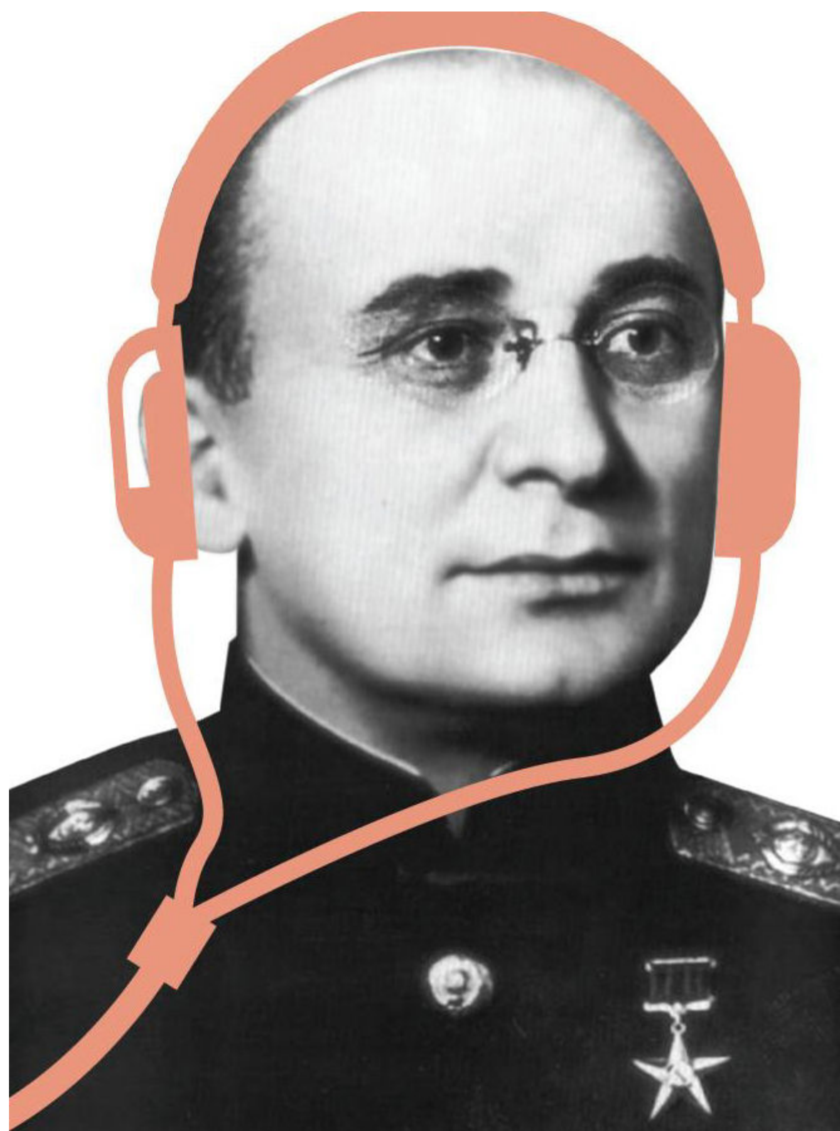
/蒋经国在商店中与一位妇女闲聊。蒋经国在赣南，不准官员乘坐公家雇用的三轮车，自己常常短装草履，在城市、乡间四处巡视，与农民、商人、公务员、知识分子和难民交谈。1939年—1940年，蒋经国跑了1450公里，可以绕赣南三圈。他对辖区内的情况了如指掌，说得出专区内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

/蒋经国在公开法庭上审案，他在倾听案情时神色凝重，结案时则又露出爽朗的笑容。蒋经国在专员公署设立人民控诉室，大门口张贴大字布告：“凡人民有被欺压或有冤情者可来专署控诉，不能用书面者，可口头控诉。”蒋经国每周会抽出一天接见百姓， 仅1942年一年，他就接见了1023人。蒋经国被赣南人称为“包龙图”、“蒋青天”

席卷世界的窃听风暴









当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向《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揭露美国情报机构的“棱镜”（PRISM）计划时，自由世界的上空顿时浮现出“老大哥”的身影，人们忽然发现，他从未走远，依旧盯着世界上每一个人。

窃听，绝对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敌对国家之间相互窃听，盟友之间也相互窃听；在国际竞争中需要窃听，面对国内政治斗争也使用窃听；无论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帝国，政府情治部门要监控民情都离不开窃听。

罗斯福被斯大林“特别关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了“美苏争霸”的世界格局，两个超级大国都想占得先机，为此两国之间秘密战线的斗争从未停息。其实，早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时，还是苏联坚实盟友的罗斯福便受到了“礼遇”。

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被东道主苏联安排在利瓦迪亚宫下榻。这里曾是俄罗斯沙皇的避暑胜地。可是罗斯福不会想到，苏联秘密警察和国外情报机构（NKVD）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密密麻麻安装了各种尖端窃听设备，美国代表在室内所说的一切尽在苏联人的监听范围之内。

其实就在雅尔塔会议前不久，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内就曾发现了总数不少于120件的窃听设备。按理说，美国人原本对此应当有所防范，可是不知是麻痹大意了还是防不胜防，他们再次成为了苏联人

的“瓮中之鳖”。与罗斯福一样，丘吉尔同样属于苏联的“重点照顾”对象。曾经流传着一个笑话：丘吉尔一次在下榻的沃伦特索夫宫喝杜松子酒时感叹说：“如果能够就着柠檬汁就好了。”结果第二天早上醒来时，英国代表惊奇地发现地板上竟然长出了一棵柠檬树。

1998年，贝利亚的儿子瑟果回忆起当年父亲曾经对他说：“雅尔塔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即便是在室外的对话，也同样被苏联秘密警察监听得一清二楚，并且被秘密录了音。当时苏联的窃听器能够捕捉到50到100米范围内任何的声音信号，由于没有背景噪音，所以美国人的对话声非常清晰，录音经翻译整理后，效果十分理想。”当时，老贝利亚每天清晨6点便早早起床，将所窃听到的内容整理出一个概要，并于当天早上8点向斯大林汇报。“对于我父亲汇报的每一条情报，斯大林都听得十分认真。他不仅对美国人说了些什么感兴趣，而且对他们说话时的语气语调也很感兴趣。比方说，美国代表说话时有无停顿，停顿时间有多长等等。”

“黄金行动”被将计就计

战争结束后，美苏争霸的局势逐渐明朗，双方在窃听对手方面都做足了工夫。上世纪50年代初，克格勃把一枚木质白头海雕国徽当礼物，送给了美国驻苏联大使哈弗里尔·哈里曼。这枚国徽做工精细，别致新颖，哈里曼大使珍爱地把它挂在书房里。然而自从这枚象征友谊和尊严的国徽挂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后，房间里的谈话就都传到克格勃耳里。原来，这枚被当成礼物的国徽被克格勃暗中做了手脚——国徽中央被掏空了，里面放着一个U形的金属支架，上面安着用弹簧制成的极其灵敏的共鸣器——大使书房里的任何声波都能引起它的振动。克格勃在大使馆对面的一座建筑里安了一个雷达，直接对准哈里曼书房中国徽里的共鸣器。它灵敏度极高，能侦察、录制和译出最细微的声音，并能逐字逐句译出谈话内容。由于克格勃对美国大使馆的情况总是了如指掌，大使馆才决定最后进行一番检查，从而揭开了国徽肚子里的秘密。这时它已忠实地为克格勃效力了7年之久。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二战刚一结束，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希伦科特，就开始部署一项庞大的窃听计划。他把这项窃听工程命名为“黄金行动”。之所以取名“黄金”，是因为希伦科特认为，优质的情报比黄金还有价值。

美国人发现，苏联军事设施里都有地下通信电缆通往东德和东欧各国，中情局完全可以在这方面做文章。希伦科特决定迅速在苏军通信电缆附近秘密挖掘隧道，沿线窃听。在英国人的协助下，美国人查出苏联与东德及东欧驻军的通信是以东柏林为中心的。按照“黄金计

划”，中情局将挖掘一条总长1.4英里的隧道，从西柏林南郊的阿尔特格里尼克开始，穿过勃兰登堡，再延伸到东柏林阿尔特·格林尼克区的公墓，直通索恩法尔德公路地下。这就是间谍史上著名的“柏林隧道”。隧道修成后，中情局就可以极其方便而又准确地窃听到东柏林和莫斯科之间往来的电话了。利用这个布满窃听器的隧道，中情局每天可以录制800盘录音磁带，打印至少4000米长的文传打字带。每个星期，中情局把这些材料送回华盛顿处理，经过翻译后，供分析人员研究。大约50名精通俄语和德语的人员挤在一间只有25平方米的密室里从事翻译工作。

1954年8月，柏林窃听隧道开凿后不久，监听设备就开始试验截听苏军电话了。第一个重要信息于当年底被截获：苏联军方传达克里姆林宫指示，要求驻东德苏军保持良好纪律，不可破坏和谐气氛，配合政府同西德改善关系。分析人员根据这份情报做出判断：柏林战争状态有望结束。之后，他们凭借这条隧道掌握到苏联在东德驻军实力有限，根本不可能突然向西柏林发动进攻。同时，他们还获知，苏军在东德修筑了特殊的武器库，分析专家推测，苏联人可能会在东德部署原子弹。

但好景不长，美国人就感到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后来的苏联出兵匈牙利事件，中情局竟然没有从隧道里获得一条有用的情报。美国人开始产生了怀疑，难道苏联人已经发现了隧道的秘密？当“黄金行动”曝光后，莫斯科方面声称，他们早就知道美国人在搞地下活动，因此他们发放了很多假情报愚弄美国，直到时机成熟才一举粉碎美方的地下阴谋。

克格勃自摆乌龙

美苏双方决定各自在对方兴建新的使馆时，苏联从国内运去了所需的构件，而且在建设过程中进行了非常严密的监视。克格勃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下的窃听系统有几层楼的规模。在上层工作的是负责截听、截收的人员，在下层工作的是负责窃听的技术人员。地下隧道的各种管线均能通到美国大使馆的办公主楼，而且办公主楼里也被安装了许多窃听器。

不仅如此，许多东欧国家都卷入了这场窃听风暴。1969年春，美国驻罗马尼亚大使被监听，保安军官最后在大使皮鞋左脚的鞋后跟里发现了一只大功率苏制K9R窃听器，这只皮鞋曾由大使馆里的一个“女佣”拿去修理过。在“修理”过程中，鞋后跟被人剜开，装进了这个重量不到5.7克的窃听器，鞋跟上还挖了一个小孔，使窃听器的麦克风头露出来，在另一个小洞里插着一根钢针。这样，只要“女佣”在夜里把

针拔出来就关闭了窃听器，而早上在大使起床前把钢针一踩进去，就又开启了窃听器。

在这场窃听大战中，美国人笑到了最后，克格勃自摆乌龙，断送了庞大的苏联。1991年7月底，戈尔巴乔夫同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机密电话被窃听。当时三人谈到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和国防部长亚佐夫的去留，戈尔巴乔夫认为“那些达到退休年龄和构成负担的人应该被替换”。谈话被克格勃秘密偷听并录音，克留奇科夫便利用录音要挟亚佐夫共同发难。

1991年8月19日，以克留奇科夫为首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政变，政变终因人民反对、军队倒戈而流产，苏联也在政变中宣告解体。

德意志之耻

窃听敌对国家，应当说在情理之中。但是窃听自己人又是为什么？在苏联情报部门的帮助下，民主德国于1950年4月组建了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这个强大的情报组织主要任务即是监视和窃听自己人。据统计，东德1600万人中，有600万人被其建立了秘密档案，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1959年“斯塔西”大约有13000人，1973年为53000人，1989年达到了91000人，东德每180人中就有一人从事情报工作。作为正式编制的补充，还有10万到20万的临时工。

“柏林墙”轰然倒坍时，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指挥秘密警察们销毁档案。由于数量太多且没有足够的碎纸机，米尔克下令用手工撕毁。经昼夜奋战，4500多万张A4纸被撕成6亿多个碎片，装在16350个袋子里，准备运到一个采石场焚毁。这时，民众冲入了“斯塔西”总部，大部分文件被保存下来。统一后的德国国会对处理这批档案颇费踌躇。一些议员认为，档案的内容太具爆炸性，建议烧毁；另一些人则出于社会安全的考虑，主张封藏若干年或经处理后部分公开。在大量受害者的坚持和来自东德的议员们推动下，国会终于通过法案，解密了这批秘密档案，每个被迫害者都可以去查阅自己的卷宗。

解密法案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冲击波，受害者们发现：除了警察和官员外，告密者中还有好友、近邻，甚至最亲近的丈夫、妻子、父母、子女。人们先是震惊，然后陷入精神崩溃，大量家庭因之解体，还有人因无法面对被自己出卖的亲人而自杀。被“斯塔西”收买的线民遍布各行各业，其中不少曾受人爱戴的政治家、大学校长、主教、作家、艺术家、体育明星、教师等，顷刻间名誉扫地。

一位女议员发现，案卷中一份报告详尽描绘了自己私生活的细枝末节，线民就是与她生育了两个孩子的丈夫，两人因此离婚。人权活动家帕皮斯从档案中得知，警方有计划地摧毁他的婚姻和家庭，鼓动他的儿子反对他，以教育机会和金钱利诱他的妻子离婚，甚至使用了“美男计”。秘密警察曾派美女去勾引主教艾格特，用匿名信散布他鸡奸男童的谣言，还指使医生假造病情，提供抑制精神的药品以破坏其健康。

超越“水门事件”的监听

如果把东德人民遭受的灾难归为专制，那绝对有失公正。因为，窃听自己人并非专制者的专利。窃听技术高超的美国人自然也有搞自己人的历史。

1972年6月17日凌晨，有5个人企图潜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美国民主党总部时被警方抓获。他们潜入水门大厦是为了更换此前被安放在民主党总部但已失效的窃听设备，不料当场被擒，这就是著名的“水门事件”。“水门事件”暴露了尼克松在1972年利用非法手段赢得总统连任的政治丑闻，在强大的压力下尼克松于1974年8月9日被迫辞职。

不仅是美国，法国前任总统密特朗为了阻止他的婚外情和私生女的事情泄密，从1983年1月到1986年3月，“爱丽舍宫电话监听系统”对至少150多名法国名人的电话进行了窃听，电话记录高达3000多条，许多政要、记者和律师都成为受害者。经过数年调查，目前已有12名密特朗的前助手成为了被告，而密特朗于1996年1月去世，躲过了司法追究。

在东方民主国家的样板——韩国，窃听是国家行为。韩国情报机构于1992年成立“米林小组”，该小组在政坛和商界实力派人物常去的酒店、餐馆，安插线人，布设窃听器，并把窃听报告直送情治部门长官。小组对韩国要人进行了大约1170次窃听，窃听对象达5400多人，还自行研制生产了20台手机窃听设备。

在台湾，包括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立法院长”王金平和国民党组织发展会负责人丁守中均遭到民进党的窃听。据说，连战一星期打几次高尔夫球，宋楚瑜一星期打几次牌，牌友是谁，陈水扁一清二楚。

对于陈水扁非法监听的行为，国民党方面邀请“国安局副局长”等军情检调部门负责人到“立法院”解释清楚，并当面痛斥情治系统“已沦

为民进党的选战工具”。为了防止被窃听，国民党高层个个练就了一身“反监听”的独门功夫。丁守中一人带五六个手机是家常便饭，为的就是让情治部门一时找不到目标，但他的电话还是个个都遭到了监听。国民党副主席林丰正根本就不带手机，有事只通过办公室联络，安排面访或主动回电。他的电话“易付卡”每3个月换一次号。陈水扁搞政治监听，了解到对手选情部署、重要选战策略、选战文宣议题和选战资金来源及流向等。这些行为早已超越了“水门事件”。

震动中央的“窃听器事件”

自古以来，华夏大地都有监听的传统。史籍中随处可见皇帝告诉大臣，你昨天晚上见了谁、说了什么之类的记录。据说，明朝崇祯皇帝了解每一个王爷的一举一动，甚至每天和哪个小妾过夜。当然，古代没有窃听器，只能靠人听。

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窃听器事件”，导致杨尚昆、叶子龙等一大批人遭到迫害。

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接到电话，要求必须第二天下午赶回北京。4月27日下午，杨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此后几天，杨尚昆又先后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等人多次谈话。几天来搅得杨尚昆吃睡不宁的，正是震动中央高层的所谓“窃听器事件”。

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一天，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很惊讶，那位工作人员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

从杨尚昆日记的注释和叶子龙的回忆录中看，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录音工作的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他认为要利用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他曾多次向领导杨尚昆和周恩来等汇报过这个建议。毛泽东本人也认可录音的做法。毛泽东曾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

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

对会议录音问题，有时毛泽东自己提出要录，有时又对录音很反感，甚至不赞成做记录。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南屏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

1961年“窃听器事件”发生后，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受到处分。叶子龙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叶子龙本人也因此案被监护审查了七年之久。拨乱反正后，中央重新审查了此案，并为有关人员彻底平反。

“文革”期间，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始终谨防“隔墙有耳”。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李先念家，同李商量如何扳倒“四人帮”。华国锋请李先念去见叶剑英，问一问他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隔了两天，李先念去到西山叶帅处。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曾撰文将父亲与叶帅的密会场景还原——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李先念：“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先念回答：“都有。”这时，叶剑英打开了收音机，将声音放大。但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集团被隔离审查。当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发生时，邓小平正处于“禁锢”状态。他的女婿贺平带来了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因担心家里被安装了窃听器，全家人就聚集到厕所里，听贺平讲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在现代科技面前，谁也保不齐被人窃听。任何制度都难挡人性的欲望。如今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斯诺登爆出的“棱镜门”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台湾竹联帮黑道青春

作 者:武云溥









“白

狼”回来了。

2013年6月29日，这个消息震动了宝岛台湾。下午2时，从上海飞到台湾的航班降落，张安乐手捧着一份宣传材料现身，立刻被警察包围并戴上手铐。事后据台湾媒体报道，负责抓捕张安乐的警察看到他手里的文件，一时有些不知所措——文件的蓝色封面上写着八个醒目的大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下面还有一行略小的字“台湾人民幸福的最佳保证”。

这是张安乐精心设计的亮相方式。前一天他在上海召开记者会，公开宣布决定返回台湾投案。这位六十五岁男人此时的身份，是在深圳居住多年的台商，也是他一手创立的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总裁。而他更为公众所熟知的其实是另一重不合法的身份：他就是“白狼”，台湾最大黑帮“竹联帮”的精神领袖。

阔别台湾十七载，大佬归来，江湖已远。

族群矛盾催生“外省挂”

“竹联帮起源于1953年，它的前身叫做中和帮，帮主叫孙德培。”此次高调返台前后，张安乐接受了数十家两岸媒体的访问，他对自己的黑道身份并不避讳，对帮会掌故更是熟稔在心。“孙德培的叔公，就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孙武。”

台湾黑社会组织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清朝的民间秘密会党。1662年（清康熙元年），抗清将领郑成功率军驱逐了盘踞在台湾岛上的荷兰殖民者，把宝岛变成了反抗满清统治的军事堡垒。当时东南沿海地区活跃的秘密会党“洪门”也借机发展到台湾。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尊郑成功为“武宗”，以各种山堂为号，最早成立的是金台山名远堂。

政局不稳，民间组织便得以发展壮大。雍正四年（1726年）端午，以蔡阴为首的十三人在诸罗（即今嘉义县）结盟组成“父母会”，这是有史料记载最早的台湾本土帮会。到1895年日本凭借《马关条约》侵占台湾，岛上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帮派组织经历了将近两个世纪的野蛮生长，势力已经遍及全岛，其中洪门和青帮规模较大。日据时期，台湾本土黑帮遭遇大规模整肃，日本黑社会势力得以入台扎根。所以直到今日，台湾和日本的黑道人物都往来密切，甚至有些台湾黑帮的组织机构就设在东京。

日本人利用黑帮势力巩固殖民统治，一些地痞流氓组成的地方角

头势力壮大起来，芳明馆、牛埔帮、华山帮、七贤帮都属此类。所谓“角头”意指部落，最早是同族、同乡聚居形成的团体，他们往往建造庙宇，以祭祀天公、妈祖、三太子等神灵的名义活动，并训练壮丁组成武装力量。

如果说角头代表了台湾黑社会中的土豪宗亲力量，那么到了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时，外来势力则开始冲击岛内秩序。跟随国民党来台的有大量军官家眷子女，也有其他各个阶层的平民百姓，还有一些本来就是大陆的帮会分子。他们大多住在眷村，在和原住民的冲突中慢慢结成团体。早期他们被叫做“阿山仔”，后来统称“外省挂”，与这个词相对应的台湾原住民则成了“本省挂”。在台湾警方的习惯用语中，外省挂叫帮派，本省挂是角头。主要的外省挂有竹联帮、四海帮、松联帮、飞鹰帮等，其中很多都有国民党军方背景。

除了外省挂和本省挂，还有一类人叫“纵贯线”。纵贯线本来是台湾铁路局对中部和西部贯穿全岛的铁路干线的称呼，在黑帮话语里，却指的是那些实力强大到不受地域和角头帮派限制，黑白两道都要另眼相看的大哥。近些年“纵贯线”这个词被用滥了，变成凡是在纵贯线铁路沿线地区活跃的黑帮老大，不论江湖地位高低，都自称“纵贯线大哥”。

台湾有多少黑帮分子？准确数字很难统计，1973年台湾首次办理帮派解散登记，登记在案的帮派有568个，成员3334人。1978年台湾当局第二次登记，有189个帮派解散，961人宣誓脱帮。1984年底，登记在案的帮派组织达1236个，成员10582人。到了1996年，台湾警政署首次公布各县市黑社会帮派普查情况，统计出一千多个帮派组织，五千八百多名成员。要知道，警方掌握的数据只是不完全统计，实际在台前幕后活动的黑道中人估计有数万人，这就包括了名头最响的台湾三大黑帮——四海帮、天道盟，以及人数最多、号称“天下第一大帮”的竹联帮。

旱鸭与白狼的惨绿青春

“中和帮成立两年后，孙德培在一次争斗中杀了个人，结果他和很多骨干被抓，中和帮瓦解。”这是张安乐讲述的故事：“有个人叫周榕，他想重整中和帮，到处去找原来的兄弟。1957年，在中和乡竹林路，中和帮成员聚会。不知道是谁提议说，我们都是新人，在竹林底下结盟，就叫竹林联盟吧，简称竹联帮。”

也许是岁月久远，张安乐的记忆出现了时间偏差，另外一些关于台湾黑社会的资料显示，他所说的竹林会议是在1956年6月召开的。

为了尊重正在狱中的帮主孙德培，新的竹联帮不设帮主，以狮、虎、豹、凤、鸭等动物作为分支组织的名号。1964年，十六岁的张安乐加入竹联帮，当时排到了“狼”字辈。“我们一批四个人，分别叫做黑狼、白狼、花狼、小狼。”张安乐说，“大概是因为我长得比较白，就叫我白狼。”

少年张安乐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母亲在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做教师。“北一女”是全台最著名的中学，校友包括吕秀莲、彭凤至、三毛、朱天心、张晓风等各界巾帼精英，还有蒋经国、连战、陈水扁、马英九等人的女儿都曾就读于这所中学。张安乐受家庭熏陶，从小就是优等生，聪明好学。

可他还是像那个年代的很多少年一样，在课堂之外有着好勇斗狠的惨绿青春。如果你看过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钮承泽的《艋舺》这两部电影，也许能理解这些孩子走上黑道的心路历程。张安乐加入竹联帮的六十年代，台湾社会动荡不安，族群对立，黑道纷争。

1967年，张安乐考入淡江文理学院（淡江大学）历史系。在学校里，认真念书和打打杀杀这两种矛盾的行为，不可思议地在张安乐身上统一起来。某次他跟一伙学生打架，偶然结识了同在淡江念书的学长陈启礼——这个日后成为台湾黑帮教父的男人，改变了白狼张安乐的一生。

陈启礼祖籍江苏，1941年生在四川广安，1949年跟着父母到台湾。在眷村的小学念书时，全班包括陈启礼在内只有三个外省小孩，他经常被本地孩子欺负。“下完课班上有些人来打我，我就还手跟他们打。”1999年陈启礼在柬埔寨金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后来变成每天下课全班来打我，在教室外面的走廊，我就一直奋战。”

眷村少年陈启礼用拳头打出了自己的人生，1952年他加入中和帮，在1956年的竹林会议之后，陈启礼成为竹联帮“鸭”字辈的一员，绰号“鸭霸子”。据说有次打完架被警察追，几个兄弟跳河游走，只有陈启礼不会游泳，所以也有人笑他是“旱鸭子”。可这只旱鸭子不光能打，头脑也灵活，很快成为帮中领袖。1968年4月，竹联帮在阳明山召开大会，推举陈启礼为总堂主，实际上相当于帮主。

这一年，陈启礼27岁，张安乐20岁，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在阳明山大会上，白狼作为总护法，帮助鸭霸子建章立制，规定今后各分支堂口必须定期缴纳“母金”，支持核心组织运作。竹联帮内部等级森严，小辈必须绝对服从长辈，并设有多种残酷刑罚处置违规者。由于

成员多为“外省挂”，竹联帮的帮规和暗语、手势、仪式等，基本沿袭了大陆洪门和青帮的传统。陈启礼和张安乐扩充了帮会编制，设立虎、豹、龙、狮、熊、凤、狼、鸟“八旗制”。竹联帮的对外活动主要是收保护费，用暴力手段帮人维护商业秩序，这种古老的生意在陈启礼手中发扬光大，几乎成为台湾黑道行规。甚至有个关于竹联帮遵守所谓“商业道德”的案例被广为传播：有个工地开工，竹联帮上门收费，遭拒后就绑架了工地负责人。事后经过调解，工地交了30万元保护费。而竹联帮收了钱就承诺，以后哪怕工地上丢块砖，都由竹联帮负责——后来又有其他帮派到工地敲诈，竹联帮成员果然到场救护，打跑了敲诈者，从此再无人敢来寻衅。

“所有规则的设立，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在《血酬定律》书中，学者吴思这样分析中国社会延续千年的潜在规律，“流血拼命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在陈启礼的掌控下，竹联帮势力愈发膨胀，不仅成为台北市帮派龙头，还南下台中、桃园、嘉义、台南、高雄等地，号称有十万帮众，“一统江湖”。

“血酬定律”同样适用于黑社会，直到他们遭遇了另一套更加强大的潜规则——政治。

“江南案”背后的阴暗角力

1984年10月15日上午，美国旧金山德里市，作家刘宜良走进自家公寓的车库，正准备开车出行，突然从角落里闪出两个人，拿手枪对准了他的头。

这两个持枪者是竹联帮成员吴敦和董桂森。枪响了三声，吴敦开的第一枪击中刘宜良眉心，刘应声倒地，董桂森又上去补了两枪。确认刘宜良死亡后，两名杀手逃离现场。

刘宜良是台湾著名作家，早年做过记者，1967年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赴美居住，并加入了美籍，实际上他的秘密身份是国民党军方的情报员。但是刘宜良在美国笔耕不辍，以“江南”为笔名发表了大量披露台湾政坛黑幕的文章，尤其是1984年出版的《蒋经国传》，彻底激怒了国民党当局。更要命的是，台湾情报部门还认定，刘宜良是“双面间谍”，暗地里在为大陆方面收集情报。于是在1984年7月，台湾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找到陈启礼，告诉他有人在美国“诽谤元首”，但官方不便出面，要求陈动用帮派力量“替天行道”，暗杀刘宜良。

陈启礼接下了这单“活儿”，事实上他别无选择。早在1970年，竹联帮成员陈仁盗领社团公款潜逃，竹联帮为“清理门户”，派杀手张如

虹当着警察的面刺死了陈仁。张如虹是竹联帮右护法，也是陈启礼的亲信，所以案发后陈启礼立刻被锁定为幕后主使。1972年陈启礼入狱，关押到1976年出来，为了重振威信，他需要借助政界的力量。有资料显示，出狱后的陈启礼已经被台湾情报局吸收，他成了拥有“官方背景”的黑帮老大。1984年亲自出马刺杀刘宜良，对陈启礼来说，不过是奉命行事。

所以，1984年8月，陈启礼化名“郑泰成”飞赴美国，与吴敦和董桂森会合。三人连续十几天埋伏在刘宜良家附近，观察刘的生活起居。在陈启礼的直接指挥下，血案爆发。

“江南案”虽然替台湾当局除掉了“异见分子”，却也深深震撼了脆弱的美台关系，麻烦就在于刘宜良的美国公民身份——台湾派来的杀手在美国本土行凶，这还了得？FBI迅速锁定了嫌疑人，美国政府当然不相信这是简单的黑帮犯罪，要求台湾当局交出幕后主使。

“我本来不知道董事长的计划，是看到报纸新闻以后才明白，出了大事。”张安乐回忆，他早在1975年就到了美国，一边做餐厅生意，一边在大学继续读书——我们知道，白狼一直是个“好学生”，他在美国先后就读于内华达大学拉斯韦加斯分校和圣玛丽学院，拿到了四个学士学位，还有一个名校斯坦福大学的硕士肄业。远离台湾的腥风血雨，白狼在美国过了多年安稳日子，“董事长”的到访再次把他卷进风暴中心。

董事长就是陈启礼，以他此时的江湖地位，已经没有人再敢叫他“鸭霸子”了。得知江南死讯后陈启礼决定返回台湾，张安乐提醒董事长“小心被灭口”，陈启礼回答：“没事，我有一卷录音带。”

这卷录音带就是老谋深算的陈启礼留下的“后手”。果如白狼所料，陈启礼返台后不久，台湾当局展开“一清专案”扫黑行动，抓捕了陈启礼和吴敦，同时围剿竹联帮分子。迫于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要求彻查“江南案”。1月13日，台湾当局发布消息，承认情报部门与案件有关。

为了保住董事长的命，白狼决定使出杀手锏。3月1日，张安乐在洛杉矶召开记者会，宣布自己手握陈启礼留下的录音带，记录了“江南案”的真相。“我们本不想拿出录音带，那是玉石俱焚。”多年之后，张安乐回忆当时的考量，可谓孤注一掷：“我们说手上有录音带，必要时候会公布，条件是董事长和吴敦从警备总部转移到司法受审。因为杀人是事实了，我们也懂法，转移到司法可以让他们有发言的机会，在警备总部可以随便说你脱逃然后杀了灭口。”后来接受美国哥

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张安乐直接表示，“江南案”的幕后主使是蒋孝武——蒋经国的次子，当时台湾政坛心照不宣的接班人。

金盆洗手，还是政治夜壶？

张安乐在深圳的办公室里挂着三幅水墨画，分别是上山虎、青竹林和白狼群。

除了这三幅画透出的象征意味，2013年的张安乐已经完全看不出黑帮大佬的气质，他戴金丝眼镜，总是面带微笑，文质彬彬，像个儒雅的商人。张安乐的生意涉及运动用品、旅游业、消防器材和电子产品，他的“韬略集团”是全球最大的专业运动头盔生产商。虽然在台湾警方的系统里，张安乐一直是通缉名单上的要犯，但是6月29日回台当天，他只在台北地检署里被羁押了四个小时，然后交了一百万元新台币保释出来。“还以为会关上两三个月或两三年呢。”

1984年和陈启礼一同返回台湾的杀手吴敦，绰号“鬼见愁”，他后来被判无期徒刑，经过减刑，实际坐牢六年多后出狱。如今吴敦是台湾长宏影视公司总裁，台湾娱乐圈举足轻重的大佬。近年来他投资拍摄的影视剧有《倚天屠龙记》、《至尊红颜武媚娘》、《大灌篮》、《刺陵》等，一手捧红了贾静雯、释小龙、郝邵文等演员。

“江南案”的另一个杀手董桂森没有回台湾，案发后他跑路去了菲律宾，又辗转潜逃日本、泰国，最后在巴西被捕，引渡回美国。法庭上，董桂森宣称：“这不是个人的行为，也不是帮派的行为，而是政府的行为。”1991年，服刑的董桂森在美国宾州路易斯堡联邦监狱被杀身亡。

少年子弟江湖老。“江南案”发生时，陈楚河八岁。“有天学校中午吃饭时间，我从新闻广播中听到爸爸的名字，心中隐约觉得这不是件好事。”如今已是偶像剧明星的陈楚河说，“爸爸过世前卧病在床时，脑中想的已经不是如何平反江南案，而是想着病要快点好起来，然后带着我和弟弟去度假钓鱼。”

2007年10月，陈启礼在香港病逝。11月，他的葬礼在台北举行，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参加葬礼的黑帮分子约九千人，除了竹联帮和其他台湾黑帮，还有来自香港三合会、日本山口组等著名黑社会组织的代表。这些黑衣人与近千名全副武装的警员一起，占据了当天全台湾的九个电视新闻频道。陈启礼晚年定居柬埔寨，热心商业和慈善活动。

让我们说回“江南案”引发的台湾政坛地震——白狼把矛头指向蒋孝武，等于断送了后者的政治前途。1985年底，蒋经国通过美国《时代》周刊表示，“蒋家人今后不能也不会参选‘总统’。”翌年3月，蒋孝武被派驻新加坡，淡出权力核心。

1987年7月14日，台湾解严。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和党禁，推动台湾民主化进程。同时，由于“江南案”之后的警方强力扫黑，许多大佬入狱，也造成了帮派势力重新洗牌。黑道分子争相努力漂白身份，向政界和商界渗透，为90年代开启的台湾“黑金政治”埋下了伏笔。

1990年，台湾当局支付给刘宜良遗孀崔蓉芝145万美元，和解结案。

二十多年过去，“江南案”的真相却依然湮没水下。“小汪（汪希苓）是可以牺牲的家臣，我们又不能动蒋经国，那会威胁到台湾安定。所以只能挑出蒋孝武，毕竟虎毒不食子。”张安乐说，“蒋孝武在这件事上，可能是最冤枉的。”

而陈启礼直到死，都不愿对外界多谈“江南案”。他倒是记得杜月笙说过的话：“帮派人物像个夜壶一样，政客们需要的时候拿来用一用，不需要的时候就踢到一边。”

远东第一监狱即将关闭 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名人“住客”

作 者:隋寄锋






江上青烈士
1911—1939





上

海提篮桥监狱今年刚刚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7月中旬就传出其即将关闭的消息。提篮桥监狱在它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先后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侵华日军、汪伪政权、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关押过近代史上的众多要犯。因提篮桥监狱规模宏大，设施齐全，收押犯人最多时达8000余人，因而被称为“远东第一监狱。”

英国典狱长与印度看守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美国、法国先后在上海设立租界。小刀会进攻上海时，英美法三国租界建立“上海工部局”，组织警察自卫。1862年，法租界退出工部局，英美租界则宣告合并，是为上海公共租界。1903年，提篮桥地区建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当时主要建筑有两幢4层的监狱，牢房480间，加上食堂、办公楼、医务所等，总共占地10亩。后来不断扩建，到1935年，占地面积达60.4亩，有10幢4—6层的监狱，4000间牢房。

监狱设在公共租界，典狱长都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在狱中工作的多是印度人，有少数白人。因为印度人头上扎着红布，被上海人称为“红头阿三”。1930年6月，因为被印度看守们敬重的一个人没能被选为负责人，以致引发200多名印籍工作人员罢工。英国典狱长一怒之下，把所有参与罢工的人一并开除。为了填补劳力的不足，提篮桥监狱大量招聘华人，使中国籍看守数量逐年增加。

租界内自设监狱，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但也为中国革命者提供了一块栖身之地。提篮桥监狱最早的两位名人“住客”是章太炎和邹容，前者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称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后者在《革命军》鼓吹反满，两篇文章都发表在《苏报》上，使清廷统治者极为震怒。清政府本想引渡两人或对他们进行单独审判，但因为《苏报》社在上海公共租界内，不肯将章太炎和邹容交给清政府。清政府只好在租界内起诉二人，双方各请律师对簿公堂，结果判处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若是由清廷判决，两人必定会被处以极刑。

邹容年少气盛，一来常和狱卒发生冲突，二来不满狱中伙食，所以怨气很大。章太炎就为这位小兄弟讲授佛学，说：“学此可以解三年之忧矣。”但服刑一年多后，邹容还是“以愤激内热致疾”。章太炎要监狱方面请医生给邹容治病，不被允许。至1905年初，仅仅21岁的邹容病故。因此时距离邹容刑满释放只剩两个多月，以至有人怀疑是清政府暗中下毒谋害。

狱中的地下党支部

很多中共领袖都曾在提篮桥监狱服刑。1929年，时为中共上海市闸北区区委副书记的张爱萍在散发传单时被捕，以“扰乱交通秩序”的罪名在提篮桥监狱里被关了20天。他和另外两名囚犯一同被关在一间只有3平米多的小牢房里。张爱萍在狱中做过一首诗，立志“牢笼砸开铁锁链，万枪杀回斩豺狼”。张爱萍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等

职。

只是几个月后，张爱萍的好友江上青也被抓进了提篮桥监狱。江上青生于1911年，江苏扬州人，早年参加中共革命。他在上海艺术大学读书时，因为组织游行被捕，先是关在提篮桥监狱，后转往苏州。1939年，主持皖东北工作的江上青遭遇敌人伏击，牺牲时年仅28岁。江上青的长兄江世俊将次子江泽民过继给了弟弟，由江上青遗孀王者兰抚养。

提篮桥监狱关过的最重要的共产党“要犯”是任弼时，他被捕后自称是从江西到上海打工的失业青年彭德生。中共党组织请上海著名律师潘震亚为任弼时等人做无罪辩护，最后任弼时获刑40天。在服刑期间，任弼时教一同被捕的上海总工会青年部部长周朴农唱当时共青团团歌《少年先锋队队歌》。

因为中共革命者在被捕后，通常使用化名、虚报身份，所以身陷提篮桥监狱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没有被判重刑，不久即获释。提篮桥监狱从来没少了共产党人的身影，1944年监狱看守中甚至成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由赵英盛任支部书记。

谷寿夫上海受审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接管了提篮桥监狱。1943年，加入轴心国一方的汪伪政权宣布收回租界，将提篮桥监狱更名为“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

随着抗战胜利，有一批大小汉奸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在汪精卫投敌前，曾建立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后任伪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梁鸿志即在其中。经审判，梁鸿志被判处死刑，在提篮桥监狱执行。这里此前从没枪决过犯人，只好临时将属于监狱的一块菜园子改造成刑场。1946年11月9日，梁鸿志穿戴整齐，写下三封遗书、留下手表、小女儿照片等物品后就刑。

汉奸们固然罪不容赦，但毕竟只是傀儡，幕后的侵华元凶才是罪魁祸首。提篮桥监狱原本用于关押外籍犯人的一幢楼房被盟军借用，不少重要的侵华日军将领都曾是这里的“住客”。

1946年初，美军军事法庭成立，审判日军第34军参谋长镝木正隆少将、日本汉口宪兵队司令福本龟治大佐等18名战犯。这是首次在中国境内审判侵华日军，飞虎队司令陈纳德将军也到场旁听。第一次开庭针对的是一起美军被俘飞行员被日军士兵虐杀的案件，在中国目

击者出庭作证后，法庭判处镝木正隆等5人死刑，福本龟治等12人有期徒刑，有1人无罪释放。

谷寿夫在中国臭名昭著，他在1937年12月首先率第六师团攻入南京，命令和纵容士兵对老百姓大开杀戒。谷寿夫本人不仅用军刀杀人，还强奸中国妇女十余人。1946年8月，乙级战犯谷寿夫被从东京引渡回上海，关押在提篮桥监狱。谷寿夫的狱中生活还不错，8平米的囚室中有桌椅，有卫生间，每顿饭都有荤有素。

中国国防部设立的上海军事法庭开审谷寿夫后，谷寿夫闪烁其词，声称："1937年12月21日，我奉命到芜湖，在南京只待一个礼拜，没有听说屠杀消息！"两个月后，中国政府下令将谷寿夫押往南京继续审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上海军事法庭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为谷寿夫一人包了半节车厢。谷寿夫在南京被判处死刑。

研究提篮桥监狱的专家徐家俊统计说，在上海被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大都是在提篮桥监狱中被执行枪决的，如日军情报机关重要首脑芝原平三郎、崇明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中野久勇等。此外，在提篮桥监狱关押期间，日本在台湾的最后一任总督安藤利吉服氯化钾自杀、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因脑溢血突发死亡。

陈璧君狱中反省

审判汉奸、战犯结束后没不久，国民政府也走到了末路。1949年5月，解放军占领上海前三天，中共在提篮桥监狱的地下党支部就发动事变，攻占了监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监狱后，将其改名为"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

新政府将汪伪政权的"第一夫人"陈璧君从苏州转移到了提篮桥监狱。陈璧君与日本女间谍中岛成子一同被关在一间8平米的囚室里，里面有桌椅板凳，还有抽水马桶。当时58岁的陈璧君身体不好，病历上有心脏病、高血压、胆结石等几种疾病，狱方让她睡在囚室里唯一的铁床上，中岛成子只好打地铺。

以前在国民政府的牢中，因陈璧君是同盟会元老，狱吏尊她一声"汪夫人"，到了人民政府治下自然不能保留这种特权。监狱规定，所有犯人称统一编号，陈璧君是"20304"，通常简称304。不过陈璧君作为一个特殊的犯人，各方面还是受到很多优待，监狱允许她优先阅读书刊、安排特护。陈璧君从1949年到提篮桥监狱， 到1959年去世为止，在这里住了十年，但其中住院时间1791天。

或许真的是被人民政府的这种优待所感动，陈璧君曾在提篮桥监狱自述说，她今后要“把时间放在反省过去，了解现在，瞭望将来，改造自己，使自己能早日重新做人，争取能参加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1951年5月，提篮桥监狱由法院划归上海市公安局，更名为“上海市监狱”。1983年7月，监狱又划归司法系统领导。1995年6月，更名为“上海市提篮桥监狱”，这个名字沿用至今。

（参考资料：徐家俊《提篮桥监狱》、冯自由《革命逸史》、蒋建《江上青对创建皖东北根据地的贡献》等）

四库七阁：书与楼的百年文化苦旅

作 者:韧雾






欽定四庫全書







随着“康乾盛世”的余晖远逝，进入内忧外患的近代历史，四库七阁曾经的安宁祥和不复存在，时局动荡，战乱频仍，书与楼的厄运接连不断，它们与近代中国一起走过百年的风雨沧桑……

位于杭州西山南麓的文澜阁经历最新一次七年大修后，于2013年6月7日重新对外开放。曾经存放《四库全书》“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焕发昔日光彩，唤醒尘封的历史。公元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编纂《四库全书》。此时他在位有37年，“康乾盛世”已达顶峰，社会政治经济都处在安定繁荣的时期。前有宋太宗编《太平御览》等“四大书”、明成祖编《永乐大典》、祖父康熙编《古今图书集成》等鸿

书巨帙，乾隆向来好大喜功，莫不想借此标榜自己的文治武功。

《四库全书》就此成为中国帝制时代官修的最大一部丛书。卷帙浩繁，共收录古籍3503种、79077卷，装订成36000余册，分经、史、子、集四部，直接影响了此后中国目录学与图书分类法的常式。参与编撰者360余人，均是当时的饱学之士，加上缮写装订等人员，多达4000人左右，编辑工程之规模前所未有。

乾隆修《四库全书》，除其所宣称的“嘉惠艺林，启牖后学”，“用昭文治之盛”外，也另有深意。清廷向全国大规模征书的同时又大量毁书、禁书，据统计，全毁的书达2453种，占全部收书数量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对编入《四库全书》的著作，也多加删改，清除反对满清统治的思想和典籍，即后世所谓的“寓禁于征”。到1782年《四库全书》修完，十年间共兴大小文字狱34起，密度之高，酷烈之甚，举世骇然。

乾隆先后批建四座御用藏书楼，用以典藏《四库全书》：北京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皇宫的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又称为“内廷四阁”。1782年，将三部《四库全书》赐予江浙两省，颁布上谕说：“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分别藏于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统称“南三阁”。

南三阁的藏书开始允许士人借阅传抄，有专人建立收发档案，办理手续；后为保护图书，办法从严，“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这已有了近代图书馆的雏形。东南广大文人学士得以就近赴阁读书，校抄秘籍，江南私家藏书中因此出现一种新的类别——“阁抄本”，实际上推动了江南文化的发展。但清廷借此一举也是为了统一思想，消灭异己。鲁迅就曾评价：“《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功魁祸首”，体现了后人对《四库全书》的复杂评价。

四库七阁建筑大体近似，皆出自一个源头——明代范钦创立的私人藏书楼天一阁。天一阁位于浙江宁波，建于明代嘉靖末年，数百年岿然屹立，享有盛名。1774年乾隆下诏，称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命杭州织造傅寅等人亲自去详细考察，“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并其书架款式若何？”随后修建七座藏书楼的体例，均仿照天一阁的格局营建。七阁均继承天一阁前有曲池假山的设计，便于火灾时引水；阁体山墙厚达三尺四寸，内墙四周还安装了护墙板，用以防潮；为免生虫蚁，七阁

中书格书匣皆用上等楠木，每当阴雨天气，散发出的楠木气息混合纸墨清香，弥漫全阁。

天一阁上下两层，面阔六间。七阁立面造型仿天一阁，为重檐楼阁，内里却采用了“明二暗三”的建造方式：利用上下楼板的腰部空间，巧妙增设一个夹层，使得看似两层实为三层，既节省工料，又增加了体量。建筑从油饰彩画到屋顶墙体均以寒色为主基调，哪怕是在金碧辉煌“一团火气”的紫禁城中，书阁房顶皆铺以黑色琉璃瓦件，用绿色琉璃镶檐头，建筑术语称为“绿剪边”。这源自古人的五行思想，黑色代表水，取其以水克火之意。四库七阁在设计思想、内部构造与环境协调统一等方面，更加完善合理，有人称它代表了中国古代藏书建筑的最高水平。不过随着“康乾盛世”的余晖远逝，进入内忧外患的近代历史，四库七阁曾经的安宁祥和不复存在，时局动荡，战乱频仍，书与楼的厄运接连不断，它们与近代中国一起走过百年的风雨沧桑……

文渊阁

巧藏故宫“半间房”

明代故宫中便有文渊阁，建于明洪武时期，当时即为宫中藏书之所，还是官员办公、编书、进修之地。永乐元年（1403年），解缙等人就于文渊阁开馆编纂《永乐大典》。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将文渊阁藏书中每种取一部运到北京。1449年南京的文渊阁毁于皇宫火灾。明成祖仿照南京宫殿建紫禁城，据文献资料来看，北京明文渊阁是砖城形式的库房建筑，与现存文渊阁在建筑形制及使用功能上迥然不同。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下令放火烧宫，明文渊阁随之悉为灰烬，偌大紫禁城中只有武英殿唯一幸存。

1774年，乾隆下令兴建文渊阁，位于紫禁城外朝东部、文华殿之后，于1776年建成。阁前凿方池，上架白色石桥，池中引金水河之水。阁后叠石为山，宛如屏障，四周间植百年古柏。阁东侧有一碑亭，形似驼峰，盝顶黄琉璃瓦，这是宫中唯一的南式建筑，亭中立有石碑镌刻乾隆所撰的《文渊阁记》。阁身整体的疏冷色调，在一片红黄暖色的紫禁城中，显得越发幽雅沉静，确是沉潜读书的好处所。

如今游览紫禁城，常听得流传一种说法：整座故宫共有房间9999间半，传说避天庭万间之讳故减去半间。实际据统计，目前故宫里殿、宫、堂、楼、斋、轩、阁的总间数是8707间。但这所谓的“半间房”，出处来自文渊阁。因故宫中的建筑每座殿宇间数一般均为单数，从无双数，而文渊阁又要仿照天一阁结构面阔六间，工匠们遂在

阁楼西边梢间构一楼梯间，横广约为半间，既不违祖制又符“六成”之义，即为传说中的“半间房”。

1782年，首部抄录装订完成的《四库全书》入藏文渊阁。乾隆对文渊阁非常重视，阁中书柜都是用上等金丝楠木制成，当时清宫里已很少有金丝楠木，最后一点几乎全用在了文渊阁上。他还在文渊阁设宴赏赐编纂《四库全书》的总裁、总阁、总纂、纂修、校理等各职人员，于院中搭台演出小戏，一时盛况空前。每年春秋两季，原在文华殿与东西配殿举行的经筵赐茶活动，改在文渊阁内进行。清宫还规定，大臣官员中如有嗜好古书勤于学习者，经允许可到阁中阅览书籍，但不许携带书籍出阁。

藏于文渊阁的《四库全书》，在溥仪出宫后，于1925年移交故宫博物院保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加紧侵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国民党政府为防不测，将故宫内藏部分珍贵文物南迁。1933年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运至上海。同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将之拨归刚在南京筹备成立的中央图书馆，南京沦陷前，辗转迁至重庆郊区，抗战胜利后复迁回南京。1948年10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被运至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文源阁

毁于圆明园大火

1774年圆明园内兴建文源阁，在原有建筑四达亭的基础上略为增葺，次年继文津阁之后告成，是七阁中建成的第二座。文源阁坐落在圆明园“水木明瑟”景区的北面，与“舍卫城”隔湖相望。乾隆皇帝当政六十多年，住在圆明园的时间居多，文源阁是他光顾最勤的一座藏书阁。乾隆因年事已高，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又命人“撷其菁华”，编出一套规模较小的《四库全书荟要》，分缮两部，一部藏于故宫御花园内的摛藻堂，一部藏于圆明园内的味腴书屋，以备随时阅鉴。

文源阁地处最大的皇家园林之中，与湖光山色融为一体，堪称建筑与园林艺术结合的典范。阁前水池中，竖立着一座当年圆明园中最大也最为著名的花石纲，高达二丈余，乾隆亲自将其命名为“玲峰”，意为“玲珑的山峰”。石上多达84个玲珑剔透的孔洞，清莹月光映入柔波，起风时呜咽作响，妙趣天然。因其超过了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那块81孔洞的奇石，乾隆还曾称玲峰“胜米老”。他每次驻跸圆明园，常来此登楼读书，对月赏石，留下大量题咏文源阁的诗篇。

此番良辰美景，如今已无缘得见。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大火肆虐三日，文源阁与所藏《四库全书》，以及味腴书屋的《四库全书荟要》，均在这场浩劫中化为灰烬。现在去圆明园遗址，仅余部分文源阁阁基的青砖，依稀可辨，曲池已涸，荒草遍地，令人唏嘘感叹。清朝垮台后，园中大量石阶石柱被人盗取，挺拔峻秀的“玲峰”也未能幸免，民国时被两股土匪同时看中，争夺不休，最后，为了让彼此都得不到，竟干脆将其炸为两截。原文源阁东侧御碑亭中刻有乾隆手书《文源阁记》的石碑，文字仅存一半，经修补后，如今挪至北京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分馆院内保存。

文溯阁

渡尽劫波全书在

文溯阁在北四阁中建得最晚，1781年动工，次年始建成。文溯阁增建于盛京（今称沈阳）故宫的西路，前临嘉荫堂，后依仰熙斋，是七阁中唯一未能与水相伴的一阁。

乾隆将建在盛京故宫的藏书阁取名文溯阁，自言取“溯涧求本”之意，以示自己不忘祖先开基创业之艰，兢兢业业治理国家。1783年9月，73岁高龄的乾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巡幸盛京，书阁合一，实现了他在文溯阁读书的愿望。

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漫长历险始于1900年。沙俄当年参与八国联军，于10月份占领盛京。据史料记载，当时文溯阁院落改为俄军马厩和炮兵营房，阁门洞开，所藏《四库全书》中有39卷被窃。1914年，袁世凯为称帝作准备，在故宫设立古物陈列所，调集盛京热河两行宫所藏宝物进京。文溯阁《四库全书》运抵北京，一时难寻合适的藏书场所，只好置于故宫保和殿。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后，古籍被冷落一隅，蛛网尘封。到1922年，清室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文溯阁《四库全书》出售给日本人，价格已议好，谈定120万元。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首先听闻此消息，随即致函教育部，竭力反对此事。后迫于舆论压力，清室放弃卖书，文溯阁《四库全书》终不致流落异邦。

1925年，沈阳欲筹办图书馆，一些有识之士提出文溯阁《四库全书》当完璧归赵。由杨宇霆致电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称文溯阁藏本为“奉省旧物，仍归奉省保存”，张学良也曾亲自出面进行交涉，经多方争取，文溯阁《四库全书》于1925年8月押运回沈阳。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文溯阁落入日本人手中，后以伪满洲国国立图书馆之名代为封存《四库全书》。抗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曾两次电令运走《四库全书》，均未实现。直到1949年后，东北图书馆（现辽宁

图书馆）才接收了文溯阁《四库全书》。

1950年10月，朝战爆发，战火很快烧到鸭绿江边。《四库全书》连同一些宋元珍善本图书运出沈阳，存放在黑龙江讷河城外一所改成小学的关帝庙里。1952年夏，讷河水患，《四库全书》不得不改迁北安。直到1954年朝鲜停战后，《四库全书》才得以运回沈阳文溯阁。十几年后，1966年中苏关系紧张，珍宝岛战云密布。出于战备考虑，需疏散保存的《四库全书》再遭迁徙之苦，这次中央下令调拨甘肃省图书馆保存。文溯阁《四库全书》历经行程近三千公里，藏于兰州市郊的一个战备书库中。此后辽甘两省为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归属纷争十余年。2002年甘肃省专门为《四库全书》兴建兰州黄河岸畔九州台的藏书楼，现藏其间。

文津阁

鲁迅为四库全书奔走

文津阁地处承德避暑山庄，于1774年秋动工，次年夏建成，这是内廷四阁中第一座建好的藏书楼。文津阁位于山庄西北隅，千尺雪景区之北，坐依青山，流水环绕，是避暑山庄的园中之园。“收将大段天一范，兼取小斋京口米。”乾隆朝大臣钱载的两句诗，道出了文津阁造园借鉴取法的对象。“天一范”即天一阁，“京口米”则指的是宋代大书画家米芾在京口（今江苏镇江）的住处“宝晋斋”。乾隆欣赏宝晋斋“东有月台西有山”的意境，于是命人在阁前建起一座占地约800余平方米的巍峨假山，气势恢宏，又在假山西头修趣亭，东头筑月台，还将墙外天然青翠的西山借景入画。

乾隆对在此建阁贮书十分得意：“山庄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则闾阎日富，礼乐日兴，益兹文津之阁，贮以四库之书，地灵境胜，较之司马迁所云名山之藏，岂舍霄壤之分也哉？”皇帝常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各族首领和外国使节，皇家藏书楼建在此地，也是标榜天朝的文治武功。

1909年，在张之洞的建议下，清政府决定筹建京师图书馆。为充实馆藏，当局议定将文津阁《四库全书》和避暑山庄各殿陈设的典籍一并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但后因辛亥革命而中止搁置。民国政府成立后，教育部接办此事。当时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全国的图书馆工作，他立即着手以教育部的名义通知热河都统姜桂题，拟派专人往取。姜桂题表面尊重指令，实则阳奉阴违，他以建设热河图书馆为名，想自己扣留一部分珍贵古籍。不等教育部来人，擅自将《四库全书》运往北京，其余殿阁藏书则留在热河。

1914年1月，教育部获悉文津阁《四库全书》竟已运抵北京，立刻派人去车站接书。谁知《四库全书》早已被内务部拦截，运往故宫古物陈列所。鲁迅闻此变故，心焦如焚，他深知，时逢乱世，如果《四库全书》不能及时得到很好的保管，很有可能散佚毁损。他为此事四处奔走，1915年以教育部名义致函内务部，劝其移交《四库全书》。几经交涉，内务部同意移交，鲁迅带人亲自前往点收。但他们节外生枝，又将书架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扣留，声称“坊间刻本甚多，图书馆不难购备”。书架与书分离于保藏无益，而“简明目录”更是查阅使用《四库全书》的门径和钥匙，于是鲁迅再三据理力争，直至1916年底方移交京师图书馆，馆前大街因此改名为文津街。

其实，鲁迅对于《四库全书》的评价不算高，他不满清政府随意抽毁删改古籍的文化专制，曾评价道：“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而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他为文津阁《四库全书》入藏京师图书馆积极奔走，更多是一种职业精神的号召。1928年，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分馆。时至今日，文津阁《四库全书》与《敦煌遗书》、《赵城金藏》和《永乐大典》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

文汇阁 文宗阁

双双毁于太平天国战火

文宗阁建于1779年，文汇阁建于1780年，七阁中，两阁身世最为接近。它们前身均是乾隆行宫的御书楼，最初同藏赐书《古今图书集成》，后因藏《四库全书》被赐名。两者都在江苏省，相距不过几十公里，行政辖属上同归两淮盐政管理。命运又如出一辙：1853年太平军攻占镇江，文宗阁毁于战火，紧接着1854年太平军攻入扬州，文汇阁随之被付之一炬，两者均阁书俱焚，荡然无存，令人叹惋。

镇江文宗阁当初建成仅用一年时间，且诸多工料都是由当地人捐献的。对于文化的热心程度可见一斑。文宗阁是七阁中唯一题名不见水旁的。有人说因文宗阁位于金山上，四面皆水，不缺水；另说镇江历来有水患，加水过犹不及等等。实际上文宗阁兴建之初，原是用来贮藏《古今图书集成》的。乾隆对祖父康熙敕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备加推崇，将其誉为“文宗今古”、“空前绝后”，遂赐名“文宗”，后是沿袭了这一称谓。

同治初年，曾国藩欲创办金陵书局，他不相信文宗阁文汇阁藏书

会一本不留，曾委托幕僚莫友芝前往镇江、扬州收购遗书。1865年，莫友芝专程来到江苏，悉心寻访后空手而归。但他提到一个线索："扬州库书虽与阁俱焚，而借录未归与拾诸煨烬者，尚不无百一之存。"据有关资料，国家图书馆今藏《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四册，经史子集各一，经部首页钤有莫友芝藏书印。由此看来，他的江苏之行还是有所得的。也有消息称，文汇阁《四库全书》亦有少量残本存世。

镇江和扬州一直在筹划复建藏书阁。早在1933年，镇江乡贤志士吴寄尘等人便出资建起一座"绍宗国学藏书楼"，"绍宗"二字显示了恢复文宗阁的意愿。2011年10月26日，镇江文宗阁复建竣工，对外开放。目前扬州市也已启动重建文汇阁的工程，计划于2014年建城2500周年之际完成。

文澜阁

几代传抄，书更完整

文澜阁建于1782年。1860至1861年，太平军两度攻陷杭州城，文澜阁一度被征用为军营，尔后无人管理，阁坍书散。江南著名藏书楼八千卷楼的主人丁申、丁丙兄弟，此时避祸于杭州西溪，一日偶见"市中卖物，率以字纸包裹，取视皆四库书"，两人大惊失色，乃知阁书危亡。丁氏兄弟冒着战乱风险，许以厚酬，雇人乘夜潜入杭城，摸黑捡拾满地残籍，"每夕往返数十里"；又托书商以收购字纸名义，留意收集流散民间的阁书。半年后共集到阁书8689册，占全部文澜阁本的1/4。原任典守阁书的陆光祺为此绘图纪事，浙江巡抚左宗棠题为《书库抱残生》，一时传为佳话。现存八千卷楼的藏书中常可见到"书库抱残生"的藏书印，典故正由此而来。1881年，清廷拨款重建文澜阁，基本恢复原貌，劫后复存之书，得以栖身于此。

丁氏兄弟从自家藏书楼，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等江南藏书名家处，遍觅精善之本，招募了100多人抄写，组织抄书26000余册。到了民国时期，浙江省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继续组织补抄，在北京杭州两地设立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馆，此次补抄之精细，为时人称颂，历时七年，又称"乙卯补抄"。1923年至1925年，接力棒传给了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张宗祥。他认为工程浩大，个人之力甚微，于是由其主持了官府组织的补抄工作，史称"癸亥补抄"。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最后完成的《四库全书》比原来更为完整。原被清廷删改漏收的典籍，都借此机会恢复补齐，补抄依据的版本优良，集清末全国藏书楼之精华。

1937年日寇在上海金山卫登陆，杭州岌岌可危。日本方面对文澜阁《四库全书》觊觎已久。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和他的老师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及时组织了阁书西迁，《四库全书》被分装140只木箱，开始流亡之旅。历时半年辗转五省，行程2500公里，1938年安全运抵贵阳。文澜阁《四库全书》后再转迁重庆市青木关，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返抵杭州，其间曾遭遇日机轰炸、匪患，途中碰撞、水淹等，历经沧桑，一言难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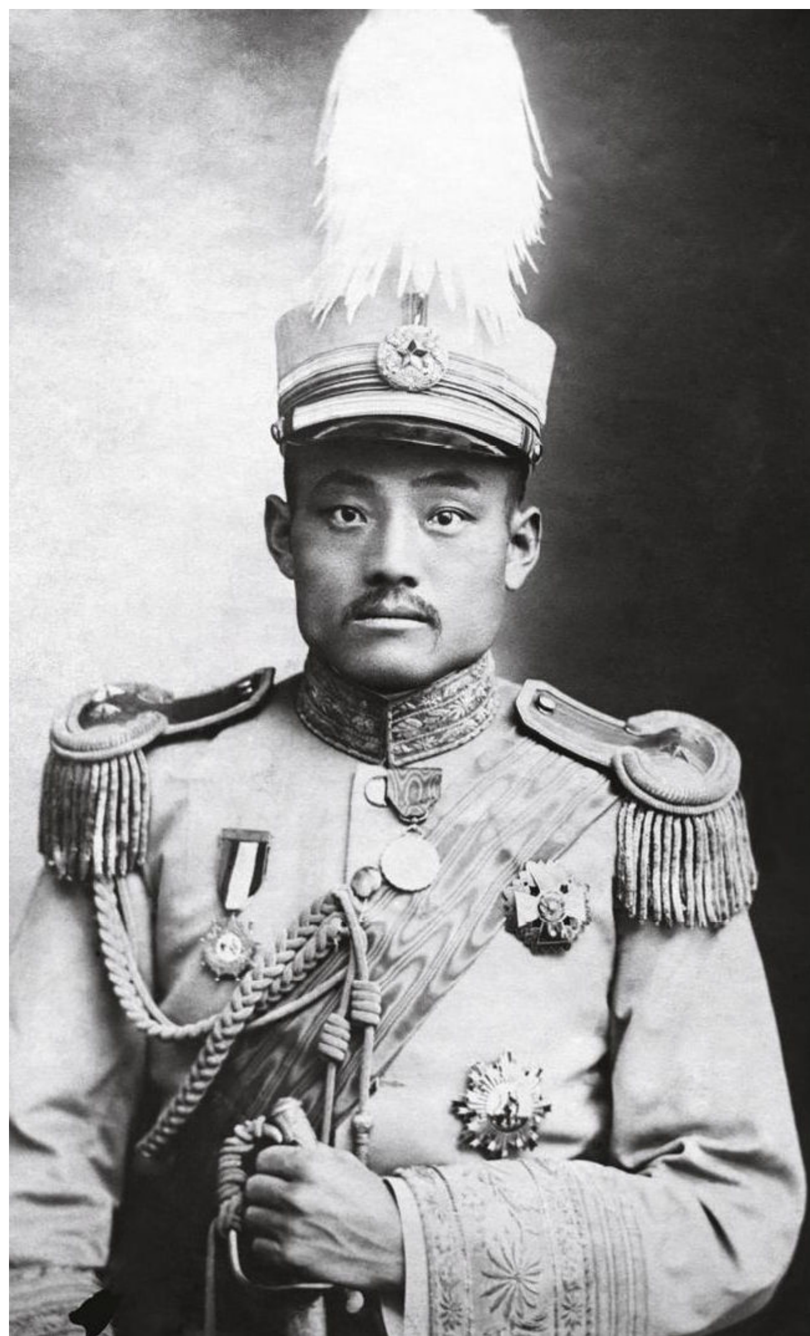
文渊阁《四库全书》并不存放阁中，一直保存在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即西湖边享有盛名的孤山馆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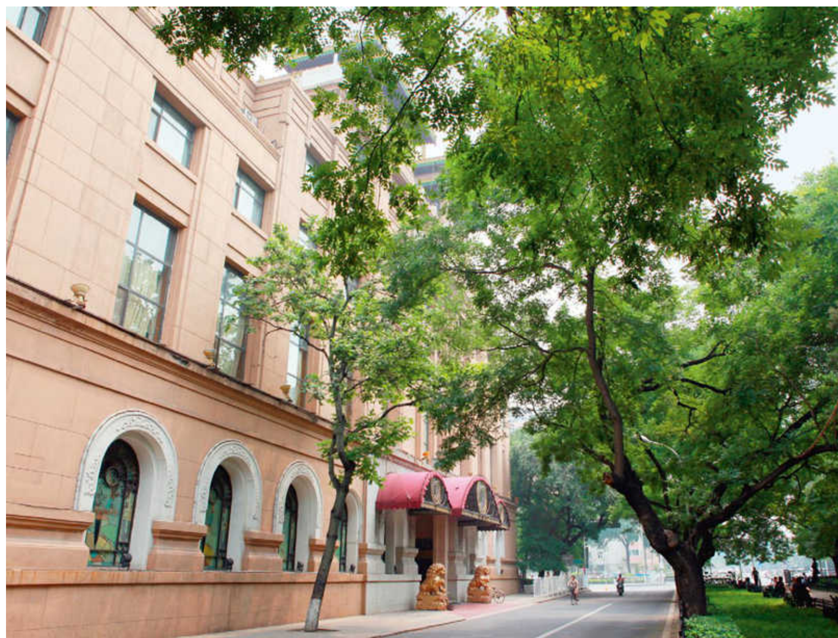
民国北平第一社交舞台

作 者:周斌











张敬尧暴毙。

死亡地点就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二层。

1933年5月7日凌晨，这位曾经的北洋军阀“皖系”大将、不可一世

的湖南督军正在饭店房间里洗脸时，被突然闯进来的刺客近距离连击三枪毙命。

其实张敬尧对有人杀他早有防备，但他肯定不会想到会有人在六国饭店杀他。

六国饭店有深厚的帝国主义势力撑腰，在政治上享有特权，治安由六国军警宪兵轮值，中国军队和警察别说进饭店抓人，就是进入饭店所在的东交民巷使馆区都需要大费周折，因此，六国饭店成了乱世中的头号安全岛，各方势力慑于各帝国主义的实力，都不敢在这个地方造次，哪怕窗外兵荒马乱，饭店里也是歌舞升平，花团锦簇。不少下台失意的军政要人、文化名流如果不想远遁海外，首选的避难地就是这里，拿钞票就能入住，安全、方便、隐蔽，而且不耽误享受。由于中外党政军商要人云集，六国饭店遂成民国北平的第一社交场，各色人等在这里勾兑权力，或潜伏、狩猎、刺探……

八国联军开路，六国资本合股

1901年，一家名为Grand Hotel des Wagon-Lits的西式宾馆在北京玉（御）河东侧建造起来，造型是很传统的欧式山字形两层砖楼，古典庄重，乍一看还以为是教会建筑，这就是六国饭店前身，是中国第一家国际连锁酒店集团酒店。Wagon与大众汽车标志中volkswagon后缀是一个意思，指车辆，饭店的主人也确实是干这行的，其欧洲的母公司名为国际卧铺车公司（Compagnie Internationale des Wagons-Lits），比利时人乔治内吉·麦克尔于1872年创办，简写为CIWL。这家公司以提供带卧铺和餐饮的车厢而著称，也是著名的东方特快列车经营者，还与今天很有名的索菲特、铂尔曼等豪华酒店品牌有血缘关系，论起来算是祖师辈企业。

为什么CIWL要在遥远的北京建起一座大型饭店？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签订《辛丑和约》规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地，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东交民巷一带成为“使馆保卫界”，中国人被全部迁出，只有穿着制服的公使馆仆人和雇员准许出入，土地房屋除西边清廷的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外全部被充作各国使馆专用。新公使馆区位于内城宏伟的南城墙内，北面和东面以一块地势略为倾斜的“缓冲地”为界——用作打马球、踢足球、学骑马和训练公使馆卫队的场地，俨然已成国中之国、一个迷你版的欧洲。比定约前扩大了九倍的庞大使馆区，还吸引了外资商业企业、店铺、教育机构和大批非外交人员进驻，六国饭店最初迎合的就是这部分人的需求。

六国饭店就处在公使馆区，与比利时使馆合占了太仆寺地块。太仆官职主要负责皇帝的舆马和马政，有点像西游记中弼马温的角色。太仆寺虽是小衙门，可是地理位置特别好，它西边是玉河桥，东边是台基厂、洪厂胡同，南边是城墙（现在的二环路），北面是东江米巷（现在的东交民巷），是一块既独立又便捷的地块。

饭店落成后生意平平，股东认为生意不好全是饭店建筑与定位惹的祸，1905年，由英国人牵头，重新募资，吸纳了英、法、美、德、日、俄六大强国资本，将原饭店推倒重建，从此得名“六国饭店”。新建筑由英国人爱尔德（Alert Edmund Algar）设计，采用的是“三层砖石结构的法国古典主义样式，底层处理成开有券窗的坚实基座，顶部覆有高高的孟莎式屋顶”。饭店内部有客房200余套，是当时北京最高的洋楼之一。改建中也整修了玉河两侧的马路，并种上林阴树，拓宽了玉河西侧的街道，使饭店的正面显得开阔整洁。饭店正门附近有一座横跨东西的玉河小桥，这样，六国饭店既有便利的交通，又相对僻静、安全。饭店主楼的屋顶上高高挂着列强的旗帜，昭示它的特殊身份。后来这条玉河被完全填平建成了街心公园，放有座椅，开有小道，余下是草坪绿植，十分优美。整个饭店的西侧只有一个不算大的正门供出入，一层全部是顶部带有椭圆边的券窗，二层及以上则是长方形窗，整齐排列，颇有韵律感，像一座堡垒。门外的墙边靠着一溜拉洋车的车夫，殷勤地注视着行人，等待出手阔绰的客人召唤，树阴下还辟有一排车位，供豪主们停放轿车。

六国饭店宽大窗玻璃在阳光下闪出耀眼的光芒，我们今天视为光污染的玩意儿，在当时却能给路过的中国人以极大的心理震撼。在六国饭店的逼视下，中国传统庭院的舒缓、儒雅荡然无存，显得阴晦、弱小、不自信。

上流社会的欢乐岛

改建后，六国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倒不是因为建筑艺术，而是因为公使馆区放松了对中国人出入的管制。1917年，复辟失败后的张勋将军就藏在荷兰的公使馆内，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外交使团出于不同的动机屡次要求和执行“避难权”，为前来避住的各界人物提供庇护，六国饭店也因此以收容被政府撵走的要人而出名。出入饭店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除了各国公使外，基本都是大小军政官员、巨商豪贾以及其他社会上层人士。

电话、电梯、暖气、自来水、卫生间等酒店设施，六国饭店应有尽有。客房内是豪华舒适的西式床，雕有嫦娥奔月的中式红木椅。房间里的穿衣镜也让国人新奇，一米多高的镜子两边有两块稍微小一点

的镜子，方便照两侧，人在镜中显得很立体。

饭店经理是瑞士人和法国人，新员工培训的内容也很广泛，包括基本礼仪、着装、服务技能、外语等。为客人提供的服务涉及送茶、财物安全、人身安全、接待访客、夜间巡查、叫醒、清洁卫生、送洗脚水、倒夜壶、提供商业信息等方方面面。

“1917 年新装修后的北京饭店的房间价格分银洋 15 元、22 元、35 元三个等次，月包房价格，分别为 250 元、300 元和 450 元”，同档次的六国饭店也大致在这个层次上。当时，北京其他中西式旅馆的豪华套房价格仅为4元，其他房间价格为1-2 元，公寓的月租费最高者为 4 元，便宜者仅 1～2 元。六国饭店的日房费是普通标准的四倍，月房费达到普通标准的百倍。

虽然价格贵，但六国饭店提供了当时中国最稀缺的一项公共产品——安全，高附加值的服务让六国饭店赚得盆满钵满。在北洋时期，很多人到六国饭店避乱，“人多的时候没有客房，好多人带着细软睡在大堂里，就这还要交很高的房费。”

1925年，六国饭店生意好到需要扩建，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高了一层。扩建后，饭店占地约2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拥有客房300套左右，提供异国风味佳肴，还有会议厅、游艺厅、电影厅、台球室、乒乓球室和游泳池，屋顶巧设花园、可举办舞会，能容数百名客人。

六国饭店是当时城里最豪华的两家饭店之一，另一家是法国人开的北京饭店，在北京城市史上，它创造了很多第一。例如它第一个给北京人带来正宗的西方面包、咖啡、牛排，后来北京的洋泾浜洋菜馆多了，很多都是拉洋名糊弄没见过世面的国人的。据说当时还有人弄了个可笑的英国菜系，殊不知英国人吃得粗糙，哪里有什么像样的菜，也就法餐还算是能有菜系。

六国饭店还第一个为北京引入了一套完整的西方餐饮礼仪：餐巾如何叠放、刀叉如何使用、用餐时尽量不发出声响等，最有名的一条还有“女士优先”这样的绅士法则，让来此的国人仿佛一夜之间都成“文明人”了。

六国饭店的舞厅名噪一时，交际舞就是从这里开始流行于北平上流社会的。1928年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就是在六国饭店舞会上，依靠娴熟的舞步，卖弄姿色迷住了张作霖的副官，套出了张作霖回东北的确切时间，使关东军得以在皇姑屯炸死这位不合作的东北军大帅。

透过六国饭店，西方生活方式通过名人、要人潜移默化地开始影响中国人，三十年代一些有身份的人还会在六国饭店举行西式婚礼。据说曹锟、黎元洪失意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跑到六国饭店，饭店里的奶酪、香槟等正宗西式食品在北平城里很少见，而且质量上乘，虽然价格贵了些，但是心情放松，可以吃饭散心。有时这些政治要人会客，如果不方便去使馆或是到自己家，也会约到六国饭店。往俗里说，当时的北平，不在六国饭店里遛几遭、吃几顿饭，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上流社会。很多留过洋的同盟会成员都喜欢在六国饭店聚会，不单单是来吃饭，更多是来混个圈子。

刺杀汉奸张敬尧案

令六国饭店名噪一时的还有一桩轰动一时的命案。被害人张敬尧曾任湖南督军，极为贪婪，搜刮民财，还出卖矿权给洋人，湖南人称之为“张毒”，毛泽东、何叔衡还曾组织过“驱张”的群众运动。在政治上，张敬尧朝秦暮楚、擅长投机，先后投靠了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不过“越混越差”，张宗昌兵败后成了一个没落军阀，到大连日租界隐居。1933年，日军进犯长城各口，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转而希望在华北扶植一个亲日伪政府，即华北特殊化，板垣将拉拢的目标定为反蒋的北洋旧军阀。

张敬尧认为他翻身的机会来了，跳出来充当日本人的马前卒，被任命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拿着日本人拨给的700万元活动经费，扮成商人，秘密潜入北平，四处收买旧部，妄想拉起一支队伍，在日军进攻北平时作为内应。为了安全，张敬尧不但安排了卫士，还住进了六国饭店。

张敬尧把主意打到了国民党军队身上，拿出一百万元的支票想收买国军团长王志信，他前脚走，后脚就被王志信捅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起了杀心，命国民党复兴社（军统前身）特务处戴笠执行暗杀任务。戴笠决定由郑介民化装成南洋回国做生意的华侨商人住进北平六国饭店，先摸清张敬尧的行动规律，再实施暗杀。

1933年4月底，郑介民携带着10多只大皮箱，带着一个叫飞龙的妓女，以日本大仓株式会社的名义，西装笔挺地住进了六国饭店。当时一男一女去开房再正常不过了，单身男子或两个男子开房却很反常。

郑介民侦察发现，张敬尧与其副官、参谋长三个人分住三楼三个房间，夜间睡觉经常随机变换房间。刺客白天动手难以脱身，晚上动手又闹不清住在哪个房间。郑介民通过茶房了解到早上时段是张敬尧

警惕性最低的时段，卫士不在身边，客人们又大多未起床，是下手的机会。刺杀由黄埔毕业的神枪手白式维执行，另安排了一辆车在饭店门口接应行凶后逃跑。

1933年5月7日凌晨，特务处天津站站长王天木在六国饭店二楼侦察时突然发现甬道左首一排房间中，有间房门敞着半扇窗子，一个人侧身坐在床沿上，王天木见这个人“长方脸，鼻端高翘，两腮瘦削，留着两撇小胡子，下巴底下还有一撮长毛”。像极了张敬尧。王天木停下脚步，扭过身子又看了一眼，确认此人就是张敬尧。

原来张敬尧在二楼又秘密开了一个房间，却没想到与刺杀人员碰了个正着。刺客白式维收到王天木的眼色，撩起夹袍，用手枪对准刚刚站起半个身子的张敬尧连开三枪，枪枪击中要害，枪声把饭店茶房、客人们惊醒，张敬尧被匆匆赶来的卫士送往德国医院，但伤重不治毙命。王天木与白式维等特务此时已经狂奔出饭店，乘接应的小轿车逃走了。汽车开到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白式维下车，步行混入人群转移。六国饭店报案电话打到东交民巷巡捕房，但是当警察们赶到时，“南洋商人”郑介民也不告而别消失了，只留下一堆空箱子。

张敬尧出事后第二天北平各报上刊登了“巨商常石谷，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中遭刺殒命”。但很快就证实，常石谷就是张敬尧。南京国府通电汉奸张敬尧是被民间“锄奸救国团”击毙的，日本人没寻到国府的把柄，也只能吃了个哑巴亏。

张敬尧的死，特别是在六国饭店里被刺死，令很多想跟日本人合作的旧军阀和汉奸吓得缩了回去。

刺张案的社会影响极大，以至于现代抗日剧中的各种敌后刺杀很多都是以六国饭店为中心展开剧情。比如热播的电视剧《火线三兄弟》，几乎每一集都会出现六国饭店，汉奸、黑帮、官员、日本兵、地下党、歌女、锄奸队全都挤在饭店里，侦听、刺杀、下药、火并一样都不落。日据时，失去列强武力保护的六国饭店沦落成黄渤扮演的黑帮头子田三林的后花园，打打杀杀为所欲为。实际上在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前，六国饭店就已经不再安全，使馆区附近还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杀人碎尸案，被害人是一位英国外交官的女儿。80多年后，英国人保罗·法兰奇还多次重返北京，仔细考察包括原六国饭店、鞑靼城等涉案地点，指认案件的疑点和真凶，并写成了获得爱伦坡奖的《午夜北京》一书。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政府宣布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财产，六国饭店被政府接管。4月1日，周恩来选择这里举办

了国共最后一次谈判。

新中国成立以后六国饭店成为原外交部的招待所，对外称华风宾馆。1988年8月5日上午十点半，因施工人员在地下室用切割机切割通风管道时引燃管道外侧泡沫海绵保温层，引发招待所火灾，1至5层建筑被全部焚毁，昔日的繁华地化为一片废墟。

今天重建的华风宾馆，已是一个与六国饭店完全不同的建筑，除了地基与往事，再没有什么联系。周围各种造型的现代高楼林立，地铁、车辆流水般地穿行，华风宾馆反而显得毫不起眼，仿佛整个身子都要躲到高大的林阴树里，六国饭店从此只存在于人们的传说与影视的虚构当中。

在六国饭店避祸的名人

张振武是武昌起义的首义功臣，后出掌湖北军政府军务部，与黎元洪素有矛盾。1912年8月15日夜，张振武为调和南北感情，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其时段芝贵兜里就揣着杀人令。晚上十点，吃过饭后，张振武等人分乘三辆马车回住地，因六国饭店西边的马路不通，就顺着临时开的大清门栅栏穿了过去，但是大栅栏大门突然关闭，潜伏的军警暴起擒拿，将张振武捆绑至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第二日凌晨1时，张振武被绑于木桩上行刑，身中6枪毙命。刑前，他怒极而哀：“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

直奉开战，吴佩孚因为迷信，专门调了一个叫“张福来”的人充任前敌总指挥，希望战场“福来”。《世界晚报》在报道此条消息时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把“张福来”的名字错写成了“张祸来”，社长成舍我看到铺街的报纸后，大呼不妙，立刻和编辑跑到六国饭店避难。果不出所料，晚上七点，军警就包围了报馆，虽然没有抓到人，但是把报馆查封了。后来，因为冯玉祥临阵倒戈，吴佩孚兵败逃往洛阳，冯玉祥执掌北京，很快就同意该报复刊，成舍我和编辑这才敢从六国饭店里出来。《世界晚报》因为敢把“福”改成“祸”的大胆精神被读者赞赏，销路大增。

邵飘萍1918年10月在北平创办了《京报》，自任社长。1926年2月，《京报》出《西北周刊》，大力支持冯玉祥脱离军阀混战。郭松龄倒戈反奉时，《京报》“全力赞扬”，而且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接班改造东北政局。“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报》公开指责段祺瑞为惨案的祸首，要求“公开审判”他。邵飘萍的新闻事业尤遭奉系仇视，4月15日，奉军逼退国民军进入北京，邵飘萍连忙避居到六国饭店。奉军只好诱捕，他们收买了北京狗仔报《大陆报》社长张翰

举，诱骗邵飘萍出六国饭店乘车回报馆，出饭店后立即被军警截捕。26日晨，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张作霖处决。

芙蓉古镇：土家情意稠

作 者:佳音









位于湖南永顺县最南端的小镇王村，静静走过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因一部电影的热映声名鹊起。这部影片的名字是《芙蓉镇》，谢晋、刘晓庆、姜文等著名电影人把这里的知名度推向巅峰，“芙蓉镇”这三个字后来也成了王村的名字。

芙蓉镇的人和事

1981年，作家古华的小说《芙蓉镇》发表，立即引发了一系列讨论，小说讲述1963—1979年湘南农村的社会风情：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农村经济开始复苏时，主角胡玉音在粮站主任谷燕山和大队书记黎满庚支持下，在镇上摆起米豆腐摊子，用积攒的钱盖了一座楼屋。“四清”开始后，胡玉音被打成“新富农”，丈夫黎桂桂自杀，黎满庚撤职，谷燕山被停职反省。接着“文革”爆发，胡玉音饱受屈辱，绝望中她得到“右派”秦书田的同情，两人结为“黑鬼夫妻”，秦书田因此被判劳改，胡玉音管制劳动……三中全会后，胡玉音摘掉“富农”帽子，秦书田也回到了芙蓉镇，生活又回到了正轨。

这个故事来源于古华家乡一个年轻寡妇的真实经历，作者把真实的故事和典型的湖南民俗风情融合在一起，成为一部别具一格的小说。古华自己在《芙蓉镇·后记》中说：“我探索着，尝试着把自己二十几年来所熟悉的南方乡村里的人和事囊括、浓缩进一部作品里，寓政治风云于民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力求写出南国乡村的生活色彩和生活情调来。这样便产生了《芙蓉镇》”。

小说发表后第二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当时有不少导演跃跃欲试，试图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几经周折，改编权和电影的拍摄权终于落在了著名导演谢晋的手中。古华的家乡在一个典型的湖南乡村，谢晋力求展现最真实的地域感和时代感。摄制组冒着酷暑驱车在湖南南部、西部、北部梳篦式地寻找外景地。在长达两个月寻找后，他们最终把影片的拍摄地确定在湘西永顺县王村镇。

影片结尾，剧中人物王秋赦以疯癫的状态，每天在街上游荡，凄凉地喊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个可悲时代的尾音一直回荡在观众耳边。

本来籍籍无名的湖南王村，通过这部电影开始走入全国观众的视野。这是怎样一座古村落，又如何在无数湖南古镇中脱颖而出，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心中自然会有答案。

铜柱撰写的王村历史

王村，就是后来的芙蓉镇，顾名思义，这里聚集居住的是王姓族人。据永顺《王氏族谱》记载，王氏祖上因避秦乱来楚国，沿沅水驶入酉水，来到今天的王村，看到这里“天地豁然开朗，深山修竹之间，山环水聚之地，鸟兽见人不惊，山花自开自落”，十分喜欢，于是结草为庐，栖息此地。王公定居后，与当地土家族居民和谐相处，并教会他们礼仪农耕等，当地土家族人便尊其为头人，从而世代繁衍，得名王村镇。

王村民俗博物馆中，有一件镇馆之宝，这根楚王马希范与溪州刺史彭士愁分疆界所立的溪州铜柱，书写了这里最早的确切历史。

王村古称溪州，靠近酉水，酉水被称为“五溪”之一。五代十国时，土司在王村等地自封为王，扼守酉水流域，与官方踞河对峙叫嚣，声势浩大。早在东汉年间，朝廷数次征剿五溪不下，不得不起用骁勇善战的大将马援驰奔湘西征讨。战功累累的马大将军进五溪之后，面对这里地势之险，不禁倒吸了几口凉气，他在《五溪行》中写下“滔滔五溪一何深，鸟飞不度，兽不敢临”的句子。马援心知此行凶多吉少，在五溪恐难伏波，遂命部下抬棺随行，壮士赴难，还写下“何必马革裹尸还”的遗嘱。

战争的结果果然不出所料，马援战死五溪，此后五溪便成了官方的心腹大患。随着隶属楚国的溪州日益强盛，土司继承人、刺史彭士愁与自称马援后代的楚王马希范之间的摩擦也日渐剧烈，战争终于爆发。

彭士愁承袭爵位，统辖溪州，自充靖边都誓主。这场旷日持久，规模巨大的“溪州大战”，使方圆几十里硝烟弥漫，结果双方都没有占到上风，土司退守王村高地，楚军舟楫劳顿。无奈，朝野之间只好以酉水为界，盟约立誓，世代永不宣战，并立铜柱铭之。

溪州之战，土司没捞到什么便宜，但由此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地

位，溪州自此进入了八百年之久的和平与繁荣时期，战争的中心王村，也在地方志中被大书一笔。

这根原本立于会溪、重达5000斤铜柱成为研究土家族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土家族视其为神物。铜柱高一丈二尺，横截面为六心形、中空，内实钜钱，柱端覆盖铜顶，铭誓状于铜柱之上。宋天禧二年（1018 年）重立时，又羼刻了一些土官衔名。清中叶，柱上铜顶被盗，沉于江心，柱内铜钱亦被盗尽。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永顺知府张曾扬建亭保护，不幸的是民国年间亭被毁。如今位于民俗馆的这根铜柱，精纯光润，柱体所镌颜及柳体阴文，虽历经千载风霜雪雨蚀磨，仍清晰如初。

王村因位于水陆要地，常遭受外来军队侵袭。1135年，彭士愁第八代孙彭福石将都府从王村迁至10公里以外的深山老林老司城。

古代水路商业中心

上世纪80年代，王村因为电影改名为芙蓉镇。芙蓉镇境内酉水流域达十多里长，这里是酉水在湘西的唯一途经之地，很早就是重要的水港码头，逐渐成为湘西万物集散和商贾云集之地。清代改土归流后，汉人大批涌入，进一步促进了这里的商业繁荣。从码头绵延至镇中央的青石板路，长达五里，没有名字，人们干脆叫它五里长街。清末，芙蓉镇码头至太平桥的五里长街两边，店铺酒家比比皆是，民国初年，这里共有大小商号204家，从业人员多达630余人。

芙蓉镇民居规模大致是沿水布局，在酉水河与营盘溪两侧向上呈带状分布，古镇的主要街道五里街边是居民最密集的地区。土家族民居是成群成组的按等高线布置，通常是一栋连一栋横向排列。民居可分为两种，一类是居住型，一类是商铺型，居住型基本沿用了传统农村土家族民居的修建特征，主屋两头对称向前，呈一个平面的凹形。商铺则呈一字沿街排开。临溪一侧建筑都是前面临街做大门，后面临溪做吊脚楼。

土家修建吊脚楼原本是出于无奈，《旧唐书》说：“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蛩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是为干栏。”历代朝廷对土家族实行屯兵镇压政策，把土家人赶进了深山老林，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加上少田少地，他们只好在悬崖陡坡上修吊脚楼。王村其实是一座建于悬崖瀑布边的村落，大瀑布旁悬崖的飞水寨曾为土司行宫，乱世中也作过土匪窝。飞水寨建筑由木结构组成，形成依山就势、高低错落的木建筑群，四层青瓦层次分明，八角飞檐如雄鹰展翅，堪称土家吊脚楼的代表。

20世纪70年代，老街的西北侧平行修建了宽阔的王村公路，这也是外来游客到达王村的最主要路径。老街和现代公路有不少小巷连接，既相互连通又互不干扰，连接处有不少公共区域，牌坊、水井散落各处。五里长街全部由青石板铺就，人车行走多年，每块石板表面都被磨出一种清冷的光泽。

芙蓉镇街上的店铺摆满了当地的土布、织锦和各种竹编草编，每个店铺里都坐着土家姑娘在织机上精心编织。土家人饮食以大米为主，玉米、豆类作为辅食，边远山区以苞谷为主，过年时族人要吃一种用肉、萝卜、白菜、粉丝等十多种菜合成的大杂烩。

镇上最有名的小吃莫过于米豆腐，这种凉拌的做法很利于消夏开胃。在电影《芙蓉镇》中，主角胡玉音的米豆腐店至今在镇上保留，是游人参观游玩的热门景点。虽然满街的米豆腐店，已不知谁家的是正宗，但总归不会相差太多，都是芙蓉镇的味道。有趣的是，虽然名字叫米豆腐，材料却和豆腐沾不上边，是由米粉制成。

土家服饰女装为短衣大袖，右衽开襟，滚镶2- 3层花边，原着8幅罗裙，后改为镶边筒裤；男装为对襟短衫，头缠2- 3米长的青丝帕。土家族男女原多对歌相爱结婚，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婚姻逐步受到财产的限制和父母的约束，直至建国前，还盛行封建买卖婚姻。1949年后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多了起来，但在农村，父母包办婚姻依然存在。

历史与现实交织

在芙蓉镇中行走，你有时难以分辨历史与现实。热闹的商业街尽头，有一座镶嵌着“贞节牌坊”字眼的牌楼，这幢四洞三开间的牌楼是当年电影《芙蓉镇》拍摄时留下的道具。如今这里的如织游人，也大多是来寻访电影中的细琐痕迹。

除了这座石牌坊，电影剧组还在公社广场上加工了一座三重檐构的八角亭，在公路上加工了一个石柱撑梁的路亭，并从二十几公里外搬迁了一幢古老的吊脚楼。牌坊和吊脚楼的歪斜倒塌，既表现出小镇的历史层次感，也寓意封建思想的没落与沦亡。

女主角胡玉音的家是剧组重新搭建而成，多角度、多层次地把湖南建筑特点和时代气氛呈现出来。为了体现房屋的陈旧感，特地从外景地买回当地的旧木板、旧圆木和大料。木筋鲜明的板壁、蛀蚀的柱子与曲折有致的门槛等搭配起来，歪斜的门窗和残缺的穿梁与之呼应，褪成灰色的板和参差不齐的缝隙中都渗透出风雨侵蚀、时光摧残

的印记，给人一种古朴、自然的美感。

小说和电影在情节上有所虚构，但片中每一个镜头所展现的古镇风光都真实再现了浓郁的土家族风情。

古镇掩映在一片青山绿水间，镇内是曲折幽深的大街小巷和临山依水的土家吊脚木楼，青石板铺就的五里长街两旁，处处都包涵淳厚古朴土家族风俗，让至此的游人留连忘返。《人民日报》原社长胡绩伟游览此镇后作词赞道："武陵山秀水幽幽，三峡落溪州。悬崖壁峭绿油油，悠悠荡华舟。烹鲜鱼，戏灵猴，龙洞神仙游，芙蓉古镇吊脚楼，土家情意稠。"

金日成曾派近卫军护送西哈努克回国登位

作 者:车仁宇





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与许多中国领导人交情颇深，而同时，他与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也相交甚笃。为了西哈努克，金日成不但在平壤附近建造了一座行宫，还顶着苏联的压力拒不承认越南扶植的柬埔寨傀儡政府，豪华行宫导弹戍卫。

西哈努克与金日成的友谊始于1965 年，当时两人都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参加不结盟峰会。在印尼总统苏加诺的介绍下，两人一见如故。西哈努克很快就打消了承认韩国政府的念头，为此金日成大为高兴。1970 年朗诺乘西哈努克出国访问时发动政变，西哈努克被迫流亡中国。朝鲜则拒绝承认朗诺政府，奉西哈努克领导的反对派为柬埔寨的合法代表。

金日成还热情邀请西哈努克来朝鲜居住。为此，金日成派出一个营的士兵，在平壤以北的万寿湖畔建立了一座“行宫“，名为万寿宫。这座行宫距离平壤约l 小时的车程，朝鲜式的屋顶，天花板上缀满枝形吊灯，总共有60 间房屋。行宫的中心部位是一个巨大的球场，其他内部装修全都仿照金日成自己的住所。考虑周到的金日成还在行宫内修建了佛教寺庙。

1974 年，经过近一年的施工，“万寿宫”建造完毕。第二年，由于红色高棉占领金边，西哈努克回国担任国家元首。值得指出的是，西哈努克之所以同意与红色高棉合作，金日成的劝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西哈努克与红色高棉的关系很快恶化。1979年，伴随着越军入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政权，西哈努克再度寻求老朋友——毛泽东和金日成的帮助。万寿宫又一次有人居住了。

从1979 年到1991 年期间，西哈努克每年要在万寿宫住上两个月。金日成挑选出精锐保镖为西哈努克提供安全保证。

西哈努克在朝鲜显然过得非常愉快。 除了起草声明、写书、发表演讲和接受采访外，他还打羽毛球、拍摄电影（这是西哈努克一生的爱好）。还有大量法国美酒和美食经中国运抵朝鲜，供他享用。

金日成一方面让西哈努克在朝鲜过得舒心，另一方面顶住莫斯科方面施加的巨大压力，拒绝承认越南扶植起来的韩桑林傀儡政权。

1993年，西哈努克返回金边，被柬埔寨各方一致拥戴为元首。金日成派出25 名贴身武装护卫人员护送西哈努克回国。西哈努克对此感激异常，1994年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他说：“我被我自己的皇家卫队推翻了（指1970年朗诺发动的军事政变），但却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25个公民更好地保护起来。”

西哈努克为了报答金日成的关照，于上世纪90 年代后期（此时金日成已经逝世，金正日与西哈努克的关系也很好） 与朝鲜一道建立了一家航运公司，使得一些朝鲜货船可以打着柬埔寨的旗帜在海上活动，这对于长期遭受经济制裁的朝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家名为“柬埔寨航运集团（CSC） ”的航运公司的负责人，是西哈努克长女的丈夫——万迪。

CSC的一些举动逐渐引起西方的注意。2002 年，法国海军截获了一艘悬挂柬埔寨旗帜的朝鲜货船，并宣称在船上搜出违禁物品。不久，西班牙海军在阿拉伯海截获了另一艘悬挂柬埔寨旗帜的朝鲜货船，上面载有15枚飞毛腿导弹以及23 辆坦克等货物，这批军火据说是运往也门的。西方为此向柬埔寨施加了压力，柬政府被迫下令关闭CSC。

（摘自《上海译报》）

词人李煜的赤子之心

作 者:押沙龙







从中国的地理形势上看，每隔8°就有一条大的纬向构造。热衷风水术的唐宋开始在群山中寻找“龙脉”，认为这些群峰跌宕起伏、厚实且藏风聚气，是风水宝地，龙脉集结处更佳。中国历代帝王都不约而同地把陵墓确定在这些地方。



在

黄河和洛阳城之间，有一座并不是很起眼的山，叫北邙山。它只有三百多米高，完全谈不上雄伟，离远看更像一片大土堆。但这片大土堆却是历史上最显赫的一块坟地。今年夏天洛阳市文物管理局发了

一条官方微博，说在洛阳孟津县发现了一座墓，很可能是南唐后主李煜的。虽然后来管理局又收回了这条微博，说是“操作失误”，但是它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假，根据史料记载，后主李煜死后确实是被葬在北邙。而且他还不是葬在北邙山的唯一的亡国后主。他的同伴至少有三位：蜀汉后主刘禅、南陈后主陈叔宝、后蜀后主孟昶。

金陵檀郎

说到李煜，倒让我想起了一个人——贾宝玉。李煜和贾宝玉确实有些地方很相像。贾宝玉天天在大观园里谈恋爱、赏花、办诗社。林黛玉担心说荣国府经济上压力太大，以后恐怕后手不接，怡红公子认为不打紧，“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李煜也把日子过得像在大观园，醉后自称“浅斟低唱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南唐财政紧张到了发行铁钱的地步，但再怎么紧张也短不了李煜和小周后两个人的，他们还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十几年执政生涯中，李煜能被后人铭记的政治成就是：奖励造纸，南唐研发出澄心堂纸；奖励造墨，南唐开发出李廷墨；奖励造砚，南唐制成龙尾枣心砚。

就像贾宝玉一样，李煜性格也是温善的底子。五代是个暴戾的时代，而李煜在南唐并无残暴之令、恣睢之行、杀戮之政。连一副道学面目的《新五代史》也承认“煜为人仁孝”。后人指责来指责去，也主要围绕“奢靡”二字。李煜确实不节俭，但有些所谓奢靡，也是被夸大臆想出来的。宋朝王铚的《默记》里说，李煜的一个宠姬后来嫁了一个将军。她看见灯就闭眼，说有烟气。换上蜡烛，她说烟气更盛。将军问：那宫里难道就不点灯？这位宠姬摆出回到老家向乡亲们描述大观园的刘姥姥嘴脸，耸人听闻地说：“在宫里我的房间悬挂着大宝珠，把屋子照得像大晌午一样，哪里还用点灯？” 农妇想象皇后骄奢淫逸，午睡醒了狂吃柿饼子，也就是王铚这个路数。

高雅的人往往碰到不高雅的事儿。贾宝玉碰到了抄家，李煜碰上了亡国。如果换了一个时代，李煜其实多半也能帝王一生，胡乱敷衍过去，但他不幸摊上了赵匡胤。李煜写的词是“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人家赵匡胤写的诗是：“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这简直是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的混搭。到头来结局当然应该是赵匡胤来金陵捉檀郎和他的“娇无那”，而不是檀郎去开封捉赵匡胤。

李煜是超一流的词人。千百年来，能和李煜一较长短的词作者，也不过三两人而已。王国维对李煜推崇备至。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

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正是亡国的经历造就了词人李煜。没有这段生涯，李煜当然还是一个优秀的词人，在深宫里填着他的“笑向檀郎唾”，但他绝不会成为里程碑式的词界大家。

秀富贵、秀恩爱，描写自己过得如何幸福舒坦，作者自己读起来可能觉得其乐无穷，却写多了最易招人烦，相反，弥漫着忧伤的文字，却往往能动人心弦，让人感同身受。世上最能打动人的感情不是欢乐，而是痛苦。偏偏在亡国之后，李煜最尖锐的感觉，也正是痛苦。

李煜骨子里是个贵族化的文人。他身上的那种文人气，和“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书生气不同，和“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学者气也不同，太过柔软纤弱。首先，他太怕死。宋朝大军包围金陵，李煜走投无路。文人往往喜欢戏剧化的场面，李煜也不例外。他宣布要自焚殉国，言辞铿锵，慷慨激昂，不光感动了自己，还感动了宫外净德尼院的八十多名尼姑。尼姑们约定一见宫内起火，也同时自焚。李煜的架子是铺开了，但到了最后关头，却不肯往火里跳，找了一堆客观理由，只是烧了一些图书了事。倒是那些尼姑，望到烧书的火焰，以为李煜已经熊熊燃烧， 当下集体自焚。

还是平江南的大将曹彬看他看得准。李煜上曹彬的战船举行投降仪式。登船的时候没人照顾，李煜在踏板前犹豫了半天。曹彬受降后当即放李煜回宫收拾行装，宋将有人不放心，说你不怕他回去自杀？曹彬摇头说：“连上踏板都害怕的人，能自杀？”果不其然，李煜不仅回去后没有自杀，连到了开封受人欺凌的时候，也没有自杀。面对屈辱的生活，他就像翻了壳的乌龟，毫无能为。李煜没有战斗的能力，也没有自戕的勇气，他只能在纸上合仄押韵地忧伤着。

赤子之心

被俘的君王往往要承受屈辱，在古代史上尤其如此。罗马皇帝瓦勒良被俘后，波斯王拿他当上下马的脚垫。拜占庭有的君主则喜欢踩着废帝的脖颈观看赛马表演。胜利者这种炫耀得瑟的心态相当普遍。宋朝皇帝倒没像西方蛮夷那样对待李煜，但是也让他受了一个正常男人最难接受的耻辱。

赵匡胤其实还好，问题出在第二位皇帝赵光义身上。李煜到了开封以后，身边的嫔妃渐渐星散，最后留在身边的只有正妻小周后。赵光义经常宣小周后进宫，一去就是好几天。每次小周后回家以后，都嚎啕痛哭，指着李煜的鼻子破口大骂，可见几天里发生的事情何等屈

辱难奈。李煜挨骂的时候，总是默默地躲出去。小周后的这个事情流传很广，甚至还行诸图画。 明朝沈德符还见过这幅图画。“偶于友人处，见宋人画《熙陵幸小周后图》（赵光义的陵墓为永熙陵，故称其为熙陵）。太宗头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器具甚伟；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作蹙额不能胜之状。”有人说这幅画是赵光义让画师现场临摹的，其实应该不是，否则题目中也不会提到“熙陵”这种身后之名。它多半是后世的猥琐男神驰想象，“从历史的碎片中抢救出来的宝贵瞬间”。

王国维是李煜的忠诚粉丝，有时粉得好像有点五迷三道。他在《人间词话》里说“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后来的评论者对这句话多加匡救圆解，以悲哀解释罪恶，但说实话王国维这个论断有点不着边际。从李煜的诗词里真看不出来他还有这意思。不过王国维对李煜的另一个说法确是的评：李煜有一颗赤子之心。

赵光义做的这种事情，李煜就做不出来，就像贾宝玉做不出薛蟠的勾当一样。说到这里，还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小周后周薇。周薇原来是李煜的小姨子。李煜的前妻是大周后，两人情好甚笃。她得病的时候，已经是皇帝的李煜亲自伺候她喝药，有了伤心的事情也千方百计掩饰，在大周后面前强颜欢笑。但就在这个时候，周薇进宫看视姐姐，天长日久就和李煜发生了私情。按照帝王惯例，李煜完全可以下道圣旨，封周薇做妃子。后宫一对姐妹花，放到御用文人嘴里可能还是一段风流佳话——但是李煜不敢。大周后嫉妒心很重，对李煜看得很严，现在又在病中，李煜更不敢惹她生气。在古代，怕老婆的男人很少有真正的坏人，而怕老婆的帝王更是如此。他们心中一定有一种柔软的东西，超越权力和色欲之上，懂得占有与爱恋之间的区别。

他和周薇在宫中偷偷幽会，唯恐被大周后发现。为此李煜还专门写过一首词以作纪念：“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但是纸里包不住火。周薇性格粗疏，终于在姐姐面前说漏了嘴。大周后愤恨莫名，死前也努力转过身子，只给李煜一个背面。这个场景又让人想起红楼梦里林黛玉死前焚稿，号叫“宝玉，你好……”的一幕。李煜愧疚无地，为亡妻写了几千字的祭文，落款是“鳏夫煜”。在中国历代帝王之中，这种称呼可说绝无仅有。李煜身上有着传统文士的弱点，经不住诱惑也控制不了自己。但他确实有一颗赤子之心，他能忘掉自己的权力，把对方当做一个活生生的、独立的人去爱。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暂时忘记自己是个皇帝而想起自己是个鳏夫，也才能写出“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怎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样的词句。

赵光义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他召幸小周后，色欲当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他用这种方式来羞辱对方。在整个东方文化里，女人的身体都有一种奇特的功能。它的贞操事关男性的尊严。强奸对方的女人，成为精神上凌辱对方男性的一个重要象征。几百年后的朱元璋就和赵光义一样，喜欢奸污失败者的妻妾以表彰自己的征服。朱元璋对此毫不隐讳，公开写到文字里。

而总是这样的统治者征服李煜这样的统治者。就像西谚说的：历史，就是没有心肝的人战胜没有头脑的人的历史。

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王国维说李煜有赤子之心，他也确实有种孩童式的天真。他好像完全没有审时度势的能力，根本管不住自己那张嘴。确实，文士们都有本能的冲动，碰到痛苦就想把它变成文字倾诉出来。但作为亡国之君，首先要老实，就算写诗也要写颂圣的诗。比如说也葬在邙山的后主陈叔宝，他亡国之后，最心爱的妃子被当成狐狸精杀掉，几个姊妹被当成战利品分掉，但他还忘不了给皇上献诗："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盼着领导封禅泰山，结果他后半辈子就平安无事。

但是李煜不但不颂圣，反而一首首地写"多少恨，昨夜梦魂中"，"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在我们看来，这是词中经典，但在赵光义看来，这简直是发表反动宣言、记翻天账。李煜如果偷偷摸摸地写完了自己看，也就罢了。可是文人总是渴望倾听者、鉴赏者。李煜居然还敲锣打鼓地让人演唱这些词。也许这是一种变形的反抗？我们很难捉摸李煜的心理了，但是赵光义无疑是这么认为的。

李煜还往江南写信，说自己终日"以泪洗面"。赵光义派南唐老臣去试探他，李煜对着老臣嚎啕大哭，说了一些反动话。结果老臣出门就急煎煎地跑去报告皇上了。其实按李煜的性格，他根本就没有复辟造反的心，也没有这个能耐，但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在他过生日的那天，他让人演奏自己填的"虞美人"。这是他最好的一首词，也是最后的一首词。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声音一直传到府邸之外。于是晚上赵光义派人送来了一杯酒，里面有“牵机药”。所谓牵机药，就是马钱子，含有剧毒成分。人吃了之后，身体会痛苦地剧烈抽搐，最后头和脚会碰在一起。李煜就这么死了。不久之后，小周后也死了，很可能是自杀身死。她骂过李煜窝囊，骂过李煜软弱，但在由赵光义支配的可怕世界上，这个软弱窝囊却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是自己唯一的留恋。

在多年前，在这个人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他写下过这样的句子：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读起来多么美丽，然而又是多么伤感。

同归邙山

死葬邙山的四位后主下场不尽相同。上面提到的那位陈叔宝，写得一手好诗，有个妹妹又进宫做了妃子，所以境遇最好，成了御用帮闲。蜀汉后主刘禅以一副痴傻呆茶的样子，获得了司马昭的宽容，平安混过余生。而四位后主中最有作为的一位后主，后蜀的孟昶，他被俘至开封，七天之后就忽然暴卒，大家普遍怀疑是被毒死。

历史记载往往是粗疏的。它经常用几行文字或者一段轶事，给人物贴上一个标签，就此了事。至于那些人物的复杂思绪，万千举措，历史无暇顾及。给陈叔宝贴上的标签是“全无心肝”。他整日酗酒，烂醉如泥，参加朝会的时候还向隋文帝讨要官爵。隋文帝叹息说：“陈叔宝全无心肝”。从此这个标签就跟定了陈叔宝。刘禅得到的标签是“乐不思蜀”。据史书记载，司马昭问刘禅：“你思念蜀国吗？”刘禅说：“这里很快乐，我不思念蜀国。”蜀汉降臣郤正知道了这事就指点他说：“如果司马昭再问，你应哭着说：‘先人的坟墓都在蜀地，我是天天都在思念啊。’”后来司马昭又问了一次，刘禅便照着郤正教他的话回答，说完并闭上眼睛，摆出要哭的样子。司马昭说：“这话是郤正教你的吧？”刘禅睁开眼说：“是啊。”于是举座大笑，笑这个蠢如鹿豖的小丑。其实，郤正教给刘禅的话几乎是自杀行为。真正聪明的是谁呢？

到底陈叔宝真的是全无心肝吗？到底刘禅真的是乐不思蜀吗？这一切都不可索解了。我们只知道他们活了下来，而李煜却死了。

至于孟昶，他也许是整个五代中最得人心的君主。他被押去开封

的时候，后蜀的人挤满了送别的道路，哭声震地。人群一直把他送到了犍为县，许多人哭得昏厥过去，那个地方从此被称为“哭王滩。”但是宋朝人亮出一把夜壶，就此在历史上轻松打败了他。据宋史记载，赵匡胤看到了孟昶的一把夜壶，上面镶嵌着七种珠宝。赵匡胤叹息说：“所为如是， 不亡何待！”从此，伫立在哭王滩上的孟昶就变成了“七宝溺器孟后主”。现代史学家对这个七宝溺器的真实性颇有怀疑，但是这个符号化的形象已经难以磨灭。

不管是全无心肝，还是七宝溺器，最终这四位后主都归于邙山。邙者，亡人之乡也。这里正是埋人的所在。公平地讲，他们四人被葬于此处，并非征服者的折辱，其实倒是一种优待。北邙山一直被认为是头等风水宝地。按照堪舆的说法，天下的龙脉都发源于昆仑山，并向东延伸出三条主脉：“北龙”从阴山、贺兰山西经太行山入海；“中龙”由秦岭入关中，经泰山入海；“南龙”由云贵至福建、浙江入海。而北邙山正是“中龙”主脉聚结之处。所谓“生于苏杭，葬于北邙”，正是古代人的一种理想。

青史几行文字，北邙无数荒丘。中国文人们最喜欢吟咏这种世事如梦的沧桑。历代关于北邙的诗句不胜枚举，我最喜欢的是李贺的《悲铜驼》，在诗中，一只铜驼静静望着北方的邙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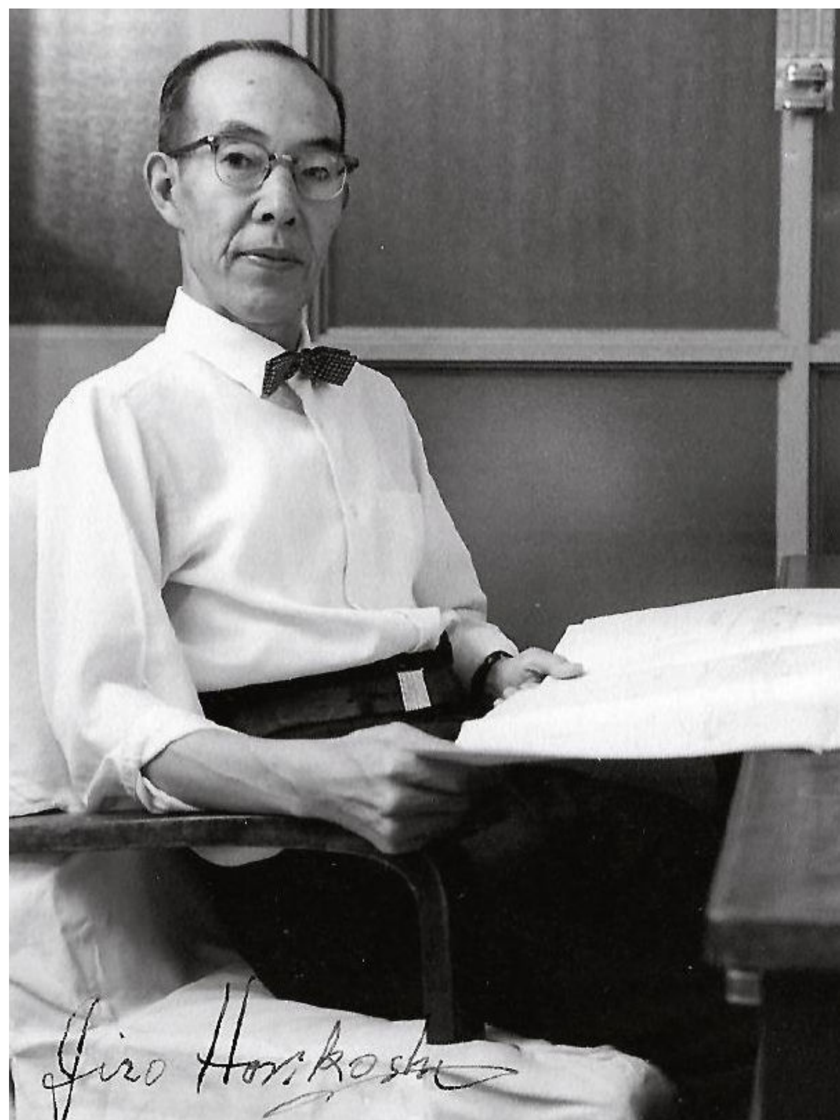
落魄三月罢，寻花去东家。谁作送春曲，洛岸悲铜驼。

桥南多马客，北山饶古人。客饮杯中酒，驼悲千万春。

在那座北山之下，埋葬过李煜的那颗赤子的心，埋葬过刘禅那颗据说毫不思乡的心，埋葬过陈叔宝的那颗据说根本不存在的心。而上千个春天就这么过去了。

零战之父堀越二郎

作 者:曜歌



月20日，日本动漫导演宫崎骏时隔5年的新作《起风了》在日本国内上映，相较于他以往作品的奇幻灵动，这次的影片题材则是实打实地改编自史实——日本航空之父、零式战机的设计者堀越二郎年轻时的故事。影片中原本也设计了部分战斗情节，但后来因“不符合剧情进展的需要”而删除。宫崎骏表示，“执意加入这些情节的结果只能是令影片成为一部劣质的纪录片。那些悲惨的战争，现实世界里都可以看到。”想必二战中臭名昭著的零式战斗机不会成为宫崎骏电影的主角。

在厂房顶楼自建高球练习场

堀越二郎1903年6月22日生于日本群马县，1927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航空系首席毕业，1929年到1930年曾在德国的容克斯和美国的寇蒂斯两家飞机制造公司深造，这样漂亮的履历表无疑让他处在当时航空设计的最前端，也可以看出一个二流的半工业国为了制造出世界一流的尖端武器而处心积虑的人才储备。1932年，堀越二郎就为三菱重工设计过一款战斗机，虽然没成功，但他对公司委托只有28岁的他担纲设计一点也不惊讶：“公司其实很不景气，我可是为数不多的东大航空系毕业生之一，说不定他们把我当作走出困境的希望。”

1934年2月初，日本军方要求航空工业部门设计一种时速在352公里以上，能在6分30秒爬升至5000米高度的战斗机。三菱和中岛两家公司参加了竞争。次年2月4日，三菱公司以堀越二郎为首的“九试单座战斗机制作小组”的“九试单战”实验型飞机首飞成功。它是日本第一种实用型的下单翼战斗机，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单翼舰载战斗机种之一。“九试单战”创造了在3200米高度时速450公里的惊人纪录，远远超过了军方的要求。日本海军立即取消了向国外购买战斗机的订单，1936年，“九试单战”更名为96式舰载战斗机，取代中岛九五式舰载战斗机成为日军航空母舰主要战斗机，1937年被广泛使用在中国战场上，这也是堀越二郎第一个成熟作品。

1937 年 5 月，日海军将96舰战的后继机型“十二试舰战”的计划命令书向三菱和中岛公司负责人展示。但是因为还不知道是否确定需要研制，因此堀越二郎的日子过得相当惬意。此时三菱没有生意，设计师们也无所事事。三菱在名古屋建造了一座飞机制造分厂，这栋三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的二楼是发动机车间，三楼则是机身车间。堀越二郎把楼顶私自改建成自己的高尔夫练习场，美其名曰“观景台”。

用“极端手段”设计出零式

悠闲的日子到10月6日就打住了，堀越二郎被上司叫住，一份正

式的“十二试舰战计划命令书”出现在他面前，看完军方制定的标准后，堀越二郎一阵头皮发麻，他回忆自己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想要世界上最好的战斗机，做梦去吧！”并迅速地给军方的要求下了一个定义——万能战斗机，要求在高度4000米时最高时速达到 500 公里以上。在 3 分 30 秒内上升至 3000 米。正规状态下在 3000 米高度一般速度飞行 1.2 小时至 1.5 小时。在安装附加油箱的超载情况下，3000 米高度一般速度飞行 1.5 小时至 2 小时。巡航速度时应可持续飞行 6 小时以上。装有20毫米机炮两门和7.7毫米机枪两挺，还能携带2枚60千克的炸弹。这些数据单看起来倒没什么，但综合到一起简直是南辕北辙、相互对立。比方说想要高速就要机身减重，但这样会导致机身脆弱，是否能承受机炮的后坐力破坏？高速飞机机翼细长，但为了寻求高超的盘旋性能，机翼面积必须设计得大一些，如何取得二者间的折中？中岛公司觉得条件太苛刻，选择了直接退出竞争，而堀越二郎则硬着头皮顶了上去。

三菱公司组建了以堀越二郎为首的29人设计组，平均年龄只有24岁。参与过设计的人回忆道：“堀越那个人，不是两杯酒下肚就能和别人称兄道弟的。他脑袋里的东西太多，凡事想得太细。他回家以后还在想着设计，经常说关于设计图的梦话，在公司里无病呻吟，哼哼唧唧的很讨厌。”堀越二郎说：“指标要求‘极端手段’。加上引擎迟迟造不出来，日本的引擎功率差，比欧美同时期的差不多要低20%至30%之多，在这种状态下，必须连每一个铆钉的有无都需考虑到。”

在96式舰载战斗机的基础上，设计组大胆采取了减轻飞机重量的一切措施。铆钉由3.5毫米削减到3毫米，不必铆的地方一律不铆；在构件上钻出大量小孔；堀越二郎还采用刚刚研发出来的含微量铬锰的超硬铝合金，这种材料抗拉强度好，耐疲劳强度更好，使主桁梁更轻。为了减重，最极端手段是放弃了对飞行员的安全保护，取消了飞行员防护钢板，也没有采用自封闭式油箱。对此，堀越二郎的解释是：“军方认为战斗机的要领在于如何更有效攻击并击落敌机，而自己伤亡与否则不在考虑之列，这就是当时的指导思想。取消防弹装置可以使飞机变得更轻，能够拥有更好的灵活性，攻击力也就增加了。”这种“裸体武士”似的设计思路在日本军工史上屡见不鲜，军国主义无视战斗人员生命的态度一览无余。

零式的成功阻碍了后续机型的研发

“十二试舰战”于1939年3月16日在名古屋工厂制成出厂，4月1日试飞，1940年正式由日本海军采用，该年正好是皇纪2600年，因后两个数字刚好是“00”而取名“零式”，简称“零战”，盟国称其为“Zeke”。零式飞机是日本飞机设计的重要里程碑。它实现了多个第

一，如首次采用全封闭可收放起落架；电热飞行服、大口径机关炮、恒速螺旋桨、杜拉铝承力构造，气泡形座舱和可抛弃的大型副油箱等设备。

零式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轻，完全弥补了其发动机动力的不足，而且保证了极大的续航力。当时其他国家同类战机最高时速约500公里，航程多在1000公里以内，只装有12.7毫米机枪。而零式高空最大时速为534公里，还有着20毫米机炮和近乎变态的3000公里航程。零式有着极其优异的垂直机动能力，与零式缠斗，很难从背后将其咬住，甚至遭到零式的反转被其咬住。在太平洋战争初始阶段，美国的F4F“夜猫”在速度和火力上都不及零式，大吃苦头，成就了零式无敌全能的神话。

不过零式的缺点也很明显，省去了装甲防护，以及大量铝合金的采用，导致机体极容易燃烧和解体，生存能力极差，让它赢得了“空中打火机”的美誉。美国在1943年推出的F6F“恶妇”则让零式遇到了克星，该机时速接近600公里，而且抗击打能力卓越，中弹与坠毁比为9比1 。

然而日本人对零式过于自信，影响了零式战斗机换代型号的研制。实际上早在1940年堀越二郎就已经充分认识到应该开始后继机型的研究工作，但直到1942年海军才拿出了新的设计标准。再加上海军和陆军各搞一套，前者要求以飞行速度为优先，后者要求以盘旋性能为优先，让三菱公司和堀越二郎头疼不已。此外，工作人员还要忙着进行零式的改良和“雷电”的设计工作，直到1944年10月13日，新的机种才试飞，定名为“烈风”。尽管日本海军决定将其投入生产，但日本的航空工业已经在战争中陷入绝境。三菱引擎的生产因为1944年12月的东南海地震及大规模B-29空袭而延误，几架原型机不是被损坏就是被炸毁，还没来得及量产，日本就投降了。

战后，堀越二郎失去了在喷气机时代施展才华的机会，从三菱重工业辞职后,他走上讲坛，成为东京大学宇宙航空研究所讲师，后为防卫大学教授、日本大学生产工学部教授，1982年去世。

樊建川：梦想建一百座博物馆

作 者:解宏乾







樊建川的部分收藏



日本投降矣！

答覆四國接受規定條款

今晨七時四國首都同時正式公布

刊有日本投降消息的《大公报》



每日新聞

時局收拾に畏き詔書を賜ふ

四國宣言を受諾

萬世の太平開かん

新爆弾惨害測るべからず

聖斷拜し

唯民草を

刊有日天皇投降昭书的《每日新闻》



陈万仞将军赠子聪的"钟馗打鬼"瓷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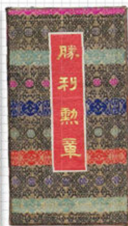


侵华日军占领南京纪念瓷杯



援华美军飞虎队铜鹰标志





抗日军人郑廷杰的抗战胜利勋章



樊建川是个奇人，确如他说，全国都找不出像他这样搞收藏的。别人的收藏，百件、千件就了不起了，万件的凤毛麟角。而樊建川收藏的近现代文物都是十万、百万，甚至按吨计算的。

手写资料二三十吨。

书信三四十万封。

日记一万五至两万册。

像章上百万枚。

票证上百万份。

公章一万多枚。

唱片十几万张。

瓷器五万件。

镜子五万件。

座钟一万座。

生活照影集上万本，以照片计，一百多万张。

宣传画十几万张。

电影拷贝近万个。

“文革”的烟标、请柬、奖状，各种结婚证、袖标、旗帜，分别上万件。

“文革”的搪瓷件、收音机，上万件。

老报纸百万吨。

各种版本的教科书上万册。

毛主席像的绣品上万件……

“据不完全统计，我的所有藏品，共计八百多万件，其中‘文革’藏品超过一半，抗战的有两百多万，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去看过我的库房。我现在最大的困惑就是收的东西太多，库房没法登记。现在有七八个人负责整理，包括拍照、量尺寸、登记日期，最多的一年能整理出二十万件。但我平均每年要买四十万件东西，大部分都堆在库房里。大概的数据都在我脑子里，八九不离十。”樊建川语速很快，带着浓浓的四川口音，一桌十几个人吃饭，就听他一人说，谁也插不进话去。

2013年7月7日，“为了和平，收藏战争”建川博物馆抗战文物展，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展出抗日文物300余件，其中50件（套）为国家一级文物。

秒杀国家级博物馆

说到“国家一级文物”，多数人都没什么概念，起初樊建川也是如此。2002年，他第一次带着自己的藏品来北京展览，展览地点设在位于宛平城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当时的樊建川，虽然热衷收藏多年，也清楚自己有不少难得一见的好东西，但并没敢想建博物馆，能在国家级的博物馆展出几天已经觉得很荣幸了。

他的展览让很多人叹为观止，建议他找相关部门评定。评定的结果出来，其中有14件国家一级文物。樊建川回忆：“我对‘一级文物’没概念，就问抗战纪念馆的馆长，你们有多少件一级文物？他一摇头打了个岔，没理我。我有点儿纳闷，又偷偷问他们纪念馆的一位部门主任，他悄悄告诉我，两件。这么大的国家级博物馆才有两件一级文物，我一下子就评定出14件。现在我共有326件国家一级文物，主要是抗战文物，一些‘文革’文物现在还没法评定。”

这一下，樊建川有了自信，“抗战文物收藏，我肯定是中国第一了。我想，为什么不能自己建博物馆呢？我是做房地产的，我不做谁做。一不小心就修了24座，建成了博物馆群落，现在还有6座没有修好。”

收藏从捡破烂开始

樊建川生长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一名老兵，1940年参加晋绥军抗日；1942年至1944年，在伪军矿警队；1944年加入八路军；解放战争时在199师596团榴弹炮连，建国时任排长；后随199师入朝参战，1953年任596团三营炮连连长，两次立战功，后任宜宾市民政局局长。母亲出身地主家庭，1950年四川解放时，她看见大军入川，大势所趋，放弃小学教师职务，赶快当兵了。

“文革”时期，父母的遭遇，让樊建川萌发了收藏意识，“刚开始就是想知道父亲为什么被批斗。传单、小报，特别是牵扯到父亲的，都收起来。我现在都有关于父亲在宜宾的一些资料。由于好奇，碰上北京、宜宾红卫兵撒油印的传单时就捡几张。”此后，他开始收集抗战文物。樊建川说：“我之所以把抗战文物作为收藏对象，源于我的军人情结。我的父亲是抗日战士，我自己也曾有11年的兵龄，这使我对战争有一种天生的关注。父辈是在面对面的拼杀中亲历战争的，我们这代人是在 《地道战》 《地雷战》 《小兵张嘎》等文艺作品中知道战争的。”

他收藏抗战文物的激情是被电影《血战台儿庄》点燃的，“电影里，川军师长王铭章中弹负伤，浑身是血，仍挺身大叫：‘拼上去，中华民族万岁！’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回想起来，樊建川仍然激动不已，“中学时，老师私下讲了点国民党的抗战，但了解到的很少。于是，我开始收集川军的资料，阅读、研究川军抗战史，一串数字让我震惊了，内心的震撼促使我必须做些什么！”

“文革”期间，他下乡插队，1976年去内蒙古当兵，后考上西安政治学院。这一期间，收入有限，没有收集太多的东西。1981年他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庆第三军医大学教书，工资高了，收集的东西开始多起来。“那时候没有市场，我就去废品收购站买，找到一件算一件。走过垃圾堆的时候，也会注意一点，捡过残缺的毛主席石膏像、印有‘文革’语录的脸盆，最厉害的一次捡了一把小提琴，背板开了，上面有毛主席语录。一个月能捡到一件东西都会很兴奋，把玩半天。”樊建川说，“到父亲老战友家拜访时，会跟他们要。记得一个姓刘的老红军有一个缴获的日本饭盒，已经七扭八歪了，他用来放盐巴。我把盐巴倒掉拿走了。在重庆三医也收到一些东西，三医大的资

料清理时，宣传处有一些回收的毛主席像章，可能有半麻袋，二三十斤，也让我提走了。”

直至转业回到宜宾，樊建川认为那都不能算是收藏，“虽然一直在收集，但范围很窄，量也不大，找到一件抗战或‘文革’的东西很不容易。当时，我们地委书记家有个泡菜坛，上有‘斗私批修’字样，我买了个新坛子换走了。我基本上都是管别人要，或者自己捡。从1990年以后，有了市场才叫收藏。”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樊建川开始了疯狂的收集，首先让他兴奋的就是“全民大搬家”。他说：“中国每一个家庭几乎在这二十年里都搬过家，有些还不止一次。搬家是我收东西的一个重要途径，看着别人把家里的东西噼里啪啦全搬出来，我真是太愉快了，拼命捡破烂。比如90年代初收购宣传画，每次赶场都要买两三捆，手提肩扛，满头大汗。开始，许多收藏界人士认为我不入流，我只是笑嘻嘻的，现在他们才明白，一般文物的价值十年增长十倍，‘文革’文物十年增长五十倍。一张宣传画三五块钱，至今增长百倍，我收藏了十余万张。”

“扫荡”与“反扫荡”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全国各地慢慢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古玩市场，更多的文物频现，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场生意火爆。“一开始的古玩市场上全是文玩字画，很少有我想要的有关‘文革’‘抗战’这些近现代的东西，这个市场是我买出来的。”樊建川说，“看到毛主席像章我就买，没有了我就让古董商贩们帮我找。他们知道毛主席像章可以卖钱，就找来卖给我。以前靠捡、要，搞几箱子就算不错了，还为那一点东西陶醉，但有了市场，一下子全变了。比如烟标，过去一个月都找不到一张新烟标。十年也就收了一千张。但有了市场之后，不费吹灰之力我就收到了一两万张。”

逛古玩市场让樊建川感受到了新的乐趣，“逛地摊很快乐，是会上瘾的。成都的古玩地摊可能只输给北京。首先是结交五湖四海的高人，其次是捡漏。有一次，我只花了两块钱就买到了宋哲元将军的家谱。从1990年到现在，我淘了二十多年地摊。逛地摊无拘无束，自由交易，琳琅满目，让我幸福而不觉时光流逝。后来我发现，十几年辛辛苦苦搜集的东西，不如市场上买两年。有市场是个很幸福的事情。”

慢慢地，每一个城市的古玩市场都有了樊建川的朋友，遇到了有关“抗日”“文革”的老东西，都会先想起他。“我在全国的古玩市场上建起了一个联络网，各地都有联络站，帮助我收东西。这些人多数是古

玩商人或者收藏者，我们定期见面。我会告诉他们我想要的东西，他们有什么消息再反馈给我，这是我收藏的主要渠道。”

有了这个网络，樊建川不再是一件件地收集了，改成了一批批地收，“2005年，我收到的集装箱有三百多个，从全国各地来的，几乎一天一个，每天都要派车到成都火车站去拉。这些年花了不少钱买东西，全国任何古玩市场，只要是收集现代文物的，没有人不知道我，都跟我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像我这样搞收藏，是绝无仅有的。近现代收藏市场的兴起，跟我是分不开的。现在我也经常要到市场上去逛逛，其实我不出去，东西也会源源不断地来找我。”

除了收藏的数量迅速增加，一些珍贵的文物也开始浮出水面。2004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樊建川突然接到一位长期合作的古玩商的电话。得知天津的一位姓王的先生藏有一套日军的日记。樊建川非常激动，“关于侵华战争，虽然留下来各种资料很多，但日记类的东西在中国文物市场上却从未出现过。我立刻飞往天津。”王先生一直想把它卖给抗日战争博物馆，博物馆也很希望珍藏，可惜价钱谈不拢。得知樊建川正筹建全国最大的抗战博物馆，王先生便托人主动与樊建川联系。

日记共七本，与日记内容互证的还有这个日本士兵自己的影集，208张照片，共八本。每一本日记只有小孩手掌大小，正好可以放入口袋中。本子是当年日军的制式出品，专为前线军人制作，附页上还有军人守则，常用中日语对照，伪满洲国地图等。日记本上附件的记录，这些东西是一位叫做“王襄”的人于1950年收藏。樊建川当即买下。

樊建川介绍说：“日记的作者叫荻岛静夫，曾是一个火葬兵，之后当过传令兵、武器发放兵。他从自己的视角记录了淞沪会战等重大战役。从1937年8月参加侵华战争，到1940年3月回国，日记几乎没有中断。它虽不足以构成完整的历史，但是许多历史细节，对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有着十分珍贵的价值，同时也是日本人自己写的侵华过程中，种种残暴行径的铁证。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目前国内存在的侵华日军最完整详细的战地日记。”这套《荻岛静夫日记》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该日记，此次展览中也参与展出。

随着收藏市场对近现代文物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樊建川常常在拍卖会上遇到对手。“我曾有几次失手，后来我了解是日本收藏家在和我争夺这些文物。日本有专门收藏‘二战’的专家，比我有钱。我想，你能到中国来收东西，我也能到日本去买。套用当年战争时期的语

言，你可以扫荡，我也可以反扫荡。”从1996年开始，他多次到日本收集二战期间和中国有关的文物。“1996年，我第一次到日本，在京都、奈良等地逛街时，发现当地的文物店铺里和地摊上竟有大量的日本‘二战’时期的杂志、画报。我当即取消了其他地方的行程，开始收东西。见到就买，仅购买、翻拍的图片就超过三十万张。比如当时的画报《历史写真》《支那事变写真》《日支事变画册》《北支事变画报》《国际情报写真》《跃进之日本画报》等我买了千余本，还有上千张日军的明信片、作战地图、日军的信件、钢盔、望远镜、指挥刀、绑腿、指北针……最后，一个集装箱都给运回来了。那次带了三十万美元，全部扔在那了。”

抗战胜利“八一五”那天的报纸，樊建川已经收集了很多，有《大公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等国内报纸。他希望也找到些日本这一天的报纸。“逛到一家书店，店主老头说阁楼上好像有，让我上去翻。那天特别闷热，我在里面翻了整整三个小时，终于找到当天的《每日新闻》，刊登了天皇颁布投降诏书的新闻。这张报纸后来与我收集的1945年8月15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黄埔军校》号外以及《抗大》号外等一起，被评为一件（套）国家一级文物。”

追问历史，寻找自我

藏品越来越多，樊建川的收藏“瘾”也越来越大，“刚开始觉得把一件事情搞清楚很好玩，慢慢一件件事情连起来，越来越觉得好玩，觉得幸福、快乐，就跟抽鸦片一样丢不下了。然后觉得不够，还要查更多的资料，读更多的书，收集更多的文物，了解更多的事情，就这样进去了。”

说到川军，大家都会想起“双枪兵”的称号，意指川军除了打仗用的枪以外，还一人一杆大烟枪。樊建川指着展柜里的旱烟枪说道：“大家一直有个误解，以为川军抽鸦片，其实就是旱烟枪，可能个别军官抽鸦片，但士兵是抽不起的。而且，这旱烟枪是制式装备，人手一把，上面还刻有‘好男儿上战场打日寇’的字样。”

对历史文物进行考证是件艰苦的事情，但樊建川乐在其中，旧档案、日记，一看就是一天。有次他在研究一份档案，发现里面有一张报纸，很奇怪，反反复复摆弄半天也不明所以。看过档案其他内容才知道，这个“坏分子”解大便的时候，用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擦屁股，被揭发了，以至于这张报纸也放入档案。这些都不能打消樊建川的激情，更不用说生了虫子、挤满灰尘的档案、信件，甚至还有被尸水浸泡过的遗书。

每收到一件东西，樊建川更想知道它背后的故事，想认识这件东西的主人，这件东西是怎么留下来的。每当把一个个疑惑解开，他都会欣喜异常，“很多东西可以相互佐证，进去之后，就知道有多少激情，多少责任，多少感动了。”

樊建川的收藏有三个标准：一是对记载历史有意义的；二是特别容易被人遗忘的；三是有标志性的，反映社会变迁的。他说：“年代、品质的考证是一方面，而与其相关的历史事件考证似乎更吸引我。因为追问历史的过程，就好像寻找、考证自我的过程。”近年来，他还收藏了三鹿奶粉、地震救援设备等等。与其说樊建川是在收藏文物，不如说他是在收藏历史。

几十年来，樊建川买到的赝品也可以装满整整一屋子了。“现在看近现代文物，我应该是个人才，算是一个水准很不错的收藏者。各种各样造假的方法，我都基本能够识破，这是时间、金钱、教训堆积的本事。”

樊建川做事雷厉风行，一句“狗日的！”拍腿就干，不会瞻前顾后。

樊建川说，他有一个梦想，建一百座博物馆。

2002年从北京回到四川，他就在安仁古镇建起了建川博物馆群落，至今已经开放了24座，还有6座即将开放。“我的博物馆主要是四个题材：抗战、红色年代、地震、民俗。因为里面很大，所以门票是三天有效，逛不完可以住下来，里面有客栈、酒店，我希望打造一个博物馆超市的概念。”

樊建川当过知青、做过老师、干过市长、开过房地产公司，但他说：“我就是个当兵的。我父亲是个老兵，他告诉我，当兵的就两件东西，一条命，命是拿来战斗的，拿来拼的；另外一件就是背包，里面有些日常用品，背包是拿来扔的，打仗就扔掉，打完了再背起来，打死了就是遗物。我的命就是建博物馆的，建好的博物馆就是我的背包，所以我签了遗嘱死后全部捐给国家，公证书已经交给成都市人民政府了。”

他将在雅安修建20座博物馆，包括中越自卫反击战、中印自卫反击战、进军西藏、茶马古道等题材。他还想建一个改革开放博物馆群，一年建一座，完成一百座博物馆的梦想。

随弋阳腔传四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 者:南洛



早几年韩剧流行，看过的观众可能对剧中频繁出现的年糕印象深刻，据说韩国女子嫁到家规严厉的大户人家前，必须得学会做36种年糕，还要会做用辣椒面、水和切成大拇指一样大小的年糕一起翻炒出的炒年糕。由于年糕制作复杂，围绕它生出的韩剧曲折剧情让人看了又看，看不到头。

年糕的高出镜率，一度让人以为它是韩国特产。其实大错特错，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整个亚洲儒家文化圈，包括日本、朝鲜、韩国、琉球、越南等，其实都有吃年糕的习俗。年糕的中文发音与“年高”谐音，取“年年高升”的好彩头。

天长日久，美味的年糕成了人们日常的美食，在中国不同地区制作的年糕各有分别，这其中，江西弋阳县是我国制作年糕较早、工艺和原料最为独特的地方。弋阳年糕制作始于唐代，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江西弋阳的大禾谷年糕简称弋阳年糕，最为出名，被奉为年糕中的最上品。据弋阳县现存较早的同治十年版《弋阳县志》记载：“大禾米白而又长大，以制作加工大禾米，大禾谷米白饭硬制作多团，需三蒸二百舂，弋市米为之食水多，软而适口，省垣称弋阳团子，最驰名外县，土商多远往他处做赠品。”

“熏衣高唱弋阳腔”

弋阳县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隶属于上饶市。弋阳这个名字在艺术圈里可谓如雷贯耳，南宋末年流传于江西弋阳地区的南戏与当地的方言土语以及地域民俗相融合而成的弋阳腔唱遍全国，广受欢迎。弋阳腔兼容并包，各地民歌、山歌、小调及道教音乐的优秀基因都被它吸收进来，生命力极为旺盛。弋阳腔的特色是“一唱众和”，以锣鼓伴奏，唱腔可塑性大、声调高亢，听起来既有南方温柔敦厚之雅韵，又兼具北方慷慨激昂之气质，刚柔相济，与昆山腔、余姚腔、海盐腔并称四大声腔。明代经济繁荣，弋阳腔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有诗形容“艳说长安佳子弟，熏衣高唱弋阳腔”。到明嘉靖年间，弋阳腔向着北京、南京、湖南、广东、福建、安徽迅猛发展，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高腔体系，影响着南北十三个省四十几个声腔剧种，孕育了昆曲、京剧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瑰宝。

随着弋阳腔传之四方的还有弋阳的特产：大禾谷年糕，它被弋阳的戏班艺人们带到全国后，凭着上乘的口味和方便的烹制赢得了口碑。

弋阳年糕的秘密首在原料——大禾谷。大禾谷是一种介于糯稻和籼稻之间的特色粳稻良种，单个的大禾谷米粒是半透明的而且泛着光泽，每粒米都呈椭圆形，长度在五毫米左右，微量元素多且胶稠度要大于70，平均精蛋白质含量达到80%，是制作年糕不可多得的好米。但是大禾谷对生长条件的要求非常苛刻，生长在阴凉的山垅潜育型冷浆田，水温偏低，湿度较大，光照时间短，且年均气温在16.5-18摄氏度，最高不能超过39摄氏度。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弋阳盆地”可以满足，弋阳县县境南北长，东西窄，多是丘陵。地形由南北向中部逐渐变低变缓，形成南北高、中间低的马鞍地形，四周环绕着怀玉山脉、武夷山脉，这使得弋阳全年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极为适宜大禾谷的生长。但是出了这一片盆地就不行了，以至于邻县曾多次引种试种均未获成功。

大禾谷生育期也特别长，需要在弋阳比较湿冷的水田里生长150天左右，一季稻会经历春播、夏种、秋养、冬收，吸足了“四季之水”，得天地之精华，才会成熟，是稻中稀品，被称为江西四大名米之一。

“三蒸二百捶”

弋阳年糕的另一个秘密是地下水。弋阳县的地下水有松散岩类孔隙水、碎屑岩类孔隙裂隙水、碳酸岩类裂隙溶洞水、基岩裂隙水等四

大含水类型，通俗地讲就是天然的优质矿泉水、山泉水。用这种水灌溉出的大禾谷特别有嚼头。

弋阳年糕在加工过程中，一般要先把大禾米浸泡在流动的弋阳山间泉水中3到10天，直到米粒吸饱了山泉水，变得湿润、松软，水中富含的微量元素源源不断地渗入米粒中，水也带走了影响年糕品质、使年糕变硬的成分。在我们看不到的微观世界里，山泉水中特有的微生物会进行轻微发酵，使淀粉适度分解破链，带走米中的单糖、氨基酸等影响粘牙因素的小分子物质，从而使弋阳年糕柔韧适中，软而不粘。

浸泡后的大禾米被冲洗入甑，用大火将米蒸成熟饭，再把蒸熟的米饭投入干净的石臼中，用木棍反复压，再用木棰反复捶打，最后把米饭打成米团，重新投入饭甑中用大火蒸。蒸后再投入石臼捶打，捶后再蒸，如是者三。

明万历年间弋阳知县新安人程有守就曾夸赞弋阳“山川文物甲于江右”，而且弋阳人秉性耿直，嫉恶如仇，“高风孤节，凛凛有生气”。这种性格反映在做年糕上也是一丝不苟。弋阳人捶、蒸米团要反复三次，捶打200次才行，以“三蒸二百捶”闻名，少一下都不行。直到现在，弋阳的民间活动中，捶打年糕仍是一项最受欢迎的活动，年轻人从古法的捶打中可以体味到先人们辛苦劳作、认真守信的传统。

捶打好的年糕半成品被分割成小团挤入印板，印板上雕刻有吉祥、喜庆图案，用手工压平后，年糕上就有了圆形或条形的印花纹。至此，一份年糕就做成了。

待到晾干表面后，农人们又把它们浸泡到立冬后至立春前十天的纯净山泉水中，用这个法子可以保鲜至端午节前后，现代的方法是用真空包装灭菌，可以保鲜一年。

弋阳年糕外观透明似玉，洁白如霜，油质发亮，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长期食用可消脂去肥、养生健体。1982年版《江西特产》和1986年版《江西风情特产》详细记载“弋阳大米粿洁白如霜透明如玉，油光发亮，韧性特好，比起各地年糕，无疑是更胜一筹”。

蒸、炒、烤、煮皆宜

年糕的吃法千奇百怪，据说是从3000多年前的周代开始，中国人就开始吃年糕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大夫伍子胥被吴王夫差赐死，传说伍子胥死前给亲信留下遗言，“我死之后，如果国家有难，

民众缺粮，你们到象门城墙挖地三尺，就可以得到食粮。”越王勾践得知吴国干城伍子胥已死，立刻乘虚发兵前来报仇。吴王夫差不敌，连吃败仗，被困在都城，兵疲粮尽，军民处在饿死的边缘。伍子胥的亲信赶到象门城墙下，挖地三尺，果然挖到了可以充饥的“城砖”。这些“城砖”是伍子胥当年用江米粉蒸制后压实制成的，十分坚韧，既可以作砌墙之砖，紧急时又可以充饥，这招“屯粮防急”之计解了城中军民的危难。这种“城砖”大概就是最早的年糕雏形了吧。除此之外，平常人们的吃法也不一样，北方人蒸着吃、炸着吃，上海人炖排骨吃、香港人兑椰汁吃，风味各不相同。

但是有的年糕久煮易糊、口感僵硬、脆弱易断、缺乏适量弹性；有的年糕口感绵软粘牙、韧性差无咬劲、抗拉强度低。弋阳年糕的妙处在于介乎两者之间，口味纯正、不黏不腻、柔软爽滑、韧性可口，吃起来很Q，久煮不糊，食用方便，咸甜均可，蒸、炒、烤、煮皆宜。弋阳本地的家常做法是将年糕切片与肉丝、豆芽、冬笋丝、青菜炒至半熟，炒至年糕变软加水，然后再根据口味加辣椒或狗肉，味道最佳。弋阳年糕还可以作为用炭火烧烤、放入火锅、加入稀饭等，可以让食物米香扑鼻。

现在年糕已经成为弋阳县的一项独特产业，2006年12月28日，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弋阳年糕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保护范围仅为弋阳县辖区内的5万亩土地。为了实现精细经营，弋阳县作出“关于实施弋阳年糕产业化工程的决定”，严格确保弋阳年糕独特的品质，目前，年糕产量达到2500余吨，年总产值达1500多万元。

2010年，弋阳年糕制作技艺被列入江西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参考资料：上饶之窗网、中国质检网，《弋阳年糕的理化、感观等质量特色与生产地域地理特征之间关系的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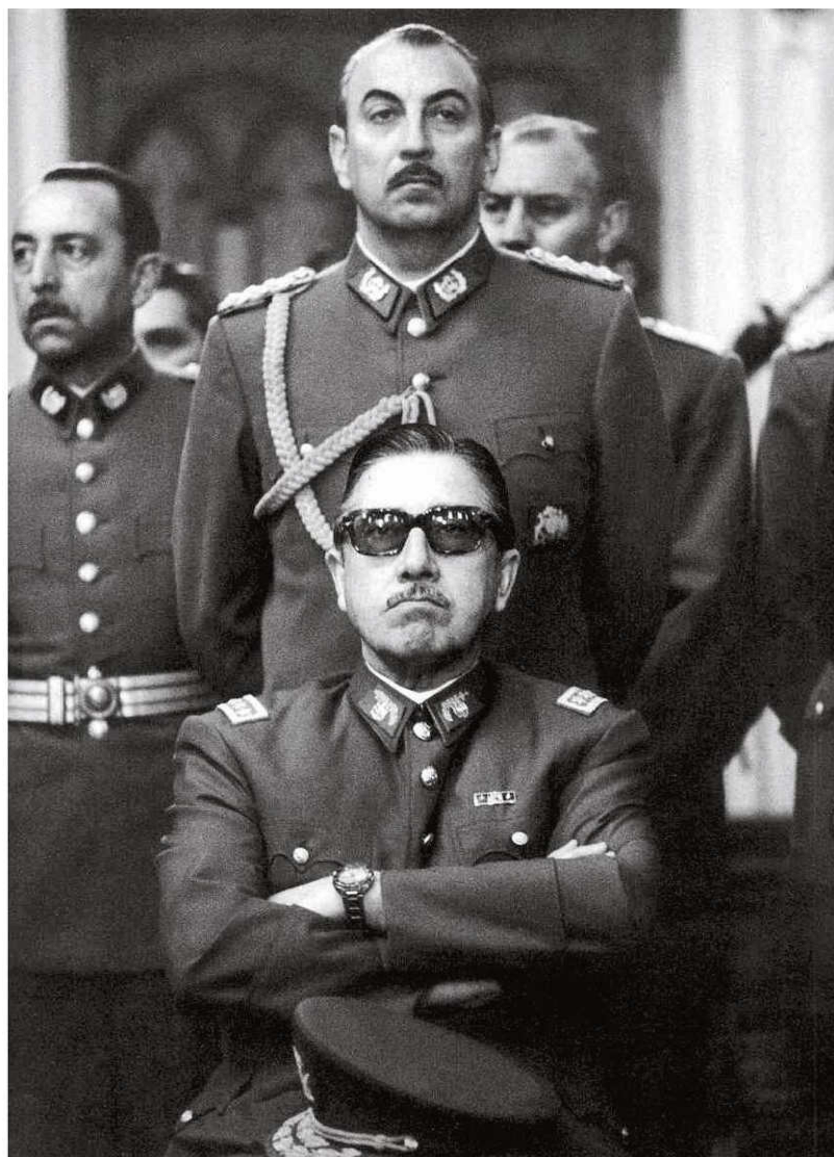
《智利说不》广告终结独裁者

作 者:上林











很少有中国人会去关注一部智利电影，直到《智利说不》在2013年取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这也是该奖项设立六十多年来智利电影第一次入围。此外，《智利说不》还入围2012年第2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东京电影节大奖，导演帕布罗·拉雷恩于2012年斩获第65届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黄金马车奖。相比较这些并不十分显赫的奖项，中国人或许会对电影的内容更感兴趣——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成功转型的样本——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的倒掉。

历史进程的简单化解读

《智利说不》是一个“广告救国”的传奇故事：1988年，皮诺切特的军政府面对国际施加的压力，被迫举行公投，由人民用“Yes”或“No”的方式，决定是否由皮诺切特再连任八年。一位年轻的广告人雷内·萨维德拉为反对党做广告宣传。最终的投票结果是反对票55%，赞成票42%。1990年，皮诺切特下台，智利民主化转型迈出重要一步。

导演帕布罗·拉雷恩长久以来关注智利政局，继《杀手夜狂热》、《后事》之后，创作了“皮诺切特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智利说不》。拉雷恩的父亲是智利最著名的右派政治家之一，他的母亲则是智利的前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作为亲历者的他也回忆了那场公投：“当年我的父母都为皮诺切特投了支持票。我是几百万名在街头支持皮诺切特的人中的一名。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我才搞明白了一切。”

墨西哥著名影星盖尔·加西亚·贝纳尔的加盟令本片的命运发生了巨大改变，不但带来了资金，关注度也高于两部前作，还帮助它入围戛纳电影节和奥斯卡。为了制造复古的时代效果，影片使用早已经被淘汰的U-Matic磁带录影视频格式进行拍摄，这种磁带正是上世纪80年代智利的电视新闻界所广泛使用的。剧组在美国犹他州找到了20台老摄像机，然后送到好莱坞，组装成4部。在飞机运送的过程中又毁

了一台，最终只有一部坚持到电影拍摄完。因此，整个电影都是以老掉牙的1.37：1的画幅呈现，而不是主流的1.85：1和2.39：1两种宽银幕标准。《好莱坞报道》曾认为，这种技术上的处理“弱化了影片的商业属性，甚至将令该片远离奥斯卡评审们的视野”，但拉雷恩拍摄的素材与1988年智利警方镇压民主集会的镜头实现了无缝对接，电影在影像真实性上所达到的成就反而成为它入了奥斯卡评委法眼的敲门砖。

在智利，这部片子可谓毁誉参半。一些评论家纷纷指责该片将历史进程解读得过于简单化，其视角仅仅局限于一部电视公投广告，而忽视了基层选民在这场运动中为反抗独裁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但拉雷恩却将自己的影片定义为艺术作品而非纪录片，他说：“不要把电影艺术视作历史实录，看电影就是看电影，仅此而已。”

而皮诺切特，或许是20世纪世界上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简单说来，他既是践踏人权的独裁者，也是经济腾飞的缔造者，充分说明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阿连德搞垮智利经济

在军人发动政变如同家常便饭和军事独裁司空见惯的拉美，智利是不折不扣的“另类”。早在19世纪20年代末，当大多数刚刚独立的拉美国家还在打内战时，智利就建立了拉美最早的民主代议制，此后的政府和总统，基本上都是通过正常程序产生和交接的，军人也并无太多干预国内政治的传统。要不是1970年上台的阿连德总统把国家搞到崩溃的边缘，皮诺切特也没有粉墨登场的机会和口实。

智利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铜国，这种初级资源国最容易走上国家干预至上的经济发展模式，采用进口替代战略，通过限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来促进本国工业化，到1970年，智利已经是拉美各国中国家干预和中央集权最为严重的国家。再加上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左翼风潮在拉美的风靡，智利走向社会主义已是水到渠成。

阿连德当选总统后，采取了一系列相当激进和冒险的政策：把中央计划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准则，将工业大规模收归国有，加快土地改革步伐，国家在许多经济领域扮演着企业主的角色；政府冻结了物价，实行高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还延期偿付外债，对国际贷款人和外国政府的债务不予偿还。阿连德宣称自己不是所有智利人的总统，言外之意是他只关心工人和农民。他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提高工人工资，把一天8小时工作制改为一天三班制；减免税收，增加补贴，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大面积为老百姓建造住房，实行免费医疗，

优先在劳动人民居住区建立和发展卫生所，组织医疗队到农村为农民看病；免费向孕妇和儿童供应牛奶等等。

这些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尽管有些看上去很美）破坏了供求关系，导致企业效率低下，资金不足，亏损严重。物资供应匮乏，通货膨胀加剧，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黑市应运而生。1972年，智利铜产量从世界第3位下降到第5位，出口值从6.5亿美元下降到4亿美元；农业产量下降3.6%，1973 年更下降了16%；国家为此每年要花大量外汇进口粮食，结果造成政府财政赤字的急剧上升，1973 年已占财政支出的 53%，而外汇储备则从1970年的3.43亿美元下降到0.5亿美元；军事政变前，通胀率竟高达800%！首都圣地亚哥商店唱起了“空城计”——悬挂着“没有面包”、“没有牛奶”的告示，阿连德许诺的“红酒加馅饼”生活没有到来，矿工、出租车司机开始罢工，甚至家庭主妇也走上街头抗议，农民和地主之间爆发武装冲突。

在和平年代仅用三年就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折腾得千疮百孔，足够奇葩的阿连德几乎得罪了所有人，最高法院公开抱怨政府执行土地法不力，而众议院指责阿连德政府违背宪法，号召军队维持宪法秩序。阿连德没收美国公司的铜矿，向华约国家一边倒的倾向也惹恼了尼克松，为了防止后院出现第二个古巴，美国开始插手智利政治，不过介入的程度众说纷纭，但至少引领经济制裁是有的。

阿连德于1973年8月23日任命皮诺切特为陆军总司令，后者当时坚定地告诉阿连德：“我不是右翼，我会效忠您，我不能容忍任何动乱。”然而19天后的9月11日，皮诺切特就联合其他3名将领发动政变，阿连德在总统府中弹身亡，存在被杀和自杀两种说法，死时手持卡斯特罗送给他的枪。

皮诺切特成立了军政府，由陆海空三军加上警察部队各派一名代表轮流执政，1974年6月27日，他自任总统，军衔升为“大元帅”。

发动“肮脏战争”镇压异己

皮诺切特18岁进入陆军学院，毕业后从少尉做起，一步步爬升至将军。他绝非粗鄙的丘八，身上颇多文化气息：他在战争研究所当过教授，编过学术杂志，精通地缘政治学、军事地理学和情报学，还在智利大学法学院研习了一段时间的法学。然而，他掌权后的施政，一点也不文雅，而且相当无法无天。

皮诺切特在当权期间解散了国民议会，取消了工会权利，禁止各类政治活动，长期实行全国宵禁，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对国家

进行极端严厉的管控，用他的话说是：“如果没有我的允许，这个国家的一片叶子也不能动。”他对前政府的残余支持者、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所有左翼政党被取缔，一些公开反对政府的人士也遭到迫害。1974年，他组建了一支特别警察部队，专门从事被称为“肮脏战争”的镇压活动。前总统、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爱德华多·弗雷，曾支持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后来主张恢复民主，故被报复杀害；卡洛斯·普拉茨，曾担任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的前任，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死于智利国家情报局策划的汽车炸弹爆炸；阿连德政府内阁成员，智利驻美国大使奥兰多·莱特利尔，在华盛顿遭汽车炸弹袭击身亡，美国司法部追查此案，发现有确凿证据证明是智利国家情报局干的。在智利的外籍居民和移民也难逃毒手，80余名西班牙移民被杀害，加拿大修女遭到酷刑，倾向于阿连德的瑞士等国国民被暗杀。一些异议人士被捕后遭严刑拷打致死，尸体被直升机运到太平洋上空抛下去。

皮诺切特当政17年间遇难人士的具体数目至今不详。智利“真相与和解”国家委员会1991年发布的报告认为，有2095人遇害，1102人失踪。成千上万的智利人因此出逃国外。2004年，“政治犯与酷刑”国家委员会发布报告称，大约有35000人声称遭到了军政权的酷刑折磨，其中有28000份证词被认为是合法的。

在这样的高压统治之下，皮诺切特得意地宣称：智利是“一片平静的绿洲”。1980年，在一场被严格控制的公民投票中，军政府制定的过渡宪法条款获得75%的支持率而通过。条文规定，1988年10月5日将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是否给予皮诺切特新一届8年任期，这为电影《智利说不》中那段历史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皮诺切特是一只“好猫”

在掌权之前，皮诺切特在经济政策上并无或左或右的定见，最初，他让手底下的军人去管经济，结果显而易见——阿连德留下的烂摊子根本收拾不住。到1975年，辨过味儿的皮诺切特决定起用以“芝加哥男孩”为核心、近百人的经济学家集团。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助之下，智利挑选优等生到芝加哥大学接受系统而深入的经济学教育，他们被称为“芝加哥男孩”。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强调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芝加哥学派的大本营，该学派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弟子相继出任智利财政、土地部长，终有机会将私有化、市场化的理念在祖国推行。1975年3月，弗里德曼亲赴智利，给皮诺切特开出了药方——“休克疗法”：停止大规模发行货币，削减政府开支20到25个百分点，裁掉数以万计的政府雇员，取消工资和物价管制，国有企业私营化，实行完全的自由

贸易等。

皮诺切特对“休克疗法”大感兴趣，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推行”，枪杆子在握的他敢于对病入膏肓的智利下猛药，“将智利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国度，而不是无产者的国度”。政府开支被削减了27%，大批滥发的货币直接被烧掉，国家退出银行系统，撤销金融管制，放宽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在国有企业私营化过程中，全国除了个别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由国家管理以外，其他大大小小的企业全部交给私人企业主，有400多家大型企业被拍卖。甚至连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和教育都纳入私有之列。在农村，军政府把历届政府实行土改中没收的土地逐步退还给庄园主。军政府还停止执行了长达40年之久的关税保护政策，大量外国商品被引进，对于限制国内市场价格的上涨起到了抑制作用。

当然，改革的“阵痛”是难以避免的，1975年，智利GDP负增长率达到近13%，工业产量下降28%，购买力跌到1970年的40%，民族企业接连宣告破产，无数政府雇员和工人失业。从1976年开始，智利经济逐渐缓过劲来，经济稳步增长，从1978年到1981年，经济增长了20%。到1981年，通货膨胀率更是从1974年中期的年均700%下降到10%以下。1983年，由于国际铜价暴跌，导致智利经济出现短暂停滞。但从1984年至 1988 年，智利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1989年高达10%，创历史最高纪录；到1989年，智利年人均收入达到 3000 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在整个拉美地区令人瞩目。由于受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80年代被其他拉美国家普遍称为“失去的十年”。相反，在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一枝独秀，被誉为“智利奇迹”，号称“拉美小老虎”，与“东亚四小龙”齐名。而最为吊诡的是，这个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者是一个最不自由的政治体制，弗里德曼说“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政治奇迹”。那么，罪行累累的军政府是否就比政治自由而经济管制的阿连德政府好一点呢？至少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两位经济学大师都这么看——能够保护个人自由、包括经济自由、财产权的威权主义制度是优于忽视自由甚至反自由的民主制的。

如果单拿“黑猫白猫”理论来衡量，皮诺切特是一只不折不扣的“好猫”，他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满怀信心地迎来了1988年决定智利命运的全民公投。

“智利幸福即将来临”

如同《智利说不》中那样，自我感觉良好的军政府对公投态度比较乐观。连反对派自己都不看好自己，按照他们的分析，当时的智利

民众对阿连德时代的短缺经济心有余悸，担心没了军政府智利会古巴化；还有人记起1980年那次对宪法的公投，认为在皮诺切特的管制下，投票根本不可能公正，所以不会去投票。主人公问家里的保姆，她会如何投票，对方回答自己的儿子在念大学，女儿有了工作，她对目前的状况很满意，民主不民主以后再说。这代表着大多数智利人的想法。

反对派打算是，利用这次公投来表达意见，因为“yes”和“no”两派将获得同等的不间断的电视宣传时段，所有电视频道都将同时转播这些宣传内容。而此前所有的公众媒体都控制在皮诺切特的手上，人们听不到一点反对声音。电影主人公是一名商业广告导演，他并没有采取许多反对派要求在电视中控诉皮诺切特暴行的观点，而是不翻历史旧账，用轻松、愉悦、幽默的风格，以欢乐和自由为卖点，宣称“智利幸福即将来临”，告诉人民有向政府说不的自由。反观“yes”阵营的宣传片，用智利经济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就画面配上伟大光荣正确的男女高音对皮诺切特进行吹捧，还用压路机碾碎生活用品的镜头暗示反对派将把智利带回阿连德时代，充满了说教、恐吓的味道。

10月6日，投票结果揭晓，反对票55%，赞成票42%，皮诺切特继续执政的可能性被否决。归结于广告宣传当然很表面化，背后的原因很复杂：军政府积怨太深、长久以来的民主传统、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加大、反对派坚持不懈的斗争、70年代末80年代初拉美军人政权相继“还政于民”大潮、里根政府对于独裁者的厌恶……

1990年3月11日，皮诺切特离任，不过他给自己留的后路可进可退，颇显政治智慧——按照1980年宪法的规定，皮诺切特于1998年3月前仍保有陆军总司令职务。同时宪法还规定，在任6年以上的总统可以获任终身参议员。皮诺切特因这一职位获得司法豁免权。2006年12月10日，皮诺切特去世，终年91岁。在圣地亚哥街头，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爆发了冲突。

皮诺切特在1989年告别政坛前夕发表国情咨文时骄傲地宣布：“我接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而移交的则是一个具有坚实基础、旺盛未来的国家。”此言不虚，皮诺切特下台后，其继任者均为中左派，但他们继承了自由市场政策。到了1992年，智利的失业率下降到5%以下，每年平均GDP增长率达到了6.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人类发展指数报告称，2013年智利首次超过经合组织发达国家标准。

弗里德曼认为，军政府、或者说威权主义政府的基本结构和内在精神，是与自由市场不相容的，在80年代初，他曾预言：“自由市场

经济不可能持久，除非军政府被一个信奉自由政治的民选政府所代替……”到了2000年，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总结：“有关智利经济真正重要的事情是，自由市场为通向自由社会打通了道路。”

这无疑是说——皮诺切特挖了一个坑，然后把自己埋了，坟上鲜花盛开……

黑暗中凝神倾听

作 者:李舫



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谈到它，这样一部屡屡与国际大奖擦肩而过，却能够长久地矗立于影迷口碑之上的旷世杰作。

《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诞生于1994年，由法兰克·戴伦邦特执导，改编自畅销作家史蒂芬·金的原著作品《不同的季节》中收录的《丽塔海华丝与肖申克监狱的救赎》。电影中的男主角安迪由蒂姆·罗宾斯饰演，男配角瑞德由摩根·弗里曼饰演。

这样一部没有女性角色的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获得认可堪称奇迹。资料显示，《肖申克的救赎》上映至今，在互联网电影数据库（IMDB）的“史上250部最佳影片”的评选中，一直在与《教父》进行第一名与第二名之间的拉锯战，这部电影可以说是问世以来最多影迷参与评分的电影。

然而，尽管有着这样良好的口碑，这部电影在与观众见面时，却并不被看好。1994年9月，《肖申克的救赎》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映，观众的反应平平。上映之初影片只获得18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甚至不足以收回成本，此后又陆续获得1000万美元左右收入，仍可谓票房惨败。

但是，这并不影响它在从院线撤出后的观影奇迹，此后它在音像市场和电视屏幕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在影迷中的口碑节节飙升，依靠口口相传赢得大量坚定的粉丝——这个现象已经成为世界电影史上最著名的案例。

在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肖申克的救赎》获得七项提名。但遗憾的是，最终未能获得任何奖项。这是因为，对于世界电影来说，1994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一年，多部重量级电影的丰收把电影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这其中有《肖申克的救赎》、《阿甘正传》、《这个杀手不太冷》、《低俗小说》、《真实的谎言》、《生死时速》、《变相怪杰》、《狮子王》。

回到《肖申克的救赎》，让我们看看这部电影所蕴涵的力量和重量。电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1947年的平凡的故事。一位年轻有为的银行家安迪·顿佛瑞被怀疑杀害了偷情的妻子和情人，被判终身监禁，服刑于肖申克监狱。

肖申克监狱就是一个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盛行的地方。监狱长诺顿心狠手辣，看守长哈利凶狠残暴，他们平时道貌岸然，将《圣经》倒背如流，可是攫取利益、欺诈犯人时却不择手段。肖申克，折射了美国司法制度的种种弊端以及对人性的压榨折磨，犯人的制度性保护严重缺失。

在肖申克，安迪结识了黑人瑞德。瑞德20岁即因命案被判终身监禁。这一年，他40岁，已经是一个监狱里的大能人，能给狱友们搞到各种监狱内禁止流通的商品，香烟、白兰地，甚至大麻。安迪的学识令瑞德倾慕不已，他们成为朋友，瑞德按照安迪的要求帮他搞到一把手锤，这把手锤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成为救赎肖申克的一个伟大符号。

两年后监狱长招募志愿人员前去劳动。安迪利用自己所精通的税务知识帮助监狱长诺顿成功逃避遗产税，诺顿对安迪刮目相看。不光诺顿、肖申克所有狱警的所得税申报都交由安迪处理，诺顿的黑钱也通过安迪一一转化为财富。安迪后被从洗衣房调到图书室，在他的努力下，州议会终于同意每年给监狱拨款500美元，以供犯人们购买书籍。很快，安迪在肖申克已经住了10年。1965年，犯偷窃罪的汤米来到肖申克服刑。一次偶然的机会，安迪从汤米口中得知杀害自己妻子的真凶，他立即去找监狱长诺顿。诺顿假意同情安迪，暗地却担心安迪出去泄露他洗黑钱的事，他出手害死了汤米。

汤米的死让安迪明白，只有越狱才能救自己。他利用小锄头在海报后的墙上挖了一个大洞，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带上监狱长的账薄和转账支票成功逃出肖申克，诺顿终于获罪。在得州边境的小镇，获得假释的瑞德按照与安迪的约定找到了安迪，两个好朋友终于团聚。

这是一部轻缓却沉重的电影。它像一个贴心的老友，在下午茶轻快而放松的情境中，和风细雨般娓娓道来他波诡云谲的故事。没有电影特技，没有感官刺激，对心灵的震撼却更持久、更有力；没有男欢女爱，没有激情场面，两个男人之间的友情却更真挚、更动人；没有打斗厮杀，没有狱中惊魂，黑监狱的明规则和潜规则，却更加惊心动魄，更能够紧紧揪住观众的心。

电影用第三人称的旁白描绘了肖申克监狱二三十年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以瑞德的视角描绘了安迪的作为和因他而得到救赎的肖申克监狱，这种大量的旁白处理和第三人称视角赋予了这部电影既主观而又客观的叙事语境。法兰克·戴伦邦特将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细节处理得宠辱不惊、大气磅礴，冲突就隐藏在平静的水面之下，毫无涟漪，众声喧哗之中，安迪教给我们如何凝神倾听。

其实，我以为，这种静谧之中的倾听，恰恰就是电影的救赎主题。《肖申克的救赎》诞生已近20年，这期间，影迷找到了大量的解读这种救赎的关键词。不妨罗列如下：监狱与黑暗、希望与绝望、贪婪与救赎、体制与漏洞、努力与光明、人性与兽性、友谊与温暖、体

制与背叛，救赎的解读在不断延伸，对电影内涵的拓展也在不断延伸。

曾有人问，为什么影片的名字是“肖申克的救赎”而不是“安迪·顿佛瑞的救赎”？我理解，安迪的成功出逃不仅让自己获得自由，更成功完成了整个肖申克监狱所有犯人的心灵的救赎。瑞德曾经对安迪说过：“在肖申克，希望是个危险的东西，它会让你痛不欲生。在这里，你绝不能拥有任何希望。”尤其对他们这些死囚来说，他们必须放弃希望，完成对监狱四周高墙从恐惧到依赖的转变过程，完成内心对死囚身份的认定，这是一种自我放弃，自我灭绝。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桥段，一个在狱中度过大半生的老图书管理员布鲁克斯终于获释出狱，可是多年的牢狱生活已经使他“体制化”，面对扑面而来的自由，他却突然失去了生存下去的能力和信心，最后选择上吊自杀。

而安迪却不相信这些。就像片中那句脍炙人口的台词：“有的鸟，是不会被关住的，因为它的羽毛太美丽了。”从踏进肖申克的一刻起，安迪就从未放弃过理想和坚持，他相信，“生命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要么忙着去生，要么赶着去死，或者都是，或者都不。”安迪选择了去生，而且，是以一种庄重的、骄傲的方式生存。

从安迪被构陷到锒铛入狱，影片的色调保持着阴暗、冷峻、压抑、凛冽，而影片的结尾却开始呈现越来越明快艳丽的色调，碧海，蓝天，明丽的光泽几乎要从银幕上喷薄而出，镜头在此结束，肯定了对人性的救赎，对自由的追求，对希望的珍视。

今天看来，影片的叙事和镜头处理功力令人称道。大量的景深镜头，赋予这个背叛和救赎的故事以深刻的寓意。安迪莫名入狱，镜头摇向天空，蓝天和黑暗泾渭分明，邪恶和压迫感油然而生。安迪逃离监狱，跑到了一个水潭边，镜头后景是被雷电黑暗笼罩着的监狱，自由的欣喜让人难以忘记。与一般的越狱片不同，《肖申克的救赎》的智慧之处在于，导演并未着力展示如何艰难、顽强、智慧地掘洞，而是试图证明安迪身处残酷魔域20余载，不舍对人性的坚守，不舍对自我的情感、生命、价值、权利的坚守，永远怀揣希望，渴望自我救赎。

这部《肖申克的救赎》我不知看了多少遍，每一次，当自己的情感和思绪从阴森森的监狱飞扬到明艳艳的海滩，我都在想，如果我是安迪，我愿意用20年的时间凿穿厚厚的墙壁、爬过那条500码的下水道，开始自由的冒险吗？假如有这样一个游戏，在肖申克的高墙内选择一种身份，我愿意选择谁？恰如莎士比亚所问：“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影片中有一个情节相信很多人难以忘怀——入狱后，因为对公平仍持有信任，安迪一直保持低调，可是在洞悉肖申克的生存法则后，安迪却突然爆发，在监狱里旁若无人地播放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一段咏叹调。这部歌剧讲述的是一对恋人艰难冲破伯爵的阻挠后结为夫妻，对自由的渴望、对美好感情的向往令囚犯震撼。这个场面已经成为电影史上著名的桥段：节制、冷静、理性的长镜头缓缓摇过正在广场上放风的囚犯，每个人为天籁般的音乐深深迷醉——这种悠然自得，恰恰是安迪想要告诉大家的关于生命与命运的真理。这一刻，我明白，安迪不仅救赎了肖申克，也救赎了我，救赎了银幕前的芸芸众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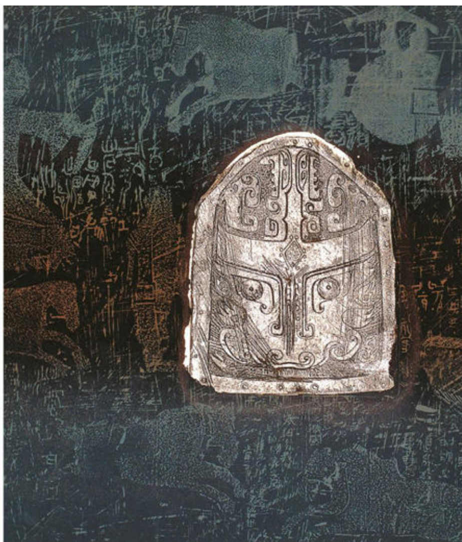
那么，你呢？

用作品践行艺术之梦

作 者:周冉



义东/摄











从

部队推土机手，到军艺学员，从出版社美术编辑，到神州书画院院长，几十年来，无论社会角色如何转换，陈万秋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艺术的追求。版画、中国画、设计、雕塑、壁画，他从不拘泥于某一画种，坚持不懈地探索着前行，用一件件作品践行着自己的大美术之梦。

版画情缘

1989年，陈万秋从部队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一届版画专业班，与如今的艺术院校招生不同，当时的军艺学员都是全军的美术创作骨干。陈万秋也不例外，入校前，他的版画就已数次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是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并且已在军艺美术系学习了两年中国画。通过在校四年的造型基本功系统训练和专业培养，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基础。

“版画既是大众艺术也是高雅艺术，”陈万秋说，版画在西方特别是在欧洲创作水平比较高也比较普及，中国新兴版画是在鲁迅倡导下发展起来的，涌现了北大荒等许多版画群体。我国几大美院都设有版画专业，但受众面至今很小，对普通大众来说，只能在报纸，展览中见到版画，能拥有一张版画挂在墙上欣赏的家庭不多。

陈万秋介绍说，版画是靠版印出来而不是直接画出来的画，其特点是 “复数”和印刷肌理等。中国传统年画，如门神、杨柳青年画等，就是刻好版印出许多张，家家户户都贴一张。以铜版画为例，在铜或铝等金属板材表面刷上一层防腐漆，在漆面上刻出所需图案，经硝酸腐蚀，刻掉的部分腐蚀进去，没刻的部分保持原样，再涂上油墨放在凹版机上印出画来。陈万秋以我国古代战争为主题创作的《战神》系列作品，曾入选“中国新兴版画60周年”出展日本、美国以及欧洲等许多国家，采用的就是铜版画艺术形式。

此外，陈万秋还根据不同内容分别用纸版、综合版等探索不同表现形式，他创作的一组具有浓郁中国民俗风情的系列木版水印版画《进城》，被国务院文化部选送印度、塞内加尔、奥地利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展出。丝网版的表现效果更丰富，应用更广泛。陈万秋为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马海德创作的版画《他从远方来》，就运用了丝网版。马海德是新中国建国后第一位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这幅画是塑造马海德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中国参加抗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以及建国后消灭我国麻风病贡献了毕生精力的非凡人生”。陈万秋曾两次拜访马海德家，了解人物人生轨迹，选出马海德不同历史时期的图片重新排列，通过虚实、大小、疏密的对比，使历史的真实产生朦胧的幻觉效果。由于这幅画立意独特，形式新颖，内容与形式结合的巧妙而先后入选建党70周年全国美术展览和北京市美展，获优秀奖而被收藏。

此外，《红云》《1860·祭》《蓝色梦》等六幅版画先后入选全国美展并获奖或被收藏。1997年建军节期间，他创作的67幅反映军事题材，讴歌军人情怀的版画以“《兵之魂》陈万秋现代版画展览”为

题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探索艺术设计之路

随着现代设计艺术走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陈万秋开始将设计融入到不同艺术形式的创作中，谋求新的创作活力与发展空间。

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美编室工作期间，上百部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的书籍装帧设计作品出自陈万秋的手。十几年前，中国的设计整体水平还相对落后。没有电脑工具，陈万秋就大胆启用喷笔代替传统手绘，使设计效果面目一新。大量的设计实践，锤炼了他对西方现代构成与中国传统艺术的综合运用能力。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交汇中寻找新亮点。如反映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故事的《片古岗之战》一书的封面设计，就融合了现代构成与云南民俗元素，出版后代表出版社参加了北京第二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其独树一帜的现代民族特色使人眼前一亮，获得博览会装帧设计银质奖。

他为《张爱萍传记》以及邓小平题签的《双拥模范城》报告文学系列丛书等作装帧设计，简洁庄重，含蓄概括，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书籍的内涵与主题。他将自己在部队基层的文化工作经验编写成《橱窗板报的编排与设计》一书，曾四次再版发行，还时常接到全国各地因买不到书希望索要的读者来信；此外，他为第七届全运会设计的《办好全国七运会，迎接亚运会》的宣传画在激烈竞选中脱颖而出，一时间贴满北京的大街小巷，成为当时老百姓最熟悉的形象之一。

航行香港的“生命之帆”

1997年，香港特区政府医院管理局新办公大楼在香港九龙落成，空旷的一楼公共大厅急需一幅兼备艺术性和与生命内涵有关的壁画作品。香港有关方面从央视一档介绍大陆艺术家的节目里，了解到军旅艺术家陈万秋，他们通过解放军总后勤部找到当时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的陈万秋，希望由他担任这幅大型壁画作品的设计者。

“当时我正在办公室上班，有人敲门说有一位香港特区政府建筑署的领导来找我，我还挺惊讶的。”对方说明来意后，陈万秋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下来，“虽然自己从没有涉足过壁画，但当听说要在三层楼高的大厅创作两百平米壁画时，心情暗中激动，因为长期以来总想将自己的所学回报社会，至于怎么做、做成什么效果当时心里并没有底。”

香港特区政府医院管理局，是管理香港四十多家医院的政府机

构。“生命”是大楼存在意义的核心。而军旅生活的磨炼使陈万秋对生命的理解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工程兵部队，他亲眼目睹身边的战友倒在国防建设工地上，在医院工作期间，又体验了医护人员为挽救生命无私奉献的点点滴滴。香港有关部门充分尊重作者的思路，对创作氛围要求比较宽松，只是在有关尊重当地社会风俗方面提些意见，如“女主人公胸部不要太袒露，适当加一条围巾使其更含蓄些等等”。所以仅两三天时间设计稿就顺利通过。1997年6月，一组《生命》系列大型煅铜浮雕壁画展现在香港同胞面前。

这组浮雕以“生命”和“医疗”为主题。分《生命之歌》、《生命之帆》和《生命之光》三部分。《生命之歌》表现的是一男一女手捧音符，互拥着一枚硕大果实，象征生命诞生的序曲；《生命之帆》表现的是生命在成长中要面对各种挑战，如同进入长河大海，历经各种曲折和磨难；《生命之光》则展现了医护人员化身天使，手捧天火从天而降。天女们时而放飞白鸽，时而舞姿翩翩，身边环绕日月星辰，世界文明的经典点缀其间，一位飞临大地的高大女神，双臂高举，目视远方，托起一轮燃烧的巨大火种象征给人间带来光明与温暖。

发行世界的香港《a.u——建筑与城市》杂志，在市内装饰专栏评价道：“壁画为大厅平添了庄严之感，为香港同胞带来了额外的惊喜”。这幅作品先后入选全国首届壁画大展，作为经典作品入选《中国壁画百年》大型画册以及我国大学艺术教材系列丛书。

小井红军医院雕塑群

200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在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遗址创立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需要创作艺术品来丰富遗址的教育元素。设计创意在美院、军事博物馆和陈万秋三方分别展开，通过数轮评选，陈万秋的设计方案脱颖而出。2010年7月，革命圣地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雕塑群落成并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提及这组作品时，陈万秋却说：“大家关注这组作品，是因为关注和崇尚井冈山精神，是井冈山精神价值在人们心里产生共鸣的结果。”

小井红军医院位于江西井冈山市茨坪镇西北面约6公里处，因地形犹如井状小盆而得名。它由原来的茅坪、大井两个医务所扩建而成的。最初取名为“红光医院”，是我军第一所正规医院。

为了使创作避免概念化，陈万秋曾两上井冈山，接受再教育，并充分听取当地遗址管理部门的领导、专家、学者的意见。几经易稿，最终以《舍生忘死》《艰苦创业》《战友情深》三组群雕，连同再现130多名伤病员惨遭枪杀的悲惨历史事件的浮雕《碧血丹心》和《丰

碑》等五个部分定稿。较全面地概括了小井红军医院的革命斗争史。游人进入大院，右侧是这三组铜雕塑，左侧是一组浮雕。

除了《战友情深》中的师长张子清和《丰碑》中的党支部书记曾志的形象是按其真人历史照片刻画而成，其余十几个人物都是陈万秋塑造的艺术形象，生动鲜活，观后令人难忘。

“小井红军医院遗址是历史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历史文献特色。雕塑材质，我选择墨绿色的铸锡青铜和山东产深紫红色的砂岩。这两种材质不但古朴、沉稳，与周边环境色调相协调，而且耐腐蚀，适应当地室外多雨潮湿的自然环境特点，其火炼铸造、锤钎斧凿的加工过程，更符合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性质与视觉张力的需求。”陈万秋说，而泥稿的塑造是创作中最重要的环节，特别是人物的面部表情、躯体动态和衣纹的概括，要古朴硬朗而粗放，人物的面部表情却要细致，这样才能通过对比使雕塑更生动，才能传达八十多年以前那个时代的信息与情感。

近些年来，陈万秋创作的大型公共环境艺术作品不断增多，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评价说，“陈万秋顺应时代发展，以小我融入为广大公众服务的大我之中，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投入到正在发展中的我国公共环境艺术事业中，我国许多重要公共环境都长久地展示着他的作品，不但美化、丰富、延展了这些环境空间的视觉效果与文化精神内涵，使艺术更贴近民众，服务于社会，并逐渐形成了传统壁画与现代构成，写实与变形兼容并蓄的艺术风格，既顺应了雅俗共赏的大众欣赏需求，又不失清新典雅的艺术品位。为我国新兴公共环境艺术事业的成长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陈万秋对记者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公共环境艺术，在我国城市化建设中才刚刚起步。关注并大力倡导我国公共环境的高水平人文建设，对提高国民文化素质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党中央加强文化建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应逐步成为各地环境规划执政部门和全体国民的共识。”

位于北京神州书画院的办公室，挂满了陈万秋的个人作品和图片，以中国画和雕塑照片居多，这些饱含陈万秋心血的一张张宣纸和照片，是他多年来艺术经历的最好总结。那些遍布全国的大型环境艺术雕塑及壁画作品，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位甘居陋室，却在艺坛不懈耕耘的艺术家。

天价“毛瓷”：政治任务烧出瓷中精品

作 者:韧雾







中

国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始于北宋中晚期。官窑举全国人力物力之最，不惜工本，万中挑一，涌现出一批汝官哥定钧窑等传世精品瓷器。进入民国，官窑不复存在，除了袁世凯在不到百日称帝期间烧制的一批“洪宪瓷”，也只是昙花一现了。1949年后，诞生过一批人称红色“官窑”的瓷器，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便是“毛瓷”。

2013年6月20日，保利香港举办的“湘绣湘瓷艺术精品拍卖会”现场，一套五件的釉下五彩毛瓷碗以800万元的价格成交，成为该场拍卖会的“标王”。虽然古瓷动辄过亿，但相比当代其他同类瓷器，这一价格已算天价。其实早在1997年，一件“水点桃花”毛瓷饭鼓拍卖价66万元，创造了当时中国当代瓷器在世界拍卖市场上的最高成交价。如此价值不菲，只因出身不凡：它们皆是专为毛泽东设计研制的日用瓷器，俗称“毛瓷”。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由政治任务制造出的瓷中精品，正成为艺术品市场上备受追捧的收藏新贵。

醴陵“毛瓷”：家乡的瓷器最美

在陶瓷收藏界，从狭义上来说，“毛瓷”特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湖南醴陵及江西景德镇专为毛泽东特制的生活用薄胎瓷。前者是毛泽东

生前使用的主要瓷具。醴陵瓷的历史不容小觑，是有千年历史的古瓷都。1905年清政府拨库银18000两，在醴陵创办湖南瓷业学堂，匠师在传统青花装饰的基础上，创造出名扬于世的“釉下五彩”瓷。创始人熊希龄亲携醴陵瓷器贡呈慈禧太后，得到她的赞许，以金牌赏之。1915年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醴陵瓷还曾与茅台酒一道同获金奖。

1949年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以及人民大会堂等国家机构多使用“建国瓷”。当时由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提议的“建国瓷”，对新中国瓷业影响巨大。景德镇、醴陵、宜兴等瓷产区正是通过对“建国瓷”的研制，得以从几十年的战乱衰败中恢复过来。

毛泽东先后四次到过醴陵，他年轻时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开始对醴陵瓷有所了解。据其本人回忆，醴陵乡亲很好客，每次去都会用漂亮的小碟子装小吃招待他。1955年醴陵县成立了陶瓷研究所，1956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湖南省醴陵瓷业公司成立，醴陵县陶研所升级为省陶瓷研究所。此后湖南醴陵的制瓷业迅速发展，跻身中国当代瓷都之列。

1964年周恩来亲自选定醴陵釉下五彩瓷为人民大会堂餐具。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湖南省陶研所烧造的瓷器，并不向社会销售，而是精挑细选后直接送往中南海，一般为国宴餐具、领导人生活用瓷，以及国家领导人出访高级礼品瓷。其间诞生了不少有品质的名贵毛瓷：最早1958年的“胜利杯”到1964年特制的“139号”国宴瓷，再到1973年的带盖鱼盘等。据有关资料，十多年间，中南海国家机关在醴陵定制毛泽东用瓷达1555件，包括食具、茶具、文具、烟灰缸、牙盒等。其中最为知名的是1974年为其制作的双面装饰薄胎碗，是当代醴陵窑中的极品。

1974年秋，毛泽东最后一次回家乡湖南，共住了114天。他已至耄耋之年，晚年仍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一手持书卷，一手拿放大镜，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疲惫时碗都拿不稳。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平化知道后，便提议为主席烧制一种轻薄的小碗，正好他的81岁生日就要在长沙度过了。1974年11月醴陵县群力瓷厂承接了这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按照要求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开展工作。省委方面提出了几项要求：一是内外两面都要有花纹，“为的是让毛主席吃饭时心情愉快”；二要重量轻，方便主席拿碗；三要釉下彩，无铅毒，不含镉，保证健康；四要突出政治，“要有全国代表性”。为此，群力瓷厂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从选料、配方到器形设计、颜料搭配……开始在每一个细节上攻关。

这批毛瓷所使用的“洪江大球泥”，只湖南洪江有，存量极少仅数吨，在当时便作为国家用瓷专用土被封存。这批毛瓷的制作打破历史上瓷器底足不施釉的制作工艺手法，大胆尝试，将坯体倒装入窑、经过1360℃的高温烧成瓷器，再在成瓷后的碗口施上一层白色低温釉，经700℃的低温窑烧制而成。这样历经低温烧素坯、高温烧制成瓷、低温烧釉口的三次进窑工序，难度相当大。担任彩绘设计总工程师的李人中，最初为花色犯难，一周闭门苦思不得，最后是喜欢养花草的老伴为他解了围，“我看月季花就挺好，红红火火”。他顿觉开悟：月季大江南北皆可种植，又名月月红，象征“祖国山河一片红”。在红月季的基础上，大家又设计出红芙蓉，红秋菊，红腊梅共四种图案，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同时画工之细致无与伦比，瓷碗上每一朵花的花纹都是一致的。

这批主席专用瓷经过一个多月的试制后烧制成功。瓷器晶莹剔透，有如玉泥嫩肌般温润可人，重量仅有124克左右。任务完成后，与该项目有关的所有模具、配方、图纸等均作为绝密档案收存入库。有关部门从逾2万件的烧制成品中遴选仅40件精品带走，另奖励给制作者极少几件外，其余全部销毁。如今的“洪江大球泥”也已被开采殆尽，其价之高，人称“泥黄金”。据说当年醴陵瓷厂给中南海中央警卫局核定的成本价每件为人民币1.32元，生活管理员吴连登用毛泽东的稿费支付了制作费用。

吴连登回忆，毛泽东第一次看到月季花碗时，高兴地说：“这好啊！”他欣赏瓷碗的轻透精美，问瓷器是哪里做的？得知出自湖南醴陵后，他轻轻叹了一句：“家乡的瓷器真美”。据吴连登自述，毛泽东晚年很钟爱这种小碗，“他老人家就是用这种家乡的瓷碗，喝了最后一口汤，吃了最后一口饭”。

“7501”瓷：经历重重考验

毛泽东生活中一向有两难：睡觉难，吃饭难。常常饭菜送来了，他不能及时用餐，“一次一次地叫，也不吃，等他工作完了，要吃饭，饭菜早就凉了”。1975年，随着年事已高，毛泽东健康也已大不如前，双手乏力，吃饭咀嚼也慢。为主席制作保温防尘、美观轻便的餐具又提上议事日程。

据有关资料，主席用瓷改在景德镇烧制缘起一段小插曲。1974年毛泽东住在长沙时，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来湖南，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商议主席去江西时的安全警卫工作。他一眼瞥见桌上放着的主席用的红色梅花瓷盘，随口说了句，“我们江西造出来，肯定比这个好”。汪东兴问他：“能行吗？恐怕也难吧。”但黄庆荣认为江西

可以一试。在其他媒体采访中，汪东兴也谈过当时的考虑：“毛主席是湖南人，所以先安排湖南省生产，但是送来的设计图案不是很满意。这样我打电话给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黄知真，将任务下达给景德镇。”

1975年4月，景德镇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接到中央的指示，要求他们在三个月内完成毛泽东用瓷的研制任务。因是该所1975年的第一项任务，故称“7501任务”，“7501”瓷也因之而得名。生产同样也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陶研所甚至最初都不知道这批瓷器是为毛泽东生产。参与工程的全体人员都经过严格政审，管理严密，窑场四周还设立岗哨。

黄庆荣是负责这一专项工作的核心领导，他提出的最基本要求是：“用料要最好，能保证绝对安全卫生”，“当然还有美观，制作工艺不能有半点瑕疵”。江西省委拨给制作经费35000元，同时安排抚州地委提供10吨特级高岭土，高岭土是烧制高白釉瓷的上等原料。瓷器的图案征集了众多稿件，最后选出三种：“水点桃花”、“翠竹红梅”、“双面对画芙蓉花”，皆是从毛泽东诗词中汲取的灵感。器具类型方面，因主席用瓷中已有盖杯，不配茶具；主席不善饮酒，配酒壶也会多次传倒酒，增加不安全因素，所以“7501”瓷没有茶具酒壶，只生产茶杯酒杯。

数百名“红卫兵小将”加入陶研所的选料工作，从十吨临川高岭土中选出两吨精料，达到了真正的精益求精。用这种胎料制作瓷器，须烧到1380-1400℃才能瓷化。这决定了烧制是整个流程的关键。当时景德镇还没有能耐如此高温的匣钵。试制匣钵成型时屡屡出现开裂，匣钵厂都不愿接活儿。还是上级打电话给厂领导，强调是中央特殊的政治任务，才承接下来，几经曲折研制成功。接着烧制试验中又多次发生倒窑现象，造成此前的心血付之一炬。曾经的工程负责人杨火印记忆犹新，因为要赶时间完成任务，有的窑师傅甚至着急得大口吐血。最后还是科研人员探出新路，升温到达1380℃时，采用特殊办法保温两小时直至升到1420℃左右，终获成功。

另外，釉下彩颜料也面临挑战：景德镇只有钴蓝（青花）和铜红（釉里红）两种，烧制梅花图案用的粉红色颜料无成法可援。负责颜料的人员几个月内试验均告失败，不是颜色欠佳，就是彩绘处的釉面出现龟裂。有人回忆，当时还被军代表找去“谈话”，说如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将以“军法从事”，被吓得不轻。他们为此成立颜料攻关小组，群策群力，夜以继日地反复试验了数十个配方，最后试验出一种添加剂，能有效防止裂纹。

几经波折，到1975年8月，陶研所烧出22窑瓷器，合格率为30%左右，实际成品为4200余件，其中优中选优1000余件送发北京。这批历经考验诞生的毛瓷有四绝：白如玉，独有的临川高岭土烧制的瓷器洁白如玉；明如镜，瓷器表面莹亮如镜面，泛着银色光芒；薄如纸，阳光照射下几近透明；声如磬，以手指扣敲瓷器，其声有如乐音，清脆悦耳。它还有一个最大特点是导热系数低，壁厚不足毫米的茶杯注入开水后，用手紧握杯体也毫无烫手之感。

按规定剩余下来的“7501”瓷，封存库里的应全部销毁，但考虑到专用瓷器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生破损，需要补充，加上陶研所提出要求：希望能留下一部分给所里作科研用，所以只毁掉了一部分，一部分留做储备。1982年春节，景德镇陶研所将部分器型较小的“7501”瓷连同其他库存产品，当做福利一起分发给本所职工，这大概是“7501”瓷流向民间的开端。据资料，目前流散民间“7501”瓷大概有千余件左右。

瓷中精品，难以复制

“7501”瓷最后有没有被毛泽东本人用过，现存说法不一。有文章坚称他去世前未及使用，但也有人如吴连登回忆详尽：“主席晚年咀嚼很慢，而且喜欢在饭里加些菜汤，7501无论是碗还是菜盘和汤盆，设计得都比其他一般的餐具深，这样，主席吃饭时加点菜汤，就比较容易”。吴连登还形容毛吃饭时，喜欢欣赏手中的饭碗，“他拿在手里，那碗是非常轻的，所以主席有时边吃饭边拿在手里转着看”。

实际上，围绕“毛瓷”的说法很多都无定论，众说纷纭。比如毛泽东最青睐的毛瓷，至少有三四种说法：因为一生爱梅，他最爱红梅图案；主席最爱芙蓉花，因为芙蓉代表湖南，寄托对故土的思念；最爱水点桃花的娇俏清丽；最爱月季的鲜艳夺目等等，不一而足。毛泽东本人对生产毛瓷的特殊任务是否知晓？有人说，无论是醴陵还是景德镇，毛都从不知晓，是其身边人去置办的；也有文章举例，“7501”工程是由毛泽东批准后中央下达的任务……民间关于毛瓷的种种传闻从未间断，也是因从未有官方正式版本的说法，才给流传提供了想象的空间。附着领袖情结与红墙秘辛的毛瓷，注定将笼罩着淡淡的神秘色彩。

毛瓷的产量在当时受到严格控制，现今的存世量也极为稀少。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毛瓷的搜求者日众。1996年12月，北京太平洋国际拍卖公司将征集到的80余件“7501”瓷首次公开拍卖。散落民间的主席用瓷，逐渐被投资者和收藏者挖掘出来。

有论者评价，毛瓷代表了中国当代陶瓷史最高的工艺水平。此后，多次有人想复制毛瓷的辉煌，醴陵和景德镇都曾举办过再造毛瓷的活动。比如鲜为人知的是，1978年景德镇陶研所还曾接到为华国锋制作专用瓷的任务。但当时因人员的调离，材料、手法和工艺都与此前存在着差异。而此后种种“复原”的毛瓷，很难与原物媲美齐肩。一项政治任务造就瓷中精品的时代，大概也一去不复返了。

认认真真探讨真问题

作 者:小熊

《民国思潮读本》共4册

田晓青 编

作家出版社 2013年6月

《民国思潮读本》是民国时期思想界著名人士的著名篇章的汇集，文章涉及哲学、政治、科学、文化、教育、经济、宗教等各个方面。不但是宝贵的史料文集，还对于今天之中国有着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老资料，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20世纪初，中国的国家声誉跌到了历史谷底，从这时起中国人开始了“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艰难之路。这条路要怎样走，有识之士们搞出了很多主义和思想，又形成了不同的思潮，各种思潮在碰撞中发展，从而产生了许多论战，乃至于口水战。值得庆幸的是，那时的中国人还有这样的自信，就是“认认真真地探讨真问题，并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一场场辩论，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上半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告一段落。这告一段落并不是讨论出了结果，而是现实政治最后一锤定音——走苏俄的路。

回首晚清，当那个有两千多年根基的老大帝国尚有一丝希望时，人们围绕他的死活展开讨论，改良与革命、宪政与共和，新思想层出不穷。虽然“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但人们热衷于如何挽救帝国。当辛亥革命葬送了维持君主制最后的希望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新文化运动又接踵而至。为了维护传统，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抬出孔子，进而又主张国粹。当孔子遭遇共和，当专制者碰上了科学精神与西方哲学，中国知识界已经无法淡定。直到胡适提出“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寄希望于一揽子解决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冷静一下，继续认真探讨中国的问题。而“问题”和“主义”，又成为日后中国思想界最大的难题。

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兴起，使得中国人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新的力量和思潮使中国的青年人集体向左转；同时，如丁文江、胡适这帮老人家们则沿着解决“问题”的思路开始试验“好人政府”下的改良主义，结果被现实政治所挫败。当时，中国的现实政治，一言概之就是军阀割据，这种政治现实催生出了“联邦主

义”，知识分子不得不去因人设事，在现实政治中勾画未来的图景，硬是把军阀混战说成是美利坚的雏形。失望的人们一面整理国故，一面去反基督教。直到迎来了国民革命和紧随其后的国民党意识形态、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

30年代的知识界，被现实政治逼得异彩纷呈。有的鼓起勇气与国民党意识形态论战；有的则跑去做些解放妇女、乡村教育的NGO事业；要么去研究一些社会学、搞一搞文化和艺术。胸怀大志者有两类：法西斯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前者学习希特勒，要富国强兵（30年代希特勒的名声还没有坏掉）；后者手持美元，说些叫人提不起激情的常识，权当启蒙。当然，拿着卢布的人已经钻进了山沟。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一二·九”运动那一群年轻学生，怀揣新诉求登上历史舞台，不论是“救亡压倒了民主”还是“革命压倒了改良”，新新青年从此把他们的新青年前辈们抛到脑后。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无情的世界大势，要么当小清新，要么投奔一家“主义”，至于“问题”，叫傻瓜去研究吧！

新的中国要走什么样的路？围绕这个问题，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口水战，倒向美帝国主义还是苏联人？是保持中国传统还是全盘西化？文艺是不是要为战争服务？是要民主还是要独裁？训政多久才可以实现宪政？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什么？最终从口水战打成了真刀真枪的战争，在战场上见了分晓。

时过境迁，当苏俄的路逐渐艰难，以至难以前行时，我们又开始了新的研究和讨论。我们的研究和讨论中有新问题，也有不少老问题，而这样的研究和讨论不觉已经近三十年了。回首民国时期，知识界、思想界曾经的种种研究、讨论，乃至于骂战，我们不由感慨起来，“我们今天说的话、今天研究的问题、今天进行的讨论，早已在民国时候，已经有无数人说过，很多话题已经被炒过几轮。”更叫人难以接受的是，民国时候的讨论比我们今天的讨论更深入，文笔更好。这不能不叫人沮丧，迫使我们对20世纪上半叶的各种思潮有一个新的梳理。

青春的浪漫与理想的血痕

作 者:解玺璋

《乾隆的骨头》

（英）威廉姆斯 著

刘积源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5月

1922年，英国 姑娘凯瑟琳来中国寻找生父，但寻父未果，遂寄居在母亲旧友艾顿家。为了破解与艾顿家两兄弟的三角恋情，凯瑟琳走上北伐的战场，在硝烟中做起了一名战地护士……

凯瑟琳的牛津同学俞馥蘡是一位革命者，为了推进中国革命，她嫁给了军阀孙传芳手下的反间谍头目杨怡良，借此为共产国际刺探情报。在逐渐深入的谍战中，俞馥蘡发现自己成了丈夫获取功名的棋子……

近年来坊间流行一种“两头真”的说法，说的便是青年时代追求真理，投身革命，而晚年从自身的切肤之痛中反思革命实践，探索真理的那些老人。英国作家亚当·威廉姆斯的长篇小说《乾隆的骨头》，所讲述的恰恰就是“两头真”的这一头，即青年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身世遭际和心路历程。其中既有诗意的浪漫与激情，也有残酷的斗争与鲜血，以及良知的坍塌与人性的瓦解，这一切又伴随着嗜血的屠杀与贪婪的欲望，构成了那段历史丰富的色调。有时它是悲剧的，有时它又是喜剧的。

小说叙事开始于万里之遥的俄罗斯，十月革命前的某个时刻。战地护士凯瑟琳是英国人，她正随着俄国的军队从战场上撤下来，然而，她从这场战争中获得了生命的意义。在泰晤士河的一条支流上，我们见到了小说中的另一位女主人公俞馥蘡，她现在是牛津大学专攻英语田园诗歌的中国学生，而两年前，她还在北京街头高喊打倒军阀，一年前，她与爱人一起在上海的工厂里组织罢工，并以嫁给一个工人革命者的方式，证明自己对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背叛。两个女人，两条线索，她们相遇、交叉、展开，构成了一幅宏大、壮阔的历史画卷，那些为了各自的理想和信仰而不惜抛洒热血，牺牲生命的青年，是画卷中最打动我们，并启发我们思考的部分。

是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从南到北，从上至下，到处都涌动着激荡人心或令人不安的浪潮，很少有人，尤其是青年人不被裹胁到浪潮中去，不管你的职业、出身、阶级、阶层，几乎没有例外。梁启超说过，只要你还办教育，你就阻挡不住青年人要革命的；学校中多一少年，国民中就多一个立宪党。他们读了书，知道还有更公正的社会制度，更美好的幸福生活，于是就要去追求，为之去奋斗。这大约就是为什么那个时代青年学生更容易成为革命者的原因之一。如果说真有“两头真”的话，那么，这一头的“真”显然带有天真的意味。俞馥夔和她的革命爱人王毅自不待言；而雷明，这个留美学生、银行家的儿子，与他的美国妻子玛莎，对国民革命则抱着一种在地狱门口坦然赴死的真诚，威逼利诱都不为所动；他的妹妹雷兰花，因逃婚而投奔革命，成为鲍罗廷的崇拜者，狂热地呼应革命对她的感召，但是，当她的男友、留英学生苏约翰死于无辜时，她甚至来不及悲伤，因为鲍罗廷走了，她却为了曾与鲍罗廷一起工作过而面临着被砍头的危险，她想起挂在南昌城头被乌鸦啄掉眼睛的那个姑娘的头颅，不寒而栗。

革命的残酷不是革命者逃避革命的理由，反而激发了他的崇高感，鲍罗廷就把革命当作可以治愈伤口的“圣杯”。以至于凯瑟琳的父亲、一个屈从于自己灵魂黑暗面而不得不沦为日本军阀手中一张牌的亨利·曼纳斯，却因为鲍罗廷的一番话，而唤醒了内心的某种情感和良知。不过，小说着力表现的，还是凯瑟琳这个人物。如果说俞馥夔的复杂仅仅表现为她的身份：作为一个农场主的女儿、最初的革命青年，被迫嫁给孙传芳的情报处长，同时身兼第三国际的间谍，却又在上海三次工人起义中，充当中共的情报员，并动员丈夫离开孙传芳，投奔蒋介石；那么，凯瑟琳的复杂就在于她在小说叙事中是不断发展和成长的，并最终承担起对于革命进行理性反思的重任。我不知道这种安排是否和作者的英国身份有关，也许是无意为之吧。但总之，这种反思在强悍的历史逻辑面前却显得软弱无力，在小说的结尾，她和她的父亲曾努力想要挽救一段历史——阻止日本人对张作霖的谋杀。但历史总是以其自身的逻辑义无反顾地向前发展。

当然，这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而并非历史本身，但作者引人入胜的叙事和不可思议的想象力，赋予小说以史诗般的雄浑，它在更高的层面为读者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而这段历史恰恰是被许多历史叙事搞得面目全非了。

一份方便面榜单引发的争论

作 者:南十方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个叫Hans Lienesch的美国胖子，在自己网站上列出了一个“世界十大难吃方便面”的榜单——可别以为这是搞笑，这家伙至少吃过1000种以上品牌的方便面，这在方便面的老家亚洲恐怕也是难寻对手。他的方便面品鉴博客“The Ramen Rater”在欧美享有盛誉，本人更号称方便面品鉴达人。

一个美国人，放着大块烤肉汉堡热狗薯条不吃，去吃不远万里的

亚洲面条，绝对算得上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高尚的人。不过细看这个榜单，中华儿女怕是不太能接受，因为最难吃的前两名，竟然是白家乌鸡山珍粉丝和著名的白家肥肠粉。除此之外，大名鼎鼎的新竹米粉也中了枪。

乌鸡粉丝倒也罢了，白家肥肠粉这等德高望重的粉界宗师，岂容如此羞辱？也难怪白家食品公司发声明表示“完全不认可，不接受”，并称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社会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东方饮食文化的无知和傲慢”。而新竹米粉业者也嗤之以鼻：自家产品热销十几年，位列新竹十大伴手礼之列，常有消费者一买就是5箱、10箱，好不好吃自有公断。

帽子扣这么大虽有些反应过激，不过两岸同胞同仇敌忾，倒也是彰显了血浓于水的亲情。此外，在中国人看来，米粉和面条，哪怕是带“方便”俩字，也绝对是两个世界的物种。老美口味有异倒也忍了，将米粉归到面条队伍里，则绝对是犯了大忌。也难怪看到这个新闻后，有网友正色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面条自光武帝昆阳之战便古已有之，米线何德何能与面条相提并论？

面条历史悠久自不待言，青海省民和县喇家遗址出土的那碗面条已经有4000多岁，相比之下，米粉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的确是晚了上千年。但比起美利坚合众国的黄口小儿，资格还是老了太多。目前已知关于米粉的最早记载，是在一本大约作于南北朝时期、名为《食次》的书上：“用林稻米，绢罗之。蜜和水，水蜜中半，以和米屑。作竹勺，容一升许，其下节，概作孔。竹勺中下沥五升挡里，膏脂煮之。”这段话不难理解，就是把米磨成浆，灌入底部钻有孔的竹勺，漏入锅中煮熟，这至今仍是米粉的主流加工工艺。

细细算来，米粉起码也有1500多岁高龄。在古代中原文明一向占据主流，吃面条貌似是名门正派。不过近代以降，南方人逐渐占据了政治经济文化高地，饮食更是全面抢班夺权，不但面条、馒头抬不起头，北方菜代表鲁菜也是日渐低迷。放眼全国，无论是稻米产量还是吃米的人，恐怕都要多过小麦，米粉也就堂而皇之地在全国攻城略地。不需细数，就有桂林米粉、常德米粉、南昌米粉、过桥米线、绵阳米粉、兴化米粉、新竹米粉等等旗号，甚至不产米粉、以拉条子著称的新疆，都开发出一款小有名气的炒粉来。

而且这粉和粉之间，还有不同的粉丝拥趸，除了“面条VS米粉”的南北之争打得不可开交外，谁是米粉界的正宗同样杀得天昏地暗，吃圆的还是吃扁的？要清汤还是干拌？都是涉及“国本”的重大议题。

不过讲句公道话，因为加工工艺和保存条件的原因，米粉是种地域性很强的食物，除干米粉外传播半径并不很大，而谁都会觉得自家的孩子最漂亮，以中国的内战内行的特质，吵起来并不意外。但要从市场占有率来说特别是在不产米粉的北方，那么桂林米粉还是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过桥米线勉强能排在老二，除此之外，其他米粉尽管味道都够精彩，但还很难具备走出本土的实力和规模。

桂林米粉何以爆得大名，咱们改日再叙。

赵丹谢幕

作 者:丁东

赵

丹是上个世纪中国最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他17岁登上银幕，22岁以《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一举成名。民国年间颠沛流离，蒙冤入狱五年，还是演出了20多部影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头衔不少，但表演生涯却坎坎坷坷。他主演的《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先后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不得不违心检讨。好在《李时珍》、《聂耳》、《林则徐》等作品得到了朝野的一致认可。60年代，他精心准备扮演鲁迅，剧组阵容相当豪华，陈白尘编剧，夏衍顾问，于是之、于蓝参演，但赶上倡导“大写十三年”，成立好的剧组又被解散。50岁时出演《烈火中永生》后，竟再无机会在银幕上亮相。

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请他在《大河奔流》饰周恩来，他已年逾花甲，却无比兴奋，剃掉鬓角，装了两只假槽牙，将塑料人中贴在上唇，一切准备就绪，厂长汪洋却无奈地通知他：“上边说，你演周总理不适合。”气得他和夫人黄宗英一起到文化部，找到部长黄镇评理。黄宗英说：“黄部长，你派人把赵丹逮捕了吧，人不能不明不白地活着。”赵丹也说：“我演了一辈子戏，还从来没让人把我换下来过！”但黄镇也表示无奈。几天后，赵丹被查出胰腺癌晚期，已经扩散。

赵丹住进医院，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亲赴病房看望，握手劝慰：“既来之，则安之。要好好养病，心情要开朗。”其他领导人也前来探视，病房里摆满了鲜花和花篮。电影局局长陈荒煤问赵丹有什么要求。赵丹说：“有些话想和乔木谈。”陈荒煤答应：“我来联系。”

赵丹自知来日无多，回顾生平，感到自己的遭遇，不只是个人委曲，而是国家文化体制的弊端。他认真地准备了谈话内容，让黄宗英帮助记录下来。

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贺敬之陪同下，来到赵丹的病房。赵丹已经无力讲话。黄宗英对胡乔木说：“《人民日报》文艺版专栏讨论电影问题。阿丹有话要说。他很弱，由我代说，有不对的，他来补充改正。”

胡乔木说："有什么说什么，我洗耳恭听。"

黄宗英转达了赵丹的三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党对文艺的领导问题。对具体的文艺创作，党究竟怎样来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的制订，领导工业、农业制度的制订和贯彻执行，但党不会领导怎样种田、怎样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所以，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管得最具体，连身上一块布丁、一根腰带都要管，管得八亿人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给我们以教训吗？

第二个问题，给领导者以欣赏艺术的自由。电影和话剧的审查排演，咱们别"麻秆打狼两头害怕"。台上怕，台下更怕，该笑的地方不敢笑，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生怕表错了态。其他领导也瞄着第一领导，简直活受罪。生怕把毒草夸成鲜花，上台来握手，只说辛苦了，不敢说好也不敢说孬。建议取消审排。领导来看戏，鼓掌也好，拂袖而去也好，都无所谓，有意见，形成文字由文件表达，这样双方都解放了，都诉诸理性了。一个戏，岂止十月怀胎，有时是若干年的积累而成，一摇头就否了，岂不遗憾。

第三个问题，是要重视北京电影厂"创作大师室"的成立和发展。北影成立了"谢铁骊创作室"、"成荫创作室"、"崔嵬创作室"。创作室配备了固定的摄影、录音、美工、剪辑、编剧，以求创作默契，是值得重视的探索。没有默契便没有艺术嘛。

胡乔木说："很难得，赵丹在重病期间还思考问题，不简单。宗英整理出文字吧。"

胡乔木一走，黄宗英立即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文艺版负责人袁鹰。袁鹰取走了赵丹署名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两天后见报。文中说："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

又过了两天，1980年10月10日午夜，赵丹与世长辞。

赵丹临终前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文学艺术家说，赵丹道出了自己的心声，点中了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症结。但高层也有人不高兴，说："有个演员临死还放个屁。"

钱荒转眼成钱涝

作 者:雪珥

1903

年6月，为了应对京畿地区战乱之后的“钱荒”，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紧急恢复了直隶银元局，铸造铜元。

1100万枚崭新的铜元，投放到了市场上。这是天子脚下第一批机器铸造的铜币，对于已经濒于崩溃的天津金融流通，仿佛久旱之后的甘霖，配合其他救市措施，开始迅速有效地令天津的市面稳定下来。

因为制钱的长期匮乏，机铸铜元刚一推出，其市场价值就超过面值——官定兑换价是1银元换100铜元，而不少地方都只能换到88-95枚，铜元升值幅度达到5%-15%。铜元的流行与坚挺，拉低了物价，对主要使用小额货币的普通百姓大有裨益，因此，仅天津一地，“合津街市无不遵章周流铜元”。而使用大额货币白银的商家，也没吃亏，商贸的顺畅及物价的稳定，令他们获得了更大的“维稳红利”。

铜元救市，并非始于袁世凯，而是李鸿章。1900年，李鸿章南下出任两广总督。两广正面临经济危机，李鸿章到任后，一方面通过严打，整顿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则报请中央，开始用机器铸造铜元，以缓解市面上的钱荒，拉低银价。大清国的第一批机铸铜元，就此上市。继广东之后，福建、江苏也跟进用机器铸造铜元，因其品质优、成本低，中央在1902年2月下令“沿江沿海各督抚筹款仿办，即就各该省搭铸通行。”这不仅给铜元发放了通行证，而且也将造币的权力赋予了各省——事后证明，这造成了金融领域的各自为政，加剧了全国的金融混乱和各省的离心倾向。

对于负责铸币的地方政府来说，更大的吸引力在于，铸造铜元本身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垄断生意。铜元是一种名义货币，其实际价值远低于币面价值，以面值“当十”的为主——即1枚铜元相当10枚老式制钱，1两白银的官方牌价是100枚“当十”铜元。最初，铸造铜元的原料，来自回收的制钱，而机铸1枚“当十”铜元，只需要熔化3.7枚制钱，其价值却等同于10枚制钱，这就意味着官方铸币可以获得至少63%左右的毛利。

仅袁世凯的直隶银元局，从1902年到1907年的4年多时间内，铸造的各种铜元，其面值相当于68000万枚“当十”铜元，铸币获利193

万两白银。这批利润中的128万两，被袁世凯用于军警建设和军械购置，62万两则用于开办实业、推广教育等新政。

大利当前，各地纷纷上马铸币项目。到1910年，全国自铸铜元的省份达到19个省，超过当时70%以上的省级行政区划。有的省甚至设了多家铸币厂，最夸张的属江苏，共有7家铸币厂。

1905年，铸币“大跃进”达到了顶点，全国共有铸币机846台，如果全部开工，每年可熔铸铜块1.87万吨，可生产铜元16.431亿枚，4亿中国人人均40枚。

这样的疯狂，开始引发了雪崩。据梁启超《滥铸铜元小史》统计，这年的铜元兑银元汇率，从六月间的1元银元兑换96枚，跌到了年底的107枚，这意味着铜元的面值贬值了10%左右。随后一路狂跌，到1910年则达到了175-180枚，铜元面值贬值高达80%。物价因此飞涨，民生凋敝，重演了1902-1903年的“贴水风潮”惨剧。

这一史称“铜元危机”的金融风暴，因铜元的失控现象遍及全国，其规模和危害远较“贴水风潮”为甚，不仅造成经济萧条，更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央与地方的隔阂与矛盾日益尖锐。

中央试图整顿，在这年下令将各省的造币厂统一收归中央，以直隶银元局为基础，成立户部造币总厂，各省的局厂一律改为户部造币分厂，废除各省原有的铸币旧模。但是，地方政府推行新政以来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铸造铜元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支柱产业，中央的整顿最后仅仅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的造币厂，实际上依然是各自为政。

当时大多数官员都认为，铜元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的过度供应。铜元停铸的确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各地政府的财政与铸币产业挂钩过于紧密，各地督抚群起对抗，从四川开始，不少省份都提出了种种理由，中央无奈之下只好同意开口子，结果口子越开越多，铜元停铸半途而废。

其实，铜元危机的实质并不在于货币供应过剩，而是货币供应地域分布不均。银两、银元，制钱、铜元，同时流通，看似中央集权的大清国，却根本没有一个大一统的货币度量衡。

铜元危机的背后，其实是币制危机，币制危机的背后，其实是政治危机……

孙中山和征地拆迁

作 者:李开周

孙

中山先生提出了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里有一条民生主义，民生主义要求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又包含两个要点：一是“涨价归公”，二是“照价收买”。

什么叫涨价归公？什么叫照价收买？

譬如说您炒一块地，买的时候一千万，现在涨到了两千万，您转手卖掉，能挣一千万，按照孙中山先生的理论，您至少得交给政府八百万，然后政府把这八百万投入到教育、铁路、市政或者国防上去。换言之，土地溢价不能让一个人独吞，应该拿出一部分让全民分享，这就叫涨价归公。

再譬如说您住着一套房，市值一百万，现在政府搞拆迁，让您搬出去，它得补给您一套一模一样的房子，如果不补房子，那就得补一百多万元（房屋市值加搬家费）。也就是说，政府在拆迁或者征用私人产业的时候，必须公平合理，必须像一个地位对等的买家，必须走市场路线，“不能让人民吃亏”（川系军阀刘湘的名言），这就叫照价收买。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讲三民主义，平均地权是肯定要讲到的，但是要点往往讲错，以为平均地权就是让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就是要搞土改。其实平均地权不光在农村平均，也在城里平均，不光平均土地分配，还要平均住房供应。怎么平均？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两个要点：涨价归公，照价收买。

只要涨价归公，用不着打击，开发商不会再捂地，投机者不会再炒房，房价地价绝对不会上涨得那么快，快得像最近十几年这样，让绝大多数购房者措手不及。

只要照价收买，用不着做思想工作，用不着搞连坐，用不着放野火，用不着动用武警包围社区，用不着雇用黑帮殴打村民，大多数拆迁户都会主动搬迁，根本不可能涌现那么多钉子户，群体事件会销声匿迹，大规模上访会减少九成，“维稳”和“截访”之类有中国特色的词儿会在不远的将来变成古汉语。

所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虽然陈旧，里面仍有符合时代需要的部分，像涨价归公和照价收买这两条，如果能在今天实施，对咱们老百姓应该很有利，对构建和谐社会应该很有用。

当然，今天实施起来，肯定会有很大阻力——涨价归公还容易些（目前北京地区实施的住房调控政策已经在试行涨价归公），要是真的照价收买，地方政府征收农民土地的时候不再享受巨大价差，土地财政等于破产，你让领导们指什么花钱呢？

事实上即使在民国，照价收买也只是留在纸面上的空想。

举个最典型的事例。1928年南京市拓宽中山路，在长达12公里的狭长地带征收土地700亩，南京市政府草拟补偿标准，每平方丈最高补偿22元（银元，下同），最低补偿6元。而那时候中山路两旁的土地每平方丈最低成交价是50元，补偿比市价低了好些。

主持征地的主管领导是南京市长，名叫刘纪文，他是宋美龄的前男友，心狠手辣，很有“魄力”。被征地的老百姓群情激昂，去内政部诉愿（现在叫上访），刘纪文坚持按照原定补偿方案强征土地。中山路两旁有一些临时搭建的简易房，有的是商铺，有的是难民窝棚，全被刘纪文当成违章建筑给拆了，不给一分钱补偿。

失去土地的百姓和失去房屋的难民串联起来，聚集到南京下关广场，先是静坐示威，然后进城游行，媒体也来助威，一些报纸把民众抗议的新闻印成号外免费发送。刘纪文派军警镇压，逮捕了几个人。第二天，南京农协会、南京商民协会、安徽同乡会（中山路两旁居住的主要是安徽人）和码头总工会等社会团体联合公告，宣布罢工罢市，以此抗议市政府的野蛮行为。刘纪文不得已提高了补偿标准，事态才平息下来。

可是拆完房子征完土地之后，南京市政府翻脸不认账，一是减半发放，二是拖欠补偿，直到1933年，才把经过七折八扣所剩无几的补偿金发放下去，而这时候中山路两旁的土地已经涨到每平方丈300元了。

在民国时代，“名”和“实”是分离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我们不能通过它的宪法来分辨这个国家是否民主，也不能通过它的法律来判断那个时代是否美好。民国教育相对独立，学术相对自由，出了很多大师级人物，但它决不是美好的时代，不说战火连绵殃及百姓、土匪横行危害治安，单是不能落实“照价收买”这一条，就让我对它心灰意冷。

三大金融泡沫事件的真相

作 者:王巍

每遇金融危机，传媒界就喜欢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三次金融泡沫事件来教育公众：荷兰的郁金香炒作、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泡沫、英国的南海公司泡沫。三大事件在教科书和传媒中都被归结为少数骗子做局，政府监管不力，大众疯狂跟进，结果人财两空，经济遭到破坏而造成金融与社会的悲剧。

1635—1637年间的郁金香泡沫事件，发生在当时的海上强国荷兰。早年间，土耳其人从天山山脉将郁金香花种带入君士坦丁堡，使郁金香进入宫廷，成为东方时尚。后来的德国植物学家进行人工栽培，发现病毒突变会导致郁金香球根有美丽的变种。

到17世纪初期，郁金香中的一些珍品已经卖到了不同寻常的高价，富人们竞相在他们的花园中展示最新和最稀有的品种，植物爱好者和商业新贵们以培育不同变种花朵为荣。到17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一时尚导致了一场经典的投机热，人们购买郁金香已经不再是为了观赏，而是希望牟取暴利。

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内专门为郁金香开设了固定的交易市场。当时一名历史学家描述：“1636年，一棵价值3000荷兰盾的郁金香可以交换8头肥猪、4头肥公牛、2吨奶油、1000磅乳酪、一个银质杯子、一包衣服、一张附有床垫的床外加一条船。”许多郁金香品种在一年内价格上升百倍，进一步刺激了市场需求。

1637年2月4日，卖方突然大量抛售郁金香，公众开始陷入恐慌，郁金香市场一夜之间崩溃。虽然荷兰政府发出紧急声明，认为郁金香球茎价格无理由下跌，劝告市民停止抛售，并试图以合同价格的10%来了结所有的合同，但这些努力毫无用处。一星期后，郁金香的价格已平均下跌了90%，而那些普通的品种甚至卖不到一个洋葱的价钱。绝望之中，人们纷纷拥向法院，希望能够借助法律的力量挽回损失。但在1637年4月，荷兰政府决定终止所有合同，禁止投机式的郁金香交易，这次事件不了了之。

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泡沫则是由著名的金融家约翰·劳一手造成的。约翰·劳（1671—1729年）是苏格兰经济学家，父亲是银行家，拥有大量地产。劳14岁就跟着家族从事金融业务，父亲去世后，他去

伦敦冒险，在赌博中损失巨大。后来，劳在为女人的决斗中打死对手，被对方家族纠缠，不得不跑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客居避祸。

法国路易十四去世后，国库空虚，情急之下，法国摄政王腓力二世邀请劳担任法国财政大臣。约翰·劳在法国成立了一家银行，名字叫作“通用银行”。这家银行除了像荷兰银行那样开展储蓄与贷款业务之外，还有一项独特的功能，那就是发行货币。法国的货币体制在约翰·劳的改革下，从贵金属货币时代瞬间过渡到了纸币时代，政府规定纸币为法定流通货币，整个国家开始流通以“里弗尔”为单位的纸币。

几年后，当约翰·劳的通用银行给政府带来了大量利益，法国政府当仁不让地吞并了它，但仍聘约翰·劳为银行管理人，这让约翰·劳感到了鸟尽弓藏的悲哀，他不甘心就此结束，于是他将大量精力投放在了他一年前成立的那家公司身上，即“密西西比公司”。

法国政府在这家公司成立之初，便给予了其许多特权，允许其对许多种类和地域的贸易进行垄断。而这一年，法国政府一方面是为了安慰约翰·劳，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决定将东印度一带的贸易交一部分给密西西比公司打理。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股票不同的是，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存在着一个非常特殊的交易模式，那就是国债债券可以用来直接购买公司的等值股票，而当时500里弗尔的国债债券在市场上只能兑换到大约150里弗尔，但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却由于其在贸易上的不断扩张而在不停地升值，这个时候，几乎所有持有国债债券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走进了交易所，将自己的债券兑换成了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然后如释重负地坐等股价上涨。

由于市场上的买气越来越旺，股票价格一时间水涨船高，渐渐地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投机游戏，玩法如下：

A君以150里弗尔的价格从相对偏远、信息闭塞的地区购买到500里弗尔的国债债券，然后去交易所将它兑换成价值500里弗尔的密西西比公司股票，再将股票卖掉，即使股票没有上涨，A君也能够从中得利350里弗尔。

这种投机行为在法国迅速弥漫，全法国的人都知道了国债债券可以用来买一种股票，而这种股票可以升值并兑现，于是国债投机戛然而止，民间持有的国债数量大幅缩减，密西西比公司则成为了法国国内最大的债权人，而约翰·劳，他同时又是法国皇家银行的管理人，掌握着货币发行的大权。

在各方的炒作下，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市值不断上升，而约翰·劳

为了满足市场，亦不断增发新股。往复循环之下，使公司股票最终上升到了一个可怕的高度，每股价格达到了9000里弗尔。这时候，约翰·劳为了再次推动股价上涨，居然决定增发货币，这件事情让约翰·劳在后来的日子里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他做出任何决定，结果都不会改变。

毫无悬念的，泡沫破灭了，境况同近一个世纪前的荷兰没有太大分别，同样是哀鸿遍野，所到之处阴风惨惨，交易所挂牌歇业。不同的是连银行也被强行关闭了。

与郁金香事件有所不同的是，这不仅仅是一次纯粹意义上的交易市场大崩盘，更是一次货币体系大崩溃。法国的股票市值从1719年5月开始持续暴涨，到了1720年的5月，涨幅与13个月前相比约高20倍，同月开始下跌，持续狂跌13个月，最终股价只有大约13个月前的5%。

与之类似的南海公司泡沫则是基于英国政府的国策制造出来的。与法国处于同样的困境，英国政府无力承担西班牙王位继承引起的战争导致的巨额借款，于是采用了国家垄断经营来支付政府债务的方式。英国财政大臣哈利建立了南海公司，垄断了南美洲和太平洋群岛的贸易和商业经营。

南海公司仿效法国密西西比公司的模式，发行巨额的南海公司股票收购政府国债。他们认为这样做一来政府可降低利息支出，二来公司可用注水股票换取收入稳定的国债。英国国王乔治一世和二世相继担任南海公司的总裁。事实上，南海公司基本没有多少业务，只有几艘船而已。公众投资和追捧这个公司主要是基于它的垄断经营权、政府信用和对未来的预期。政府官员和内部关联人彼此交易股票也大大刺激了股价的飙升。

在南海公司股票的诱惑下，全英所有股份公司的股票都成了投机对象。人们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们不在乎这些公司的经营范围、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只相信发起人说他们的公司如何能获取巨大利润，股票价格平均涨幅超过5倍。大科学家牛顿在事后不得不感叹：“我能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如此疯狂。”

1720年，南海公司的股票从128英镑升到1000英镑。同时，也出现了大量模仿南海概念的各种公司，一些不法商人和骗子公司乘机浑水摸鱼。1720年6月，为了制止各类“泡沫公司”的膨胀，始作俑者英国政府通过了《泡沫法案》，许多公司被解散，公众开始清醒过来，对一些公司的怀疑也逐渐扩展到南海公司身上。从7月份开始，首先

是外国投资者抛售南海股票，国内投资者纷纷跟进，南海股价很快一落千丈，9月份跌至每股175英镑，12月份跌到124英镑。南海泡沫破灭后，国王不得不取消度假，回国主政。国会建立调查委员会，抓捕了财政大臣等几十个高官，没收资产，对股东进行偿还。

今天看来，所谓的三大泡沫事件中，郁金香只是一个商品品种的炒作，在影响力上远远不及其他二者，只是道德说教的案例，将其提升到金融层面实在风马牛不相及，此类事件以后也层出不穷。当代中国也有君子兰炒作和蚂蚁以及树苗炒作等类似事件。

密西西比公司和南海公司是政府直接操盘的运作，应该是一种超越环境的粗糙的金融创新，是初步理解了货币实质和市场交易机制后的政府债务重组安排。特别是约翰·劳，更是早期凯恩斯主义者，通过政府经营来刺激需求。不过这些救急措施在国王和贵族的贪婪与垄断权力操作下成为了掠夺民众的手段。因此，这不是骗子做局、大众跟风的泡沫事件，而是政府操控的利用垄断和权力进行的赤裸裸掠夺。

（摘自《金融可以颠覆历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金日成曾派近卫军护送西哈努克回国登位

作 者:车仁宇

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与许多中国领导人交情颇深，而同时，他与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也相交甚笃。为了西哈努克，金日成不但在平壤附近建造了一座行宫，还顶着苏联的压力拒不承认越南扶植的柬埔寨傀儡政府，豪华行宫导弹戍卫。

西哈努克与金日成的友谊始于1965 年，当时两人都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参加不结盟峰会。在印尼总统苏加诺的介绍下，两人一见如故。西哈努克很快就打消了承认韩国政府的念头，为此金日成大为高兴。1970 年朗诺乘西哈努克出国访问时发动政变，西哈努克被迫流亡中国。朝鲜则拒绝承认朗诺政府，奉西哈努克领导的反对派为柬埔寨的合法代表。

金日成还热情邀请西哈努克来朝鲜居住。为此，金日成派出一个营的士兵，在平壤以北的万寿湖畔建立了一座"行宫"，名为万寿宫。这座行宫距离平壤约1 小时的车程，朝鲜式的屋顶，天花板上缀满枝形吊灯，总共有60 间房屋。行宫的中心部位是一个巨大的球场，其他内部装修全都仿照金日成自己的住所。考虑周到的金日成还在行宫内修建了佛教寺庙。

1974 年，经过近一年的施工，"万寿宫"建造完毕。第二年，由于红色高棉占领金边，西哈努克回国担任国家元首。值得指出的是，西哈努克之所以同意与红色高棉合作，金日成的劝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西哈努克与红色高棉的关系很快恶化。1979年，伴随着越军入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政权，西哈努克再度寻求老朋友——毛泽东和金日成的帮助。万寿宫又一次有人居住了。

从1979 年到1991 年期间，西哈努克每年要在万寿宫住上两个月。金日成挑选出精锐保镖为西哈努克提供安全保证。

西哈努克在朝鲜显然过得非常愉快。 除了起草声明、写书、发表演讲和接受采访外，他还打羽毛球、拍摄电影（这是西哈努克一生的爱好）。还有大量法国美酒和美食经中国运抵朝鲜，供他享用。

金日成一方面让西哈努克在朝鲜过得舒心，另一方面顶住莫斯科方面施加的巨大压力，拒绝承认越南扶植起来的韩桑林傀儡政权。

1993年，西哈努克返回金边，被柬埔寨各方一致拥戴为元首。金日成派出25 名贴身武装护卫人员护送西哈努克回国。西哈努克对此感激异常，1994年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他说："我被我自己的皇家卫队推翻了（指1970年朗诺发动的军事政变），但却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25个公民更好地保护起来。"

西哈努克为了报答金日成的关照，于上世纪90 年代后期（此时金日成已经逝世，金正日与西哈努克的关系也很好）与朝鲜一道建立了一家航运公司，使得一些朝鲜货船可以打着柬埔寨的旗帜在海上活动，这对于长期遭受经济制裁的朝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家名为"柬埔寨航运集团（CSC）"的航运公司的负责人，是西哈努克长女的丈夫——万迪。

CSC的一些举动逐渐引起西方的注意。2002 年，法国海军截获了一艘悬挂柬埔寨旗帜的朝鲜货船，并宣称在船上搜出违禁物品。不久，西班牙海军在阿拉伯海截获了另一艘悬挂柬埔寨旗帜的朝鲜货船，上面载有15枚飞毛腿导弹以及23 辆坦克等货物，这批军火据说是运往也门的。西方为此向柬埔寨施加了压力，柬政府被迫下令关闭CSC。

（摘自《上海译报》）

杜甫为什么屡考不中

作 者:赵柒斤



今天的高考和古代的科举考试都可称得上是国家的“抢才大战”。可为什么流芳百世、被人誉为“诗圣”的杜甫终身都没考取呢？想想他年轻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难道仅为被奸相李林甫的一次“罢免”而气馁吗？

以我个人从现代人生理和心理等方面分析，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杜甫“生不逢时”。众所周知，自大禹传位给儿子后，中国开始了世袭制。在那个“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只能打洞”的时代，一直延续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谁的门第高、谁接班、谁当官，真正是“拼爹”。

隋文帝采用科举考试取代世袭制，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唐朝便继承下来。而科举用人凭的是知识水平，不分贫富，只要进士及第，国家皆包分配，保证其荣华富贵。杜甫生于大唐，其祖父杜审言不仅是进士出身，而且做过部级高官。如果杜甫的祖父早出生 几百年，杜甫不用考也能弄个高官做。

其二，杜甫的“心理承受能力”差。用今天的话讲，他是需要进行“心理干预”的学生。史书上说，古代科举考试期间，国家和地方政府都积极为考生优化环境。各省官员为了保证考生们按期赴试不误行程，普遍实施了“应试学生过境，不得为难和阻碍通过”等硬措施，这充分体现了古代社会对应试士子的体恤与关 怀。特别是朝廷“非家境贫寒、万不得已的考生不得私带货物”规定的执行走样（地方官员对考生私带货物一般都装聋作哑，默许其通过），更能说明古代“选拔人才”采取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并不见得就比今天的少。再说杜甫还是“老部级高官”的孙子，多少会有一些人脉，被“免考”的可能性不大。由此推理，杜甫极有可能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差。他平时学习成绩再好，但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进了考场也只能是“茶壶里的饺子”。

也有人将杜甫屡考屡败归咎于遭受政治迫害和不善经营人脉关系。但从他那首“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们，暮随肥马尘。残怀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诗中，可以发现杜甫毫不隐讳科场的艰难和无自尊的经历，诗中也明白无误地说，自己要去求施舍，求了施舍还得去拜见官员……还有一事更能说明杜甫并非“木头疙瘩”，他献过吹捧皇帝的“三大礼赋”，讨了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也就一个有职无权的参谋。后来，他投靠实力派——剑南节度使严武，经严武推荐， 朝廷封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好在这个“校检”，使他享受到了“副部（省）级待遇”，以至于后人误以为杜甫真做过工部尚书或工部副尚书似的，把他的诗集编为 《杜工部集》。这些史实足以说明杜甫屡次考试的成绩都很不理想，原因就是他“不经考”。

其三，杜甫的“包袱”重。祖父的“进士”身份是硬考取的，有了这个平台，他才一步步朝“京官”迈进，并取得了成功。可以说，杜甫的祖父是通过自身努力接触到权力核心并成为其中的一员的。这对颇具才华和远大抱负的杜甫也构成了无形压力。如此一来，走进考场的杜甫与其他考生相比，又多了一重压力。

现在看来，杜甫不仅“很忙”，而且运气也背。但换个角度看，如果中举迈上仕途，没有穷困潦倒的经历，很可能就不会有“诗圣”了……

（摘自《北京晚报》）

题库

TA在40年来获得了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在内的超过一百项奖项，1983年和1985年，曾先后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国际奖和第三世界社会经济研究基金会颁发的“第三世界奖”。

“事实上，自春秋战国以来，人们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态度，就像‘翻烙饼’，批孔与尊孔总是交替出现……还孔子以本来面目……难度真不小。”这反映了历史（ ）

A.仅仅是不可重演的过去

B.只是史籍记载的过去

C.是古人与“今人”的对话及其沟通过程

D.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发展过程

1978年，随州曾侯乙古墓出土的完整编钟，震惊了世界。2013年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葬群二期发掘工作不断推进，一组编钟于7月4日下午已露出大半。专家现场观察称，从目前已发掘的情况看，编钟数量确定为5个，钟身保持完好。叶家山古墓，比曾侯乙墓早了500年，有专家认为，叶家山编钟的出土，或将再次改写世界（ ）

A.音乐史 B.雕塑史 C.戏剧史 D.科技史

民国时期的打油诗“无媒婚嫁始文明，奠雁牵羊礼更早。最爱万人齐着眼，看侬亲手挽郎行”赞颂的内容不包括（ ）

A.追求自主婚姻 B.体现自由文明

C.提倡男女平等 D.简化婚礼仪式

北宋大儒张载是理学创始人之一，他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这句话的理解不正确的是（ ）

A.体现了学者匡时济世的理想追求

B.反映了理学以继承儒学正统为己任

C.理学家具有反对君主专制的要求

D.说明理学思想有利于稳固统治秩序

时人在描绘英商宝顺洋行买办徐润的私家花园时，称“园小而曲折，然楼阁、几案（家具）皆有夷气。”这里的“夷气”主要是指（ ）

A.陈设带有西洋风格 B.多由外国富商居住

C.园中皆为日式家具 D.少数民族建筑特色

下列国家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先后顺序是（ ）

A.苏联、印度、美国、日本

B.印度、苏联、美国、日本

C.苏联、印度、日本、美国

D.苏联、日本、美国、印度

1947年，上海五家专门印制钞票的印刷厂一分钟印制1600万元的纸币，日夜赶制仍不能满足需要。后来，国民政府只好发行10万元的大钞。这给民族工业带来的影响是（ ）

A.提供了更多的民族资本

B.使民族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

C.使民族工业遭到了致命打击

D.减轻了官僚资本的压迫

“欧洲结束的地方，就是非洲的开始”。但林达在一本书中写到一国时认为，该国的命运是欧洲还没有结束，非洲就已经开始。欧洲和非洲曾经在此长期僵持和拉锯，他写的这个国家是（ ）

A.希腊 B.西班牙 C.瑞典 D.荷兰

下图是出版于1953年4月的一本连环画的封面，该书讲述了孙家庄农民孙志刚的故事，图中的“社”指的是（ ）

A.农业生产的合作组织

B.公私合营的生产组织

C.人民公社的生产组织

D.包产到组的生产组织

近日，三联书店恢复设立生活书店。总经理樊希安介绍说，生活书店恢复后，将会出版面向更广泛大众的文艺、实用图书。未来还计划恢复读书出版社与新知书店。 1932年7月，以《生活》书报代办部为基础在上海创立了生活书店，书店从成立到抗日战争前夕的5年中出版了大量期刊和书籍，创办生活书店的是（ ）

A.王云五 B.钱俊瑞

C.薛暮桥 D.邹韬奋

1945年12月，美国关于日本战争赔偿问题的文件规定：拆迁日本的工业设备，并把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维护在20年代后半期的水平，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不高于亚洲的其他国家，1949年美国政府决定大幅降低对日本的赔偿要求，1950年5月停止战争赔偿计划。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出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A.帮助日本恢复经济，推行民主改革

B.“冷战”局面的加剧和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

C.加紧孤立、封锁和威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D.扶植日本，稳定资本主义制度

《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一书中认为：每种外来文化都被采用作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只要外来文化有助于日本进步，就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事实来接受。这种态度造成了“和魂汉才”的观念。“和魂汉才”反映了（ ）

A.日本文明的中国化

B.儒家文明的日本化

C.大河文明的海洋化

D.日本文明的儒家化

1911年，意大利诗人和电影先驱者里乔托卡努杜发表的一篇论著中第一次宣称有种艺术是继建筑、音乐、美术、雕塑、诗歌、舞蹈这六种艺术后的一种新兴艺术，它是把所有这些艺术都加以综合，形成运动中的造型艺术形式。这里“第七艺术”是指（ ）

A.电视 B.电影

C.无线电 D.航天飞机

1954年，美国一个城市管理自来水的专员发现，该市自来水耗费量在某些三分钟的时段内会奇怪地突然增加。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D）

A.当时汽车开始在美国普及，这三分钟刚好是车主集中洗车的时间

B.黑客通过互联网攻击自来水公司的电脑系统，导致数据显示错误

C.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企业管理水平普遍下降，统计数据计算错误

D.当时电视开始在美国普及，这三分钟是广告时间，大家上厕所集中用水

以下成语与哪个历史人物有关：

退避三舍

暗渡陈仓

鞠躬尽瘁

入木三分

题酷答案

TA是：曼德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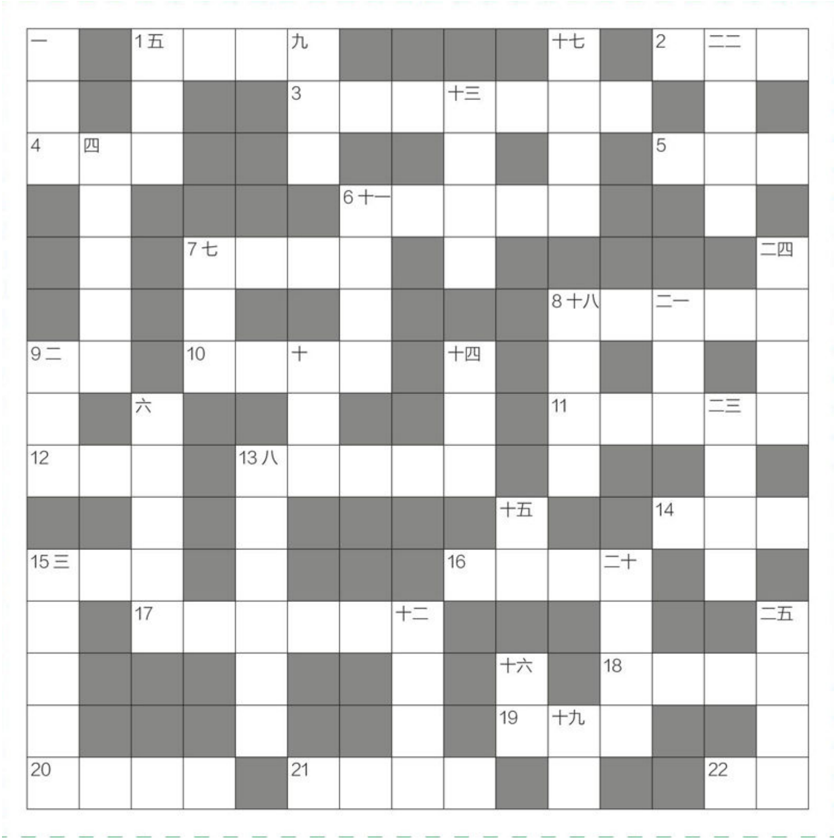
选择题：1、（C）2、（A）3、（C）4、（C）

5、（A）6、（C）7、（C）8、（B）9、（A）

10、（D）11、（D）12、（B）13、（B）

问答题：1.重耳 2.韩信 3.诸葛亮 4.王羲之

填字



横向

1.成语，用来形容形势紧张，一触即发

2.著名的大地主，在“文革”中被塑造为旧社会地主阶级压迫平民阶级的典型代表

3.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一句诗词

4.明长城的东北起点，有“天下第一关”之称

5.当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我们曾经相爱》、《早恋》、《青春梦幻曲》等

6.军队中商议军机大事，说话必负责任的一种说法

7.清廷用来显示其国力强盛、万邦咸服的自称

8.宋太祖通过酒宴，以威胁利诱的方式，要求高级军官们交出兵权的事件

9.左丘明所撰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10.1823年，由时任美国总统提出的一项外交政策，是美国涉外事务的转折点

11.语出古代典籍，指人如果不讲信用，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

12.以少数贵族上层代表为统治者的政体形式

13.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建立的军政府的名称

14.80年代的日本首相，政坛上人称“阿信”

15.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妻子

16.陶渊明描述的一个与世隔绝、未受战乱破坏的理想社会，现用来比喻一种虚幻的超脱社会现实的安乐美好的境界

17.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18.成语，指事物发展到极端，会向相反方向转化

19.清代文学家袁枚撰写的一部记述奇闻异事、奇人鬼怪等的笔记小品

20.成语。形容理由正当充分，措词严正有力

21.古代帝王的自称。后指脱离群众，孤立无助的人

22.在敌对势力或对立派别的内部，秘密鼓动其中的一些人倒戈的做法

纵向

一、身兼唐三镇节度使，安史之乱祸首

二、清末爱国将领，甲午战争中清军高级将领血战沙场壮烈殉国第一人

三、推翻明朝的一次起义

四、清末小说。最著名的吴语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方言小说

五、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集三国文化、蜀道文化、关隘文化等为一体

六、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一，标榜制度分析、结构分析

七、明清两代北京皇城的正门，现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八、曾国藩创办的第一家洋务企业

九、被誉为“当今最负盛名之国画大师”，代表作有《爱痕湖》、《长江万里图》等

十、在展会上由主办方确定以某一国家为主题进行宣传的国家

十一、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的思想

十二、比喻知音难得。后亦比喻言论或作品不通俗，能理解的人很少

十三、成语，依仗暴力，毫无顾忌地干坏事

十四、曾为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后退党。“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十五、为发生的重大新闻和特殊事件而临时编印的报刊

十六、儒家代表人物，有“亚圣”之称

十七、世界上最早的寓言故事集，也是流传最广的寓言故事之一

十八、亚历山大·佩恩自编自导的美国电影，曾获2005年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

十九、位于中印之间的一国家

二十、日本的一部古典文学名著，誉为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

二一、少林寺第30代方丈，最近新闻曝出其床头装有摄像头

二二、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在欧洲发生的思想文化运动

二三、成语，意为向地位比自己低、学识比自己少的人请教，也不感到羞耻

二四、孟德斯鸠最早提出现已被西方广泛运用的权力制衡的思想

二五、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中共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一次运动

书情

开启一扇理解荣格的窗口

《红书》

（瑞士）荣格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7月

《红书》创作于1914年到1930年间，耗费了16年时间，记录了心理分析大师荣格个人的梦境、灵魔与精神追寻历程。他生前拒绝出版，直到其去世后近五十年，方得以出版。

1913年，荣格与弗洛伊德决裂，开始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一度备受幻觉折磨而濒于崩溃。荣格身陷中年危机，重新审视生活。他将一些梦和幻象记录下来，整理成《黑书》，同时着手幻象内容的写作，形成私密之作《红书》。《红书》是荣格日后写作的主要灵感，由此生发出一整套的分析心理学理论。此书的出版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理解荣格著作的窗口。

荣格曾于1957年谈到这本书：“我跟你谈到过那段岁月，追寻内心图像的那些年是我此生最重要的时光。其他一切皆发源于此。这本书就始于那时，在那之后的枝枝节节几乎无关紧要。我的一生都在阐释那些意象，它们从潜意识中迸发，像一条深不可测的河流，在我的内心泛滥，几乎要毁灭我。这些已超出我的一生所能承载”。

《俄罗斯通史》

闻一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年6月

1917年至1991 年，这七十多年苏联史可谓是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苏联史专家闻一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人物、重要事件和焦点问题为主题，从斯大林、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最后的戈尔巴乔夫，条理清晰，给人启迪。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

王巍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3年6月

王巍在筹建国际金融博物馆的过程中，系统地研究和梳理了金融史，再结合自身 30多年金融从业经验，从浩瀚的史料中， 发掘出一些不为人知的金融创新细节故事，如何在历史的纵深中悄然改变历史的进程。

《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

新垣平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年7月

本书以金庸武侠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为前提展开演绎。考察了武术、江湖和门派等在历史上的起源、发展和嬗变，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整理了越女、萧峰、郭靖、张无忌、韦小宝等大量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故事。

《帝制的终结》

杨天石 著

岳麓书社 2013年7月

这是辛亥年在《文史参考》（即本刊）连载过的专栏。转眼两年多过去了，已经没人再谈论辛亥的话题了，但这本书依然是我们重温辛亥的好读本之一。关于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有形”与“无形”的专制主义，杨天石有自己独特的论点和论据。

《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

饶平如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87岁时，饶老先生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妻子美棠去世。那之后半年时间，他无以排遣，只好去他俩曾经去过的地方、结婚的地方，到处坐坐看看，聊以安慰。后来终于决定画下他俩的故事，于是，他一笔

一笔，从美棠童年画起……

《音乐使人自由》

（日）坂本龙一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日本音乐大师坂本龙一的自传。回忆了自己儿时如何初次接触音乐，而后在母亲和老师的影响下逐渐走上音乐道路，他在回忆中检视自己一路走来的经过，对于自己怎样“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做了引人深思的叙述。

《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宋石男 著

中华书局 2013年5月

最近经常听到这句话。这是专栏作家宋石男的文史随笔集，他关注历史上的谣言、打黑、党社、特权、陋规、权力继承、秘密警察、司法迫害、社会控制、刑讯逼供、苦难与尊严等，这些先进社会存在的常识，在古代人那里又是什么样的面貌呢？

《中国有多特殊》

刘擎 著

中信出版社 2013年 6月

中国的确有各种让人无语的特色或者说特殊。我们在平时的聊天和谈论中都泛泛谈到，但基本上也就说说而已。刘擎教授把常识的逻辑与问题意识结合起来。让我们看到一个优秀学者的视野与深度，拉近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可能是我们缺乏这样的认识太久了。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

陈怀宇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 5月

陈寅恪的学术传奇不仅影响中国学界，在世界范围也有辐射。本书通过西文文献，考察了陈寅恪在哈佛、德国的留学历程及其所处的

欧美学术界，他和欧美学者兰曼、白璧德、吕德斯等同辈学者的交往等。本书是陈寅恪研究一个全新的角度。

《爱猫奇洛》

（日）荒木经惟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这是荒木经惟于1990年妻子阳子病故之后出版的一本摄影集。全书收录132幅小猫奇洛的照片，配上荒木手书的随笔，记录他与阳子、奇洛共同生活的日常点滴，这些琐碎、平实的文字与相片呈现了这位摄影大师对爱猫、亡妻以及往昔生活无尽的爱与追思。

学问

冷战期间美对中菲南沙群岛争端的立场

期刊|《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3年第2期 文章|《美国对中菲南沙群岛争端政策的历史考察》

作者|郭永虎（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冷战期间，美国与菲律宾缔结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南沙群岛问题产生了十分消极的负面影响。美国介入中菲南沙群岛争端发端于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能否适用南沙群岛问题。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不久便被纳入美国冷战战略体系之内。为遏制所谓共产主义力量在亚洲的扩张，1951年美国与菲律宾签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生效后近20年其适用范围并未涉及中国南沙群岛地区。

1976年4～7月，菲律宾、瑞典财团和美国“国际石油公司”等在中国南沙群岛礼乐滩开始钻探第一口石油探井，与此同时，菲律宾军队加强了保护措施，增加了海空巡逻。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提出警告：“这种对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侵犯是不能允许的。”为谋求美国的支持，菲律宾请求美国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涵盖包括礼乐滩在内的南沙群岛，并将其与当时正在进行的美菲军事基地谈判挂钩。

1976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对美国在中菲南沙群岛争端中的立场专门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应对措施和建议。他认为，虽然《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要求美国对菲律宾的领土、岛屿或“武装力量、太平洋的公共船只和飞机受到攻击时做出反应”，作为领土“争议”地区，礼乐滩可以解释为不适用于该条约。但是，太平洋上的军队、飞机和船舶可以解释成适用礼乐滩，而美国一直拒绝在礼乐滩采取任何立场。为解决上述问题，他提出了三套选择方案：一是明确地肯定答复，即承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礼乐滩；二是否定答复，即明确将礼乐滩排除在防御义务之外；三是重申对菲律宾承担全部承诺，但对菲律宾在该地区受到的所有攻击是否做出反应不予答复。

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主张倾向于第三套方案并建议：作为公开行动，总统授权可做出模棱两可的答复，即美国愿意考虑将礼乐滩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条件是其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条款相符

合，特别是其中第一条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和克制使用武力”。此举可使美国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以应对如下情况：“当菲律宾的飞机受到攻击时要求美国进行防卫。此举对当前《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的义务既未增加也未减少，从而使我们规避其他选项所带来的风险”。该建议最终得到了福特的批准，成为美国对中菲南沙群岛争端的官方立场。

菲律宾对美国的立场十分不满，1976年10月，菲外长罗慕洛与基辛格在纽约会见时指出，“菲律宾的自我防御计划必须取得进展，计划的可靠性必须得到美国的坚强承诺，以应对外部侵略”。对此，基辛格指出，如果菲律宾将美国拉入南沙群岛，政策方案将复杂化。罗慕洛最终不得不表示，领土“争议”地区可以排除条约义务之外。基辛格进而指出，对于南沙群岛问题，美国政府关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解释问题会遇到麻烦。罗慕洛代表总统马科斯向基辛格保证，菲律宾政府无意使美国卷入南沙群岛问题，因为菲律宾认为可以通过相关各方在互谅的基础上解决，而无需美国的援助。

从美菲在该问题上的交锋来看，很明显美国占了上风，菲律宾一改此前的强硬态度，一方面试图得到美国对南沙群岛的安全承诺，另一方面又表示无需美国卷入，自己能够和平解决。最终，在美国的压力下，菲律宾放弃了将南沙群岛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念头。美国不断重申的“美国在南沙群岛问题上没有立场”的政策声明，成为冷战时期美国的基本立场。

清代官吏频光顾广州花船

期刊|《史林》 2013年第1期 文章|《清代中期的广州花船》

作者|冷东（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教授）张超杰（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研究生）

清代中期，随着广州社会发展及商业繁荣，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娼妓问题。伴随广州城市生活的发展，娼妓业以水乡特色的“花船”最为著名。

“广为水国，人多以舟楫为食。”水乡的特点使广州的社会生活与水有不解之缘，娼妓业也利用了这一特点。清代以来的广州妓院，始终以珠江为纽带，利用其天然风景，开展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经营活动。妓院以花船作为主要营业场所，与商业繁华地区为邻，但有一条明显的界线，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色情消费区域。这种大规模、长时期集中在船上经营的妓院群落，在清代中国城市中是罕见的。乾隆中

叶，仅珠江疍女为娼者，就有七八万人之多。

自古以来，官吏、商人、文人墨客、性饥渴阶层是光顾妓院的主要成员，富裕的十三行商是否光顾花船，尚无明文记载。但清朝官吏光顾花船的记录却比比皆是。虽然按照“清律”，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六十，挟妓饮酒坐罪亦同。但仅从法国人伊凡的眼中，很多清朝官吏不顾禁令，涉足于声色场中，成为光顾花船的主体。“看见豪华的官船是很平常的，它们点着灯笼，垂饰飞舞，驶向前去，接载一船漂亮的姑娘，然后驶走，在坐落于珠江河道旁的某座官邸前卸下他们那迷人的尤物。”“我们多次在‘烟柳巷’那些迷人的花艇前经过，能够对天朝上国那些热衷娱乐的孩子们的腐化生活中一些随意的细节快速一览。登上露台，我们看见一个穿蓝纽扣衣服的官员正坐在桌子旁，桌上的陶瓷托盘里堆满果脯，像金字塔一样。当沉迷于酒色的官员面无表情地吃着他面前的美味时，他对面坐着的年轻女孩正在唱着歌。这个官员从未认为有必要掩饰他的官员身份；他的帽子仍旧装饰着美丽的孔雀羽毛，他的长袍显示着自己的官衔。”“在广州，因娼寮花船触目皆是，以致官员及在衙门办事的幕友、长随、书差等所得的银钱，大半落到她们的腰包之中。”

可见，清朝官吏是花船的主要顾客群。

茶叶药性在近代荷兰引发争议

期刊|《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 文章|《中国茶叶与近代荷兰饮茶习俗》

作者|刘勇（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教授）

17世纪早期，荷兰有关中国和日本的游记或其他出版物都已对茶叶在这两个国家的用途有所记载，并指出茶叶可作为药用，以治疗在荷兰同样存在的精神忧郁、流泪、弱视等各类疾病，有利于人体健康，使民众少病长寿。茶叶的医药特性被许多专业人士高度重视。

茶叶首次由荷印公司商船输入荷兰后不久，医生们就对其产生浓厚兴趣，著名的莱顿大学“解剖室”更是将茶叶当作新奇物种纳入收集品之列。荷兰近代著名医生尼古拉斯·蒂尔普博士，从医学的专业角度极力推荐饮茶。斯蒂文·布兰卡特医生将茶叶描述为 “目前我所知道的最为健康的饮料：将该药草的精良叶片浸泡在热水中，啧啧地饮食12—20杯，这样可以稀释净化我们的血气和体液……”博物学家安东尼·范·列文胡克认为茶叶 “可以向肾输送大量液体而稀释结石”，因此将其视为一种治疗肾结石的有效药物。

最热烈拥护饮茶的人，无疑是被尊称为“茶叶医生”的考内利斯·庞德古。在《有关绝佳药草茶叶的论述》一书中，他详细解释了茶叶的药性，认为人体几乎每一个部位都受到茶叶的积极影响；饮茶不会导致身体极度消瘦，不会引起战栗或跌倒，不会对男女的生育能力造成不良影响，对人的脑、眼、耳、嘴、喉、胃、肠、肾、胸腔、血管、膀胱及气肺等部位都有疗效。关于茶水泡制过程及其使用目的，他不仅给出必要提示，而且在后来出版的小册子《茶叶的用法及滥用》中也做了进一步解释。 庞德古通过一系列相关著作极力宣传饮茶的好处，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茶叶在荷兰逐渐广为人知，并成为受人喜爱的日常饮料。他因而在荷兰赢得了应有的声誉，受到饮茶喜好者的广泛尊敬。

当然，在荷兰绝大多数医生对饮茶持赞成态度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反对论调。19世纪，饮茶有害论开始日渐式微，绝大多数荷兰医生都已清醒地认识到，茶叶含有一定剂量的咖啡因和茶碱，对大脑中枢神经系统有着刺激作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心脏的功能，因此确实对人体机能起到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艺文

红星照耀中国

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档案展

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苏区采访，撰写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此后又有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记者走进红色根据地。档案展共展出300多件珍贵图片、珍藏档案、图书文献和3段珍贵视频，分为探寻红色中国、镜头里的中国革命两大部分，另外还包括中央档案馆珍藏的毛泽东与斯诺、史沫特莱、贝特兰等人关于时局问题的谈话记录；《救国时报》、《解放日报》等刊登的斯诺、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的采访报道；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名单、欢迎海报等展品。

时间：2013.06.28-07.31

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

走向现代

英国美术三百年

展览包括油画、版画、水彩、素描和雕塑等艺术形式，透过英国人、场景观察、自然景观、讲述故事、诗意的想象和现代主义六个单元，首次向中国观众全面展现英国三百年的美术发展。

时间：2013.07.14-08.09 地点：河南博物院

巴金藏名家书画展

展览首度展出沈尹默、茅盾、冰心等三十余幅名家书画作品，均为巴老师友、晚辈的馈赠精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会副会长陈子善还应邀在展前主讲《现代作家和他们的收藏》。

时间：2013.07.11-08.10 地点：浙江江南文学馆

面对面

中荷肖像画及室内绘画展

展览选取了中国的陈丹青、毛焰和荷兰的让·沃斯特、菲利普·阿克曼四位艺术家的111幅作品参展，其中包括陈丹青近年来的22幅画作。

时间：2013.07.07-09.08 地点：深圳何香凝美术馆

得大自在

乾隆时代的皇家风采

展览名“得大自在”，实出自乾隆的一方印章，展品来自北京艺术博物馆，整合了乾隆时期的多门类皇家文物98件（组），包括乾隆时期皇家生活中的五个方面。

时间：2013.07.11-10.13

地点：深圳博物馆

福建博物院

馆藏雕刻作品展

展览汇集了包括石雕、玉雕、牙雕、木雕等在内的近百件福建博物院馆藏的雕刻艺术精品，包括宋代石雕以及清代、近代的寿山石雕达20余件，其中有不少国家一级文物。

时间：2013.07.17-09.16 地点：福建博物院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来自荷兰皇家画廊的

荷兰画作

这35幅画作出自海牙荷兰皇家画廊馆藏，作品中包括有世界名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该作品已经超过15年未在美国亮相了。

时间：2013.07.11-09.28 地点：亚特兰大高等艺术博物馆

上海老爷车博览会

至少40辆技术精湛、保养完好的极具收藏价值的古董老爷车将亮相。其中，首先被组委会推崇和筛选的一批是20世纪20年代到60年

代比较珍稀的老爷车型，品牌涵盖劳斯莱斯、法拉利等。

时间：2013.10.18-10.20

地点：上海外滩33号

话剧《收信快乐》

话剧《收信快乐》原名《爱情书简》，曾于1989年在纽约首演。后经台湾著名编剧、导演单承矩先生重新改编。此次大剧院演出版本回归最初的经典阵容，由台湾歌手兼演员万芳与夏靖庭联袂出演。

时间：2013.10.09-10.19 场馆：国家大剧院小剧场

儿童艺术剧院《想飞的孩子》

以现实主义的手段讲述一个京郊农村发生的故事，该题材与我国的航天事业密切结合，结尾展现出整个中华民族的腾飞与辉煌，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

时间： 2013.08.03-08.04 场馆：国家大剧院戏剧场

话剧《欲望花园》

詹妮和理查夫妇住在豪华的花园别墅里，却过着贫穷的日子——对奢华生活的种种欲望把他们压榨得狼狈不堪、濒临崩溃……

时间： 2013.12.12-12.13 场馆：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

话剧《青蛇》

田沁鑫导演，袁泉、辛柏青主演。“青蛇”是根据中国最著名的古典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白蛇传》改编而成，讲述了人与妖的一场传奇爱情。

时间： 2013.10.16-10.27 场馆：艺海剧院

话剧《12个人》

一个18岁的男孩，被控在午夜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只要12位“陪审员”一致通过有罪，就可以将这男孩送上电椅。田水导演根据卢曼特柏林电影金熊奖处女作《十二怒汉》改编。

时间：2013.08.20-09.15 场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舞台剧《面包树上的女人》

张小娴原著小说改编，程韵和林方文的故事被搬上舞台。何念工作室作品。编剧章钰，导演李李。

时间：2013.08.22-09.01 场馆：人民大舞台

音乐剧《亚当斯一家》

百老汇热演音乐剧《亚当斯一家》是根据传奇漫画家查尔斯·亚当斯创作的漫画改编而成，古怪又充满喜感的角色形象，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追捧。此次是广州大剧院首次独家引进原版百老汇音乐剧。

时间：2013.08.13-08.18 场馆：广州大剧院